



# 唯物史觀

(科學的歷史觀)

吳黎平、艾思奇著

東北新華書店遼東分店印行

# 唯物史觀

(科學的歷史觀)

吳黎平 著  
艾思奇

# 唯物史觀

著者 吳黎平、艾思奇

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遼東分店  
發行者

經售者 各地新華書店及代銷處

一九四九.九.初版 遼.1—3,000

# 目 錄

## 序

### 第一章 科學歷史觀的幾個基本論點

- 一 人類生活的特點.....一
- 二 人類的實踐與科學理論的關係.....三
- 三 辯證法唯物論運用到社會上的幾個基本論點.....六

### 第二章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 一 社會與自然.....一三
- 二 生產力.....一七
- 三 生產關係.....二二
- 四 從社會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二九
- 五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三八

### 第三章 階 級

- 一 階級的概念.....四一
- 二 「自在的階級」「自爲的階級」.....五〇
- 三 社會中各階級.....五四

### 第四章 國家政權

- 一 國家的起源、實質和變化.....五八
- 二 國家政權與政府.....六七
- 三 戰爭問題.....六九
- 四 無產階級的政權.....七一
- 五 無產階級的政權形式.....七五
- 六 巩固工人階級國家政權的必要.....八三
- 七 共產主義社會與國家問題.....八六

## 第五章 民族與民族鬥爭

一 民族是什麼	八九
二 民族問題與民族革命運動	九一
三 民族革命戰爭	九五
四 民族統一戰線	九七
五 民族自決與民族國家	一〇六
六 民族的獨立解放與民族最後解放	一〇七

## 第六章 家族

一 什麼是家族？	一〇九
二 原始共產社會的家族	一一一
三 一夫一妻制的家族	一一四
四 封建時代的家族制度	一一六
五 資本主義的家族關係	一一八
六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下的家族	一二二
七 簡短的結論	一二八

## 第七章 意識形態

一 心理與意識形態	一三〇
二 各種意識形態的內容特點	一三五
三 宗教的起源與發展	一四九

## 第八章 幾個結論

一 辩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的學說	一六三
二 社會與文化的起源	一六四
三 社會與文化的发展	一七三
四 唯物史觀理論的意義	一八八

## 序

正確的社會科學理論在我們中國的傳播，是增強我民族抗戰力量的一個有力武器。這種科學理論的傳播，對於我們民族，我們人民，是非常可以欣幸的事情。

可是，在我們青年對於這一種科學理論的學習中，却也發生了一些缺點，例如，目前有好些學習辯證唯物論的青年，以為只要背誦辯證唯物論的一些基本公式，就可以對付一切，而忽視，甚至於不願對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作辯證唯物論的科學的研究。這是拋開辯證唯物論的科學歷史觀，其結果，就只會形成亂套哲學公式，濫用哲學名詞，而對於社會的實際問題，却不能有具體的分析。這是社會科學學習上的一種不良的傾向，是亟須加以糾正的。

在正確的社會科學理論的傳播中，目前必須最警覺地用力地克服對於這一理論的破壞行爲。正是由於這一理論有利於我們民族堅持抗戰與真正的團結進步，所以反對我們民族團結進步，反對我們民族堅持抗戰，陰謀向敵投降的分子，就用了種種欺騙武斷論調，來反對這一科學理論。尤其是一些出賣人頭，並遵循「不妨碍日本侵佔中國」的指使來加緊破壞民族抗戰的託派賣國賊，現在正在加緊反對與誣衊正確的社會科學理論，反對與誣衆科學歷史觀，並且以種種無恥的詭辯的詞句來惑亂青年學習者的視聽。這一類「違背中國人爲人道德」的盜賊，正是在行動上思想上爲日寇滅亡中國的種種陰謀毒計與軍事進攻作應聲蟲與別動隊。每一個中國人，必須把這種人面獸心者的陰謀加以揭露破壞摧毀，把它們的原形，置於光天化日之下。

爲着幫助我們民族的青年戰士，更好的學習正確的社會科學理論，爲着揭露出賣人頭的盜賊的陰謀勾當，除進行一切其他應做的工作外，我們覺得還需要編寫一本科學歷史觀的書。本書就在這樣的意圖下寫成了。

本書的寫成，耗費了相當多的工夫，但一定還會有許多不完滿的

地方。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指正，以便將來能够繼續修改。

黎平

恩奇

中華民族偉大抗戰二週年紀念日

# 第一章 科學歷史觀的幾個基本論點

## 一、人類生活的特點

人類的生活是社會的生活。每一個人都要維持他的生活，但他的生活的維持，決不是靠個人孤立地可以做到的。每個人都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生活着，他和社會中其他一切人有一定的相互關係，他自己在這社會中，處於一定的地位，有着一定的作用。也只有在這社會的生活中，個人才能維持他的生活。馬克思說：「人類是最名符其實的社會的動物，不單只是社會的動物，而且是僅僅在社會中才能够個別化的動物。」（「政治經濟學序論」）因此在整個社會的生存和發展中所發生的一切大事，對於社會中的個人的生活，沒有不發生影響的，每個人對於他所處的社會全體的生存發展的大事，都不能不參加，不能不在裡面起一定的作用。把中國目前的情形做例子來說，那是最明顯也沒有了。誰也可以看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蠻的侵略戰爭和中國全民族反抗這侵略的正義的戰爭，對於全國人民的生活所給與的影響是多麼巨大，多麼廣泛。抗日戰爭是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全中華民族都應起來為爭取自己民族生存而鬪爭。這樣的情勢，使中國民族空前地覺醒了，各黨派各階層，各界人民，各個部隊只要是不願意做亡國奴的，都須要努力進行抗戰工作。只有極少數的甘為日寇作走狗的敗類才會去做漢奸。只有那些頑固不化準備投降的分子，才會向堅決抗日的軍隊和黨派進行無理的磨擦，以有利於日寇的侵略。中華民族每一個人都須要參加到抗戰的洪流中去，因為個人的生活和全民族全社會的生活是密切聯繫着的。

人類的生活又是有目的有意識的生活。人類和任何動物都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人類的一切行動，或多或少的總預先有着一定的計劃和目的，對於自己的行動的結果，總有着相當的打算和預測。社會的生活，就是無數個人的有目的活動的總體。「在社會的歷史上，一切行動的力量，都具有意識，而且自覺地動作着」。（恩格斯：「費爾巴

哈論」)這是人的生活和動物的生活不同的地方。馬克思說：「蜘蛛完成織工似的工作，蜜蜂建立自己的蜂巢，其巧妙甚至勝過某些建築師。但是，最壞的建築師，也有他本來的特色，為最好的蜜蜂所不及，那就是建築師在動手建築之前，已把計劃放在腦裡，在勞動過程完結時，所得到的結果，便是這過程的工作者腦裡所具計劃的實現。」(「資本論」第三篇第五章)今天在我們民族堅持抗戰的行動中，我們知道抗戰的目的是為了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而且也知道，為要達到這目的，我們大體上應該走什麼道路和採取什麼方針，應該採取什麼戰略和戰術的計劃。對於這些方針和計劃，知道得愈明瞭，我們戰鬪的信心也就愈堅定，行動也愈有把握。

為什麼人類的生活能有這樣的優點？因為人類能夠認識事物發展的規律。人類不僅僅憑着感覺和本能而生活，不僅僅因着眼前環境的刺激而作臨時反應的行動，而且能够運用自己對於事物規律的認識，能對事物變化的方向和前途預先得到了了解，根據這些了解，人類就可以決定自己的行動計劃。人類的行動計劃，必須建立在這規律性的認識上，依據正確的規律性認識的計劃，是能够成功的正確的計劃，違反了正確規律性的計劃，在行動的結果上一定會失敗。建築師建造房子的計劃，是主要以力學以及其他物理學的規律的認識為依據的。例如說力學的規律是：要使一件東西立得穩，必須下部穩固，因此建築樓閣得要有堅固的地基。在沙灘上建築樓閣，必定會倒台，就因為違反了力學的規律的原故。在抗日戰爭中，我們的一切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外交的、民運的方針，也必須依據抗戰發展的規律的認識來決定，我們根據國內、國際以及日寇的各種情況，相信在我們克服妥協投降危險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能從持久戰中得到最後勝利。而且因為抗戰的工作是多方面的，所以我們不單只要了解戰爭一般的發展規律，而且還要認識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民衆運動的等等方面規律，用來規定我們各方面的工作計劃和方法。

所謂有目的有意識的生活，就不外是能够認識事物的發展規律，

利用這些規律來決定我們行動的計劃和方法。使我們能够控制事物，支配事物，使我們能以自己的努力把事物變化引導到合乎我們的目的的方向去。人類的生活是一般地帶着這一個特點的。所不同的是人類對於規律性的認識是不斷地進步的，同一時代的人的認識也有程度的不同。對於規律性的認識愈豐富，愈深刻，則人類控制事物和支配事物的能力也愈更增加，在爭取自己的目的的實現時也愈更有辦法；反之，認識愈少，或甚至沒有認識時，則目的意識的作用就愈小，要受到事物的規律的支配。恩格斯說：「在社會中作用着的力量，是完全和自然的力量表現得相同的。當我們還沒有知道它們，還不能管理它們之時，它們是盲目的，強制的，起破壞作用的。可是一到我們知道它們，理解它們的動作（也即規律——作者），發現它們的方向及它們的現象之後，那時，我們就可以更甚地使它們服從我們的意志，而利用它們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反杜林論」）

二、人類的實踐與科學理論的關係

因此，人類的生活和行動，與人類對事物的認識是分不開的。認識是行動的一個極重要的因素，要有正確的有效的行動，必須有正確的認識。在不同的條件之下的行動，就要求把握不同的具體的認識。錯誤的認識，是對於行動有妨礙的。

在今天抗戰行動中，我們要求正確的對於抗戰的規律的認識，我們要求所認識的一切都能够幫助爭取抗戰最後勝利。認識必須是爲了行動，能够指導行動，幫助行動，認識應和實踐統一起來。這也就是說認識是有階級性和黨派性的，它是一定的行動黨派的立場上的認識。我們的認識以一定的進步的實踐行動作基礎，要把我們的認識很清楚很嚴格的和相反的立場上的人的認識分別開來。我們必須與一切反對抗戰危害民族的敗類，嚴格分開來，我們確信我們抗戰建國的最後勝利，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妥協。在我們戰線上，要反對一切違反抗戰建國的思想，要把一切危害民族的，對日投降妥協的思想行動澈底從我們的戰線上肅清出去。

認識有黨派性，同時正確的進步的認識，又必須是以科學理論為基礎的認識。真正的科學就是正確把握各種事物發展規律的學問。為什麼科學能正確地把握事物的規律性？因為科學本身，就是從人類的實踐經驗中總結的結果。它的理論的正確性已經被人類長時期的實踐或科學家的多次實驗所證明。這種產生於實踐並為實踐所證明的科學理論，反過來又可以作為我們的實踐行動的指導理論。

什麼是人類的實踐行動？就是改造世界的一切活動。人類不是消極地與環境適應，而是不斷地改變着環境。人類的實踐活動是有兩方面的，一方面是改造自然的活動，另一方面，改造人類自己，改造社會。和這兩方面的實踐行動相照應，科學也有兩種：（一）關於自然的科學或自然科學，（二）關於人類社會的科學或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的理論，是幫助我們改造社會的指南針。中國的抗戰，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發展的新階段。要能够使中國革命得到勝利，就需要社會科學的理論的認識。

真正的社會科學，是從馬克思的科學歷史觀（也即是唯物史觀或唯物的歷史理論）發見時才建立起來的。因為只有唯物史觀，才正確完滿地把握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為什麼馬克思才發見了真正的社會科學？這有兩個主要的原因可以指出：第一、唯物史觀是最進步，最革命的階級性和黨性的科學。前面已說過，科學理論是人類實踐經驗的總結，認識是在行動的要求之下產生的東西。不是最革命最沒有保守性的階級，就不能進行澈底變革社會的實踐行動，因此它也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把握到最正確完滿的社會發展的規律。祇有近代無產階級，歷史上最革命的階級，才能毫不隱飾的認識和指明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規律，繼承與發揚人類思想的一切優良成果，而成立唯物史觀這科學的學說。馬克思之所以能成立唯物史觀學說，正因為他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的立場上面的。無產階級，為什麼是最革命的階級呢？因為它有着「無產者地位之故……因為它在革命中所喪失的，並沒有別的東西，而不過是自己頸上的枷鎖」（「聯共（布）黨史簡

明教程」第一章第二節)它的最革命的地方表現在那裡呢？表現在它的歷史任務是不但要解放自己，同時要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沒有絲毫自私的，狹隘的保守成份，如列寧所說，「它是最貫徹的民主主義者（它由於自己的階級立場不能不如此）」。（「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任務」）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僅是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策略，而且是一切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論與策略。它能够最正確完滿地把握社會發展的規律，自然就能够成立像唯物史觀這樣的真正的社會科學的理論。

這樣的情形在中國今天有很好的證明。中國的抗戰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發展的新階段。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在今天抗戰中的忠誠勇敢堅決艱苦的奮鬥，成為堅持抗戰的一個支柱力量，這是全世界所周知的。就因為有這樣一種澈底戰鬪的實踐立場，所以中國的馬列主義者能够迅速地指明和總結許多經驗，迅速地依據抗戰規律的認識的指導，在戰鬪中給與了日寇、漢奸以重大的打擊。

馬克思所以能發現真正的社會科學理論的理由，第二、就是由於他運用了科學的方法，即唯物論辯證法。列寧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講的辯證法的方法（與形而上學的方法對立着）不外就是社會學上的科學方法。」（「何謂人民之友」）為什麼辯證法的方法是科學的方法？因為如列寧所說：「辯證法是一個最周到的，最富有內容的，最深刻的關於發展的學說……其他一切關於發展，關於進化原理的說法，都是片面的，缺乏內容的，損傷自然界和社會裡的實際發展過程的（這樣的過程中，時常發生突變，大變化和革命）」。（「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因為辯證法是關於事物發展的最周到、最富有內容、最深刻的學說，因此它最能引導我們去把握事物的發展的完全而正確的規律性。把這樣一種方法運用到人類社會中去，就成為發見和指明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最正確的方法，因此，也就是最科學的方法。馬克思以前的一切研究人類社會的思想家，就因為不能夠應用辯證法的方法，不能周到地、全面地、深刻地把握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相反的他們常是

用形而上學的觀點，想把社會看成某種固定的，建立在某種永久不變的原則上的東西，他們不是要發見社會發展的規律，而是要為人類生活定立一些固定理想的規範，所以他們的研究，不能夠成爲科學。

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是唯物論的辯證法，而不是唯心論的辯證法，這就是說，它不但用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而且這種研究，是建立在唯物論的理解之上的研究。它是「把關於社會的科學和唯物主義的基礎協調起來，並根據這基礎而改造關於社會的科學」。（列寧：「什麼是馬克思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它的關於社會科學的理論要叫做唯物論的歷史理論。把唯物論的理解，作為研究人類社會的基礎，就使這研究成爲真正的科學。為什麼？因爲祇有在唯物論的理解之上，我們才能把社會的發展看做客觀物質的有規律的發展，我們才不會妄想僅僅憑着人的主觀要求或主觀的成見去看社會一切的變革問題，我們才能够憑着社會客觀的規律的認識和運用，來決定我們改造社會的行動與方法，才能够準確地達到我們實踐的目的。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者的缺點之一，就在於沒有能够把唯物論的論點擴展到人類社會上，因此，他們從來也沒有建立起關於人類社會完整的科學。

三、辯證法唯物論運用到社會上的幾個基本論點

在科學的歷史觀裡，辯證法唯物論運用到人類社會上的第一個主要論點是：社會和自然是一樣的物質的東西，它們是客觀的存在，有他們自己獨立的發展規律。「假如自然現象的聯結及其互相依存性是自然發展的規律，那末，社會生活現象的聯結及其互相依存性，同樣亦不是偶然的事，而是社會發展的規律。這就是說，社會生活，社會歷史再不是偶然性的堆積了，因爲社會歷史是社會的規律性的發展，而社會歷史的研究便變成了科學。」（「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之所以成爲科學的歷史觀，就因爲它具體地科學地研究人類社會，正像明智的自然科學家具體地科學地研究自然現象一樣，（當然自然界規律與社

會規律有質的差異，並且具體的究研方法也並不相同。)它在社會現象中發見的規律，和自然科學在自然界中發見的規律同是唯物辯證的規律(雖然同時要看出它們兩者有質的差異，而不能在社會上機械地運用自然規律)。因此恩格斯說：「正像達爾文發見生物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見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正如要改造自然必須依據於自然發展規律的認識一樣，要改造社會，也必須依據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和研究。這是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不同的地方，唯心史觀或唯心論對歷史的見解，是常常要把社會的進化歸結到一些精神的原理或心理的原因去的，中國古代的性善性惡的爭論，就是企圖把「人性」這種精神的原理作為社會的基礎。一切舊唯物論者在社會的問題上，一般地也陷入了唯心論者的見解，即他們都不了解社會規律與自然規律同樣是客觀規律，不了解社會的發展是以物質為基礎，不了解人們應依據這些規律去推動社會發展，而企圖用空洞的「理性」、「合理的思想」等等作為改變社會的基礎，而不知道如果不認識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不依據這樣的認識來進行實際的民衆的革命行動，則無論怎樣美妙的理想，怎樣合理的計劃，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例如在今天的抗戰中，我們固然需要依據合理的思想、理性、道德及正義等等向全世界進行宣傳，因為我們反抗強暴侵略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然而如果我們不以正義的抗戰的實際行動，而僅僅想以正義的詞句來制止敵人的侵略，是明確不可能的。因為「滅亡中國」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貫方針，無論它的軍事進攻或它的誘降政策，都是為着實施它滅亡中國的一貫方針。所以我們中華民族，除了加緊民族團結力求進步堅持抗戰到底以外，任何別的方法，都不可能消滅日寇的侵略的。把社會規律與自然規律絕對劃分開來的思想，在中國就有張君勸作代表，他在十幾年前就主張科學的研究只能適應於自然現象的範圍，而人類社會生活方面，却完全是自由意志的領域，不是依循着任何規律而發展的。這種主張的謬誤，是任何一件社會生活的小事都能證明的，一個工人要想憑自己的自由意志，變成一個資本家，是不是可能呢？就中

國的抗戰來說，我們對於抗戰的戰略戰術的選擇，是不是完全憑自由意志呢？不是的，要能够勝利，我們的一切工作就不能任意胡爲，而要縝密地依據客觀事物的規律決定行動方法和計劃，而且也祇有依循着必然的規律去行動，才能够在工作中克服困難，獲得真正的自由。

以上所說證明社會同自然是依一定的規律發展的物質的東西，但這並不是說自然的規律和社會的規律沒有分別，並不是說，社會的發展，可以機械地用自然的規律來解釋，科學的歷史觀一方面承認社會規律與自然規律同是唯物辯證的規律，同時又要注意到兩者的質的差別性，並注意到社會有它本身發展的規律。在這一點上，也證明科學的歷史觀是在人類社會上面運用了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方法。一切非辯證法的（機械論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都不能了解這一點，這些唯物論都把社會和自然簡單地看作同一的東西，都企圖用各種自然的規律公式地套到人類社會生活上。例如法西斯蒂走卒布哈林，會用力學的機械法則來解釋社會的發展問題，把社會的發展簡單的解釋作各種社會「力量的均衡」和「均衡的破壞」等互相交替的過程。中國也有這類似的機械唯物論者，例如抗戰以前陶希聖所主張的「國際均勢論」就是一個好例，他想用世界各國力量的表面上的「均衡」關係的變化來說明國際政治，據此來抹煞國際上反侵略的鬪爭，並藉此給漢奸的德意路線建立「理論」基礎（陶希聖早已跟汪精衛同投到日皇「陛下」去了），這種荒謬的論調的作用是在於企圖領導人們去聯合德意，破壞反侵略陣線的鬪爭。這種荒謬的論調，不論在東方或西方，都被事實打得粉碎，對侵略者妥協投降的結果，不但不能造成停止侵略的「均勢」，反而鼓勵了侵略者，禍害了被侵略民族，這已經是全世界有目共見的事情了。

舊唯物論用自然規律說明社會發展的企圖，還有另一個表現，即想用生物界的一般規律來解釋社會問題，最普通的是想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的思想來說明社會上的一切人與人間的鬪爭。帝國主義國家常常想用人口論的「理論」來證明侵略殖民地的正當性，那就是說，因

爲人口增加食物不够，不能不向人口稀少的國家殖民，不能不與殖民地競爭生存。這一套主張，也是錯誤的。因爲在帝國主義國家裡，一方面有大量的飢餓的失業者，另一方面却有過剩的生產物；所以社會的恐慌並不是由於食物不够，而是由於社會制度的不良。中國有些人們的見解，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地方，也在這一點。中國有些人把社會的發展歸結到生物學的規律上去，認爲歷史發展的動力，是由於人民生活的問題，這就是把一般生物學的問題作爲歷史發展的動力，但爲什麼人類歷史中會發生各種各樣的生存問題，這是應該從社會本身特有的物質的歷史規律裡去找的。在這些人們的觀點中，是不可能說明的。而唯物史觀所要深究的也正是這一點。

辯證法唯物論運用到社會上的第二個論點是社會不單只有它自己的發展規律，而且社會的發展規律本身，也是發展變化的。這就是說在人類歷史的各時代裡，有各種不同的發展規律，科學的歷史觀要求我們具體地研究這些時代的各種不同的特殊規律，反對用一個簡單的公式來概括一切時代。這也是它和一切舊歷史觀不同的地方。不論「均衡論」的歷史觀或「生存競爭」的歷史觀，都是企圖爲一切社會時代找一個共通的規律，而不注意它的各個具體的特殊性，這樣的歷史觀自然就不能把握真實的歷史規律，也就是不能不和唯心論同流。唯物史觀則不是這樣，它雖然也包含着人類社會所共通的一些規律，但它決不以此爲滿足，不以爲社會發展的完滿的規律就只限於這一般的東西。在科學的歷史觀裡，最重要的還是要看出這一般規律在各時代的特殊的具體表現，封建社會有封建社會自己的規律，而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又和封建社會的規律有極大的不同。不但兩種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規律，就是同一社會，因發展階段的不同，因所處的環境條件的不同，它的規律也有某些不同的表現。同一資本主義社會裡，自由競爭時代的規律和帝國主義時代的規律，雖有基本的相同點，但確是有好些不同點，在同一帝國主義階段上，各資本主義國家演變的規律，雖有基本的相同點，但也有各國不同的具體的特點。同一被帝國主

義法西斯蒂所侵略壓迫的國度，也因為不同的條件而各有不同的發展規律上的具體不同特點，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國三國的抗戰，各有自己具體特點，而決不能胡亂地混淆起來，以阿比西尼亞的滅亡，西班牙共和國的失敗，來直接推論，說中國抗戰也會失敗，這完全是荒謬錯誤的。

辯證法唯物論運用到科學歷史觀上來的第三個論點是：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決定精神，「自然、存在、物質世界是最初的，而意識思想是第二次的、派生的，假如物質世界是離開人的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意識乃是這個客觀現實的反映，那末，社會的物質生活，它的存在，同樣亦是最初的，而它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次的、派生的，社會的物質生活是離開人的意志而獨立的客觀現實，而社會的精神生活是這個客觀現實的反映。這就是說，社會精神生活形成的來源，社會思想、社會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的發生的來源，不應該從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的本身中去找，而應該從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社會的存在中去尋找。思想、理論、觀點等等乃是它的反映。這就是說假如在社會歷史的各個不同時期中看到各種不同的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假如在奴隸制度下碰到一種社會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而在封建制度之下另一種，在資本主義之下第三種；那末，這不應該以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本身的「特性」與「固有性」去說明，而應該以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的不同的社會物質條件去解釋。某種社會的存在，某種的社會物質的生活條件，就有某種它的思想、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這就是說，科學的歷史觀研究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及歷史發展的方法是首先要闡明它的社會的物質基礎，更從這基礎上來闡明一切社會現象的發展。也就是說，在我們作實踐行動的時候，我們對一切問題的解決不可從社會的思想或意識方面出發，而應該從社會的物質條件出發。例如我們可以看見日寇對華侵略中，日本法西斯蒂軍閥的野心的作用，但如果我們簡單地想把這些軍閥的野心當作侵

略的根本原因，那就會發生很大的錯誤。因為這樣一來，就可能使我們幻想，只要幾個軍閥把野心拋棄，就不會侵略中國了，這種看法的錯誤是在於不了解軍閥的野心的根本的社會原因。在日本人民革命未得到勝利以前，即使今天有某一軍閥不願繼續侵略（假定的說）但整個的日寇侵略，也是不會停止的。「侵略滅亡中國」，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貫方針。所以如果有人以為日本帝國主義會悔心轉意停止侵略，那就是最荒唐的最危險的幫助準備投降，破壞堅持抗戰的謬論。

辯證法唯物論指明了物質決定精神，存在決定意識，但並不能因此就說，這裡只有片面的關係，即精神或意識僅僅只有被動的作用，它對於物質或存在，不能起任何積極的反作用。相反地，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產生的思想意識，它反過來又可以積極推動物質的發展。說物質決定精神的僅只「講到社會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的起源，講到它的發生，講到社會精神生活是他們的物質生活的反映，至於社會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的意義，至於他們在歷史上的作用，那末，歷史唯物論不僅不否認，而且相反地，着重指明它們在社會生活在社會歷史中的重大意義與作用。有各種不同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有老了的、過了時的、替衰亡下去的社會力量服務的思想和理論。它們的意義就在阻礙社會的發展，阻礙它的前進，有新的、先進的、適合社會先進力量利益的思想和理論，它們的意義，就在於幫助社會的發展，幫助它的前進，而且如果它愈確切的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那末，它的意義來得愈加重大」。（同前）

說明物質決定精神，只是說沒有物質基礎，就不會有適合於這基礎的一切思想，是說沒有新的社會物質生活出現，就沒有新的社會意識表現。而不是說社會意識毫無力量，「新的社會思想與理論只有在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已經提出了新的任務之後才會產生。但是，在它們產生之後，它們便成了極重大的力量，能够幫助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所提出的新任務，能够幫助社會的前進」。（同前）中國有些人曲解唯物史觀為「經濟史觀」或「經濟決定論」，這就是說：一切都

由經濟決定，社會上其他事物相互間不能發生任何作用，更不能對經濟起反作用，這樣，一切都可以讓「經濟」去自然而然地變革，還有什麼革命的必要呢？這完全是錯誤的有害的謬論。科學的歷史觀的內容，完全不是這一回事，科學歷史觀對於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並不是僅僅歸結到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上，就以為滿足，而且要研究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基礎上所產生的一切精神生活的要素，研究這些精神的東西與它的物質基礎關係，它對於物質基礎所發生的作用，它對於改造世界的作用。當我們要解決社會的實踐行動中所提起的問題，當我們為着我們所擔負的大時代的新任務而進行戰鬥的時候，我們不只要注意到物質生活條件的變革和推進，我們還要注意把握和動員一切精神的力量，以推動這些物質生活條件的改造和進步，以促進革命任務的完成。在我國對日抗戰發展的過程中，我們須要在思想上、輿論上動員廣大民衆克服對日妥協投降的危險，堅持抗戰到底，鞏固民族團結，力求民族進步，以爭取抗戰最後勝利。

以上所說的，只是辯證法唯物論運用到歷史觀來的幾個最基本的論點。至於這些論點怎樣具體的展開？社會的規律和自然的規律不同在那裡？社會發展各階段的特殊規律又是怎樣？決定社會意識的物質生活基礎是什麼？社會意識是怎樣決定這物質基礎？這一切問題從下一章起就開始說明。

## 第二章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 一、社會 與自然

人與其他動物之區別，在於人類具有創造勞動工具的特能。動物對於自然的適應，是在於直接用自己的官能去取得牠所需要的自然產品，即使動物也能影響環境，改變自然條件，但牠只是用自己的器官，來作勞動工具。例如築堤的獺鼠，就是典型的例子，有些昆蟲，也是如此，這些昆蟲用自己器官，從自然中取得材料來製造物品（如蜜蜂之能造蜜）；不錯，我們知道，猴子有時也利用棍子，去從樹上採摘果子，這棍子當然無疑的是勞動工具的一種萌芽，但是，猴子之利用棍子，第一，是偶然的，臨時的，不是經常的；第二，牠所用的勞動工具，是天然的，現成的，而且牠並沒有去企圖改進這種勞動工具，使之成為真正的勞動工具，因此人類應用勞動工具，與動物界應用勞動工具，就根本不同了。人為着自己的需要，為着滿足這種需要，所以進行生產；他並不是從自然中，簡單的取得現成的東西，人更進一步還以他自己器官所造成的勞動工具之助，去影響自然。由此很明顯的可以看到，動物對於自然的適應，帶着自然的生理的性質；在生存的競爭之中，不能適應自然的物種被消滅，而那內部器官發展的趨向與外部環境相適應的物種，則能繼續維持和發展牠們的族類。動物界中之發展，就是如此。可是人的發展不同，人利用勞動工具去影響並改造自然，人還在自己與自然之間，造成人工的環境，人對於自然環境影響的程度，是依靠於人工環境的發展的，因此，按勞動工具完成的程度，人就漸漸的從自然的勢力（自然環境）中解放出來；但同時人對自己所造的人工環境之依賴，却增加了。沒有人工環境，人是不能生存的。

對於社會的思想和意識起決定作用的東西，就是人類社會的生產。社會的生產行動，是由勞動力與生產手段的狀態來決定的，換句話說，就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狀態來決定的。新一代，從舊的一代獲得

某種生產力的基礎，它決定生產行動的狀態與界限。因此，像馬克思所說的「人類的歷史聯繫，由此發生，人類的歷史，亦由此形成」。有一種地理學派的歷史家，說社會生活由地理環境來決定，是不是對呢？這是不對的。我們自然不能否認，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的生活，起着相當重要的作用。特別在社會發展的初期，當勞動工具還處在一種極可憐的狀態，而人對於自然的影響力，還是極弱之時，「地理環境」的作用就更大。在很久以前，人對於氣候的依賴，比較現在，更要厲害。因為這個緣故，當時人的擇居範圍，是極狹隘的。交通工具的缺乏，極大的阻碍了人的相互間的聯繫，因此，每一地方都成為閉關自守之域，而不能與其他地方發生關係。很明顯的，地理的條件，也影響了生產的性質。譬如，沿河一帶的居民，投身農作，草地上的居民，則務畜牧；森林地方，則作狩獵，五金的發現，使石器的勞動工具可以進到鐵器的勞動工具。同樣的，由狩獵進步到畜牧，當然也是因為發現了某幾種的家畜動物。若是某些地方沒有這些條件，那末，居民必然地只能停留在低度的發展之上。但這只是說明，地理環境的條件，是社會發展的一個經常必需的條件，而不是說它對於任何社會有決定的作用。在許多寒帶地方，從前因為氣候條件的嚴寒，人差不多是不能生存的。可是現在這些地方却成為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區域了。在二百年以前，英國還是四分之三屬於農業，而現在則一變而為完全的工業國，全國人民百分之九十是城市居民。灌溉與肥料，使以前不能耕種的惡劣土地，現在也可以耕種了。像這樣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

因此，我們就要反對在社會學中所謂地理學派的觀點（孟德斯鳩、波克爾），他們認為社會的性質，是由地理環境直接的影響來決定的。例如，據波克爾的意見：西班牙人的信教及迷信，妨礙精密科學的發展，這是使西班牙的經濟與政治衰弱的主要原因。這些缺點，反過來又是當時地震及火山爆發的結果；所有這些，對於他們的幻想，是極有影響的，由此產生了迷信。地理學派的錯誤，可以用以下的事

實，顯然地證明出來。在任何民族的社會政治結構上，都是連續不斷地發生很大很深的變動的，但是地理環境在本期內並未發生大變動（對於這點，儘可以把過去的希臘和羅馬來比現在的希臘和意大利，三百年前的英國，比現在的英國，革命前的俄國，比現在的蘇聯）「在三千年內歐洲已經來得及換去了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在歐洲東部在蘇聯已經換去了四種不同的社會制度，而在同一時期內歐洲地理條件或者完全沒有變動，或者變動得極少，連地理學上都值不得一提」。（「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顯然的，社會的變更，不能直接由很少變更的地理環境來解釋。地理環境不能成爲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決定的原因。

地理環境的變動，和社會的變動相較，是非常緩慢的。地理環境對於社會影響的性質，由生產力的水平來決定，由建立在這種生產力基礎上的經濟制度來決定。例如，英國地理條件的特點——優等的煤礦——祇有在資本主義出現以後，才對英國的發展開始發生影響；又如特尼浦的急流，伏爾霍夫的水流，泥煤的產區，這些地理環境存在於俄國，已經很久了，可是若沒有社會主義制度和現在的技術的發展，那末，這些良好的地理環境，無論如何是不能成爲生產力發展的要素。相反的，以前這些泥煤藻澤，在地主看來，不過佔了他的廣大地面，特尼浦河的急流，也不過是航行的障礙物而已。

因此，同樣的地理環境，在某個社會發展的階段上，是不利的；而在另一個社會發展階段上，則爲有利之物了。

用生物學的原理來解釋社會發展的人，以生存競爭、人民生活問題的發生等當做社會發展的基礎，是不是對呢？對於這種見解，我們首先要問，爲什麼會發生生存競爭？爲什麼會發生生活問題？他的答覆必然歸結到一個生物學的問題，即人口的增加。這就是人口論的見解。人口論的見解是不是對呢？我們也認爲是不對的，「無疑地，人口的多少，也成爲社會物質生活中一個重要條件，沒有一定最低限度的人，任何社會物質生活都不可能的」。「人口的增加影響社會的發

展，幫助或停滯社會的發展，但是他不能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而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不能成為決定的影響。因為人口增加本身不能解釋為什麼這種社會恰恰為這一種新的制度所代替而不是別一個，不能解釋為什麼奴隸制代替了原始公社制，封建制代替了奴隸制，資產階級制度代替了封建制，而不是任何別的制度。假如人口之增加是社會發展之決定力量，那末，人口密度更大就應該引起相當於他的更高形式的社會制度。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中國人口密度四倍於美國，但是從社會發展的觀點來看美國高於中國，因為中國現在還統治着半封建制度，而美國已經達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比利時的人口十九倍於美國，二十六倍於蘇聯，但是從社會發展的觀點來看，美國高於比利時，而比利時較之蘇聯却落後了整個歷史時代，因為比利時還統治着資本主義制度，而蘇聯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所以，人口之增加不是亦不能是社會發展和決定社會制度的性質「社會的面貌的主要力量」。（同前）

有些社會學者（例如霍必諾），認為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必須承認是種族。他們在社會學的分析上，主要的，是根據於各個人種自然特質（皮膚顏色、頭骨之構造等）的研究，然後才把這些特質聯繫到社會的性質上去。按他們的意見，某一高等的種族，命定是統治者，而別一低級的種族，應該為自己的利益而受治於高等種族。這種所謂種族的理論，完全表現是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胡說，絕無批評的價值。很多的種族，在歷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現在則落後了。例如，當大部分歐洲人還是野蠻人之時，埃及已是極文明的種族了。可是因為社會經濟發展的落後，現在埃及人却落後了。這就非常清楚，究竟還是決定歷史發展的經濟條件的意義大呢？還是種族的意義大呢？

由此，我們必須答出以下的結論來，就是：在分析社會之時，我們必須往社會內部去找求社會發展的出發點，我們知道，生產力是決定自然環境影響的要素。隨生產力發展的程度，人可以或多或少地改造自然。人的社會組織，必須與生產力相適應。因此，正確社會分析

的出發點，應該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的研究。

二、生產  
力

「自然」對於人，是「勞動對象」之總和，及「生存資料」的來源。照馬克思說，勞動對象，是勞動過程中所能加工的一切對象。若是勞動對象之本身，是經過勞動加工的結果，那末，這種勞動對象，即叫做「原料」。「一切『原料』都是『勞動對象』，但不是一切『勞動對象』都是『原料』」。（馬克思）馬克思以為「勞動工具」是：「物體或物體的結合體，這些物體是位於工人和勞動對象之間的，它們是勞動者對於勞動對象的影響的傳達者。」（《資本論》第五章）生產過程，是一種勞動的過程，它必須具有勞動對象及勞動工具。二者之總和，即叫做「生產手段」。生產手段之各種成份，並不對社會發展起同等的作用。勞動對象，乃社會四周之地理環境的一部，它們因勞動力與勞動工具之助，進入於生產過程中。煤或鐵苗，幾千年前就埋在土地裡而是可能的勞動對象。但僅僅用勞動力勞動工具把它從地裡開採出來之時，我們才能把它叫做勞動對象。

馬克思曾說：「勞動手段（馬克思是指勞動工具——作者），不只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尺度，同時是勞動所由完成的社會關係之指標。」（同前）可是這上面我們不能得出結論說，單看勞動工具，就可以決定整個社會形態。

不能的。我們決定社會形態，應當根據於整個社會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兩方面）的具體分析；在一定社會中存在些什麼生產方式或那幾種生產方式，那種是主要的，支配的，那種不是主要的支配的，他們中間的關係如何，發展趨勢如何等等。只有具體分析清楚這些，我們才能科學地正確地決定社會形態。

認為勞動工具是生產力的唯一要素，或以為勞動工具就是生產力（「唯生產工具論」，就是這一種思想），這是完全謬誤的。推動死的勞動工具之勞動力——活的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是生產力的最

重要的要素。因為「機器，若不利用到勞動過程中去，是無益的。而且這樣它還要受到自然作用的破壞的影響，因為鐵是可以起銹的，木頭是可以腐朽的。紗若不用來編織或織布，還不是等於無用之棉花。活的勞動，必須把這些東西，從死的狀態中復活起來，把它們變成可能的，實際的使用價值」。（同前）

生產力之提高，並不是僅僅與技術發展有聯繫的，常常因為勞動組織的改良，生產力也可以提高。例如簡單協力的工作——即是為着完成某一工作而集合若干人在一起工作——已使他們的勞動生產力有不少的增加。古代偉大的建築物（例如：埃及的金字塔，東方的灌溉建築，羅馬的道路和運河），都是大批奴隸和農民共同工作的結果，這些勞動者，都只用了原始的生產工具。勞動生產力發展到了較高的階段時，協力工作，也開始複雜化，而建立在分工的基礎上了。十七到十八世紀的手工作坊，在技術上，很少與小手工業有所區別，但它容有巨量的工人，共同在一個房子工作，在統一指揮之下，實行相互的分工，因此，勞動生產力，就比較以前要提高多了。馬克思說：「生產方式的革命，在手工作坊裡是以勞動力為起點。」（「資本論」第十三章）這就是說勞動力也是一個生產力要素，而且是一個最重要的要素，勞動力的變革，也是引起生產方法革命的因素之一。

所以生產力之基本要素，是「勞動工具」和「勞動力」。此外，還得加上一個「勞動對象」，生產過程中，沒有勞動對象，當然是不行的。

「若是從勞動過程的結果，即生產品的觀點上，來看整個的過程（勞動——作者），那末，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都是屬於『生產手段』」。（「資本論」第五章）但並不是一切可能的勞動對象，都是生產力。例如：海底的魚，沙哈拉的空沙地，我們尚未發現的礦苗；很明顯的，這些都還不是「生產手段」。要使勞動對象轉成生產力，就必須注意並統制勞動對象。所以，勞動對象如要成為生產力，必須從可能的勞動對象變成實在的勞動對象，因為這樣，自然的產物，就

轉成社會的力量。例如：山脈中的鐵苗，被偵測隊發現了，它還不是原料，可是因為發現的事實，它已是勞動對象（在廣義上言之），同時，對於它已化了人的勞動（偵測工作），所以它已是生產力。同樣的，礦裡的煤，雖然還沒有產出來，但它已是生產力。因為對它已用了勞動（偵測，建設礦坑等等）。由此觀之，某種具體勞動對象轉成生產力的可能，是由社會生產的性質，勞動工具的狀態，以及該社會的勞動力來決定的。所以馬克思說：「土地（從經濟的觀點來看，還包含着水）最初供給人類以食物及現成生活資料，它沒有受人的任何協助，而成爲人類勞動的總對象……以後，土地的本身，變成了勞動手段，但它在農業上的勞動手段的功用，需要許多其他的勞動手段及較高的勞動力的發展。」

生產力是勞動力，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三個要素的結合，所以，生產力的發展，也是表現在它們三者的結合之中。機械論者把工具或技術看作生產力的一切，以爲生產力的發展就只是工具的發展，是不對的，雖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工具的進步是生產力發展的不同時代的指標，是生產力的重要的物質的基礎。然而工具是死的，如果沒有勞動力的適當的結合與運用，仍不能叫做生產力。具體的說來，從遠古到今天的生產力的發展，可以表現爲以下的各種圖表：由最初的原始的工具如粗石器，進步到弓箭等的時候，在這樣的工具基礎的轉變上，生產力的諸要素的結合就由狩獵轉變爲飼育動物及原始畜牧形式；從石器工具再進步到金屬工具（鐵斧、鐵口鋤等）時，生產力的諸要素的結合轉變到種植植物或農業的結合形式。「金屬工具製造材料的繼續改進，轉變到冶鐵風箱，轉變到陶器生產，而與此相適合的就是手工業的發展，手工業與農業脫離，獨立手工業生產，以及手工工場生產的發展。從手工業生產工具轉變到機器與從手工業工場變成機器工業；轉變到機器制及現代機器化大工業的出現——這是人類歷史上社會生產力發展之一般的（絕非完全的）圖畫。這裡很明白的，生產工具的發展與改進是由與生產有關的人來實現的，而不能離開人的，

所以伴着生產工具的變化與發展，人——生產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亦變化與發展了，他們的生產經驗，他們對勞動的習慣，他們使用生產工具之技能亦變化與發展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

在生產的總過程中，包含着生產、消費、分配、交換等諸方面：生產通常是與消費對立的，但是，二者的並不是絕對的對立的。是「生產同時即是直接消費。」（馬克思）生產時必需消費原料、勞動力、勞動工具。按照消費的性質，我們很容易的就可以知道生產的性質。工業發展的國家，當然要求很多的金屬品、半製造品、工業原料等；而工業不十分發展的農業國，主要的當然是農產品。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把「生產的消費」（原料、勞動工具）與「個人的消費」區別開來。這同樣又是錯誤的，因在消費過程中，人恢復其本身的勞動力，這勞動力正是生產之一個主要成份，人在生產中消費原料和勞動工具，而使勞動力轉成物品；人消費食品及其他物品，而使物品轉成勞動力。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前者是生產者使自己物體化，後者則使物品人體化。」因此「生產即是直接消費，而消費即是直接生產。每一項都包含着對方」。（馬克思）不會在生產的消費之外再有其他的消費。

這樣看來，我們似乎可以把生產和消費合併起來。這也是錯誤的。第一，社會，並不完全消費它所生產的東西，為使社會能繼續存在起見，它必須積蓄繼續生產所不可少的基金。因此（我們在下面就可以看到），每一個社會形態，必有它特殊的積蓄規律，因之也就是特殊的決定消費的規律。第二，按馬克思的意見，僅僅對於單獨的主體，「生產和消費才是同一行動的原素」。在封建的自然經濟中，生產者各人曾消費了他自己所生產的一部分（但也決不是全部，而且甚至不是大部分，因生產者的一大部分產品，是被封建剝削階級及其國家所剝削與消費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者多是不直接佔取自己所生產的物品。這而且是不可能的，例如：鋼鐵工廠的和造船廠的工

人，能不能需要他們自己改造的火車頭、耕種機、輪船等等呢？當然不能。同樣的，紡織廠和製鞋廠的工人，若是不能得到別的工廠與別人所產生的物品，那末，他們怎樣維持生活呀？這裡很明顯的可以看到，全社會以及生產者，都是消費者，他們都得到社會產品之一部分，這一部分的多少，當然是由某一社會形態中的特殊分配規律來決定的。因此，居於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分配，把生產者與物品分裂開來。最後，階級社會裡還有一種驚人數量的浪費，是決不能被忽視的。剝削階級的種種有害設施與奢侈生活，把許多生產物用在不生產方面，恐慌的時期，資本家把過剩的生產物消毀，以圖抬高物價等等，這些浪費，和我們說的生產的消費是不同的。這種浪費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就決不會存在了。

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生產手段的分配，以及社會成員根據生產標識的分配，是先於生產品之分配的。很明顯的，我們在研究生產時，不能不把分配看成是生產的一個成份，因為，如果沒有一定的生產力的分配方法，生產也就不能進行。生產品的分配是依賴於生產力（活的和死的）之分配的；因為生產品之本身，正包含着生產力，即原料、勞動工具及用來恢復勞動之用品。同樣的，當交換是生產、分配、消費間的接連的一環時，交換也是生產的一種組成原素。顯然的，在交換之前先應該有分工，有了分工，然後才有交換。所以交換完全是由生產來決定的。由此我們看到，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就形成了整體中的個別部分，統一體中之區分」。生產是非常明白的對立統一律的例子。馬克思說：「生產與其定義相反，包含着自己，同時又包含着其他的成份，每次從它本身上，開始新的過程。……生產之變動，是和分配之變動同時進行的，例如因資本之集中，因城市和鄉村人口之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發生變更。最後，消費是由生產來決定的。在各種不同的原素間，發生了交互作用。在任何有機的統一體中，都是如此的。」

三、生產  
關係

從上節可以知道，人類爲着生產，就得要有一定的工具、技術，在勞動力的運用下面作用於勞動對象。這就是要有一定的生產力。但是，生產力只是人類的生產活動的一方面，「它表現着人們對於使用來生產物質財富的自然對象及自然力的關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但是，人類進行生產，不僅僅是要和自然發生關係就完了。在生產中間，人和人互相間也不能不發生一定的關係，那就是生產關係。這樣的關係是爲生產力所決定，並且適應於生產力的發展狀態的。「什麼樣的生產力就應該有什麼樣的生產關係」。（同前）人和人在一定的生產力狀態下進入某種一定的關係，它是不依靠於他們的自己的主觀意志的，這就是說不管他願意不願意，他們總不能不走入這一定的關係裡。馬克思說：「在生產中的人們不僅影響自然，而且互相影響着。如果他們不以一定的方式聯合起來共同活動與互相交換自己的活動他們是不能生產的。爲着要生產，人們進入一定的聯繫和關係，祇有經過這種關係和聯繫，他們對於自然界的關係才能實現，生產才有地位。」（同前）「在自己的社會生產中，人們加入一定的、必需的，與他們意志無關的關係——生產關係。」（「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說」）

所謂生產關係，具體的說來，有種種方面：生產的總過程包含生產、消費、分配、交換等方面，所以生產關係也包含生產的關係、消費的關係、分配關係、交換關係等，這幾方面的總體，稱做生產諸關係。然而，在生產過程的各方面中間，成爲決定基礎的，是生產過程，所以生產諸關係中間，生產方面的人的關係，是最基本的方面。普通講到生產關係時，一般的常是單獨指這一方面，什麼是這生產關係？那就是在生產中人們對於生產手段的所有關係。「假如生產力的狀態所回答的問題是人們用什麼樣的工具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物質財富，那末，生產關係狀態所回答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生產手段（土地、森林、水道、礦藏、原料、生產工具、生產的房舍、交通手段等）在什

麼人手中，生產手段在什麼人支配下，在整個社會支配下呢？還是在個別人、集團、階級支配下用以剝削別人、別的集團、別的階級呢？」（「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倘若生產手段是屬於社會全體，在整個社會的支配下，那末，這就是共產主義的生產關係，在這樣的生產關係之下，社會人們是爲着大家共同的需要而生產，沒有誰剝削誰的現象。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社會人們的分配關係、消費關係等，也是以共同需要爲標準的。倘若生產手段集中在少數人、集團、階級的手裡，而另外的人們、集團和階級除了勞動力以外，很少有甚至完全沒有生產手段，那末，前者就利用他們所據有的生產手段來剝削後者的剩餘勞動，這就是剝削制的生產關係。在這樣的生產關係之下，生產是爲了前者的少數人、集團和階級的利益，而後者在生產中僅只能取得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或甚至過着半飢半餓的生活。這裡也就有着另一種分配、消費和交換的關係。

在生產中，我們可以看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兩個方面，即人與自然的關係和人與人互相間的關係。這就是說，在生產過程中不僅有人（勞動力）和生產手段的結合，而且還有人和人的結合。這兩種結合，統一在生產過程裡，採取一定的方式，就叫着生產方式。這樣，生產方式是有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方面的。馬克思說：「無論社會生產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手段，總是生產的因素，可是當他們相互處於獨立的狀態之時，他們僅是生產的可能的因素。一般的爲着進行生產起見，他們必須結合起來，這一結合所由完成的特殊性質及方法，區別着各個社會結構的經濟時代。」（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

例如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不僅大機械工廠把勞動者與技術結合，而且勞動力是一種商品，它出賣於資本家，無異於機器、原料、煤油之類。於是工人與資本家就發生了一定的生產關係。

勞動力與其他商品不同之點，只是在於勞動力是具有造成剩餘價值的特殊能力。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完全是由資本對於僱傭勞動的關係來決定的。「這個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作者）的主要執行者——資本家及僱傭工人——只是資本和僱傭勞動的化身的表現而已；社會生產過程所加於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是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

不同的生產方式，劃分不同的社會時代的標準。或者可以說，不同的社會時代，有不同的生產方式做它的基礎。在勞動手段私有制的社會時代之下的生產方式，馬克思叫做「敵對的生產方式」（即以階級的對立和剝削為基礎的）。人類歷史的發展上共有五種生產方式，它表現出五種生產關係的基本形式，區分着五種社會時代，那就是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共產主義制（包含其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制）等五種生產方式。而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三種都是敵對的生產方式。

原始共產制的生產是在人類生產力的低級發展時代的生產方式。這時代的生產技術只是最初步的石器工具的運用（以後是弓箭的運用）。「石器工具及以後出現的弓箭沒有可能孤單地和自然力量及野獸闘爭。為要在森林中採集果實、水中捕魚，建築居處，人們假如不願餓死，不願為野獸及鄰居的犧牲品時，被迫得共同地工作，共同勞動引導到生產工具以及生產成果之公共所有。這裡還沒有生產工具私有的概念。（如果把某些同時是防禦野獸的工具同時是生產的工具之個人私有不計在內）這裡沒有剝削，沒有階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

奴隸制的生產方式，是原始共產制崩潰後第一次敵對的生產方式。在奴隸制下的生產關係是：一切生產手段以及奴隸勞動者本身，都全部屬於奴隸主所有。奴隸完全沒有自由，奴隸主可以把他們買進賣出，隨便殺死，如同牲口一樣。這種生產關係，是與當時的生產力適應的，即在奴隸制下，生產工具已比原始共產制時代進步，石器工具已被金屬工具所代替，人類開始有了畜牧、農業、手工業，生產力比

較發展了，在原始共產制時代，人類勞動所得，僅足維持最原始的生活之用，不能有剩餘生產物，生產者互相間有了交換生產物的可能，同時也有了少數人剝奪多數人剩餘生產物的可能，由此也有了生產手段集中於少數人手中而使多數人變為奴隸的可能，同時，這時的生產力的發展又並不是很高的，低劣的生產技術，雖然比原始時代進步一些。但要從勞動者剝削剩餘勞動，在那時候生產力的水準下，還不能不採取最殘酷的奴隸剝削的方式，奴隸主只知道對奴隸勞動作盡量的剝削，毫不顧惜到奴隸的身體健康和生命的維持。「這樣，生產過程中一切社會成員的公共的自由的勞動沒有了——這裡統治着被不勞動的奴隸主所剝削的強迫勞動。因之，生產手段以及生產品之公共所有亦沒有了，私有財產代替了它，這裡奴隸主是第一個根本的貴重的所有者，富者和貧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全權者與無權者，他們之間的殘酷的階級鬭爭——這是奴隸制度的畫圖」。（同前）

封建制下的生產方式是繼奴隸制而出現的另一個敵對的生產方式。在這裡，生產力有了比較進一步的發展。「鐵的冶煉的改進；鐵犁和織機的傳佈；農業園藝、釀酒、乳造的向前發展；手工業者之外手工業工場的出現——這是生產力狀態的特點」。（同前）因為生產力較發展，剩餘勞動的剝削就不必採取奴隸制那樣的方式，生產工作者不必像奴隸一樣完全成為剝削者的所有物。這樣，封建的生產關係的基礎就是：主要生產手段（以土地為主）完全屬於剝削階級，而生產工作者則是剝削階級的半所有物。生產工作者主要是農民，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不能不在地主的土地上耕種，他們束縛於土地上而不能不每年向地主納付地租（地租可以採取勞役的形式，現物的形式，以至貨幣的形式，但這些形式，時常是錯綜着）。封建生產關係是農奴制或其變形。在這裡，封建主已不能殺死農奴，如像奴隸制那樣，但仍可以買進賣出。但除了這封建的私有之外，在封建社會裡，還存在着一些個別的私有者，他們有自己的生產手段，並依靠自己的勞動而生存，這就是自耕農和手工業者。

封建制度是在奴隸制度崩潰的基礎上產生的。奴隸制度崩潰的原因是：奴隸受到殘酷的剝削殘殺，他們對於自己的勞動毫無興趣，奴隸主人又是完全過寄生的生活，不管生產，因此就使生產力不能發展起來。在奴隸勞動之下，亦可能應用較進步的生產技術，奴隸對於所受壓迫殘殺的忿恨，當然使他們對於生產毫無興趣，對於工具毫無顧惜，那時只應用低劣粗笨的工具。因此，要使生產力發展，不能不在生產方式上有所改變，這就有了封建的生產方法。「新的生產力要求工作者在生產中有多少創造性，對勞動的好感，對勞動感覺興味，因此，封建主拋棄了奴隸，因為他們是對勞動沒有興趣與完全沒有創造性的工作者，而願意有農奴，農奴有自己的經濟，自己的生產工具，對勞動有多少的興味，這是耕種土地及以收穫的現品交付與地主所必要的。私有財產在這裡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剝削和在奴隸主下差不多同樣殘酷——不過多少減輕了些。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階級鬭爭組織成了封建制度的基點」。（同前）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又是比封建的生產方式進一步發展了的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更發展了。新的手工工場以及後來的機器工業，代替了封建社會下的手工業。舊的封建手工業是以個人的生產手段私有及個人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這種生產方式只能適應狹隘的生產範圍及低級的生產技術。生產力一發展，大規模機器生產一出現時，這種個人私有個人勞動的生產就要被打破了。大規模的生產手段，集中在資本家的手裡（因為小生產者個人的力量不能置備大的生產手段），小生產者在大生產的壓力前面，不能不遭到破產的危運。於是社會上就出現這樣的新的兩個階級：一方面是佔有着大規模生產手段的資本家，另一方面是任何生產手段都被剝奪只剩自己的勞動力的無產者。無產者不能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在資本家的工廠裡去工作。這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就是出賣勞動力的勞動者在資本家所支配的大規模的工廠裡進行生產。資本家在這裡，只佔有生產手段，而對於勞動者，却不能佔有。勞動者不像奴隸那樣隸屬

於奴隸主，也不像農奴似的對地主半有隸屬的關係，勞動者的身體，在法律上是自由的，資本家不能殺死他們，也不能把他們拿來買賣，但資本家用錢購買了他們的勞動力後，就可以進行剝削他們的剩餘勞動。在資本主義制下的生產工作者，仍是受到很苛重的剝削的，但與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相比，有兩個特點：即一方面勞動者的身體在法律上算是「自由」了（這還是經過劇烈的革命闘爭才得到的），同時，勞動者的文化教養程度也比較高了，因為「新的生產力要求生產工作者要比被壓迫的黑暗的農奴來得更文化些更聰明些，以便能懂得機器及正確地使用它，因此資本家願意有從農奴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僱傭，工人有足够的文化程度，以便正確地使用機器」。（同前）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裡有着它自己不可調和的矛盾，使得它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就和它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結果就不能不走上崩潰的道路。這生產方式的矛盾是：就它的生產力方面來說，它是建立在社會廣大分工之上的大規模的生產，社會化的生產，就它的生產關係方面來說，這種生產是在資本家私人佔有之下的生產。這就是「社會化的生產」和「資本家的佔有」的矛盾。因為是社會化的生產，所以他不能是自給自足的生產，生產必須是爲着社會的，而且依賴着社會的交換來進行再生產的過程；但又因為生產是爲資本家所佔有的，所以資本家的生產的目的只是在於私人的利潤，而並不顧及到社會的需要。於是就有資本家的競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以及生產過剩，危機等等。

於是，「把生產力發展到巨大範圍之後，資本主義陷入於它自己不能解決的矛盾中。生產愈來愈多的商品，減低商品的價格，資本主義就使競爭尖銳化了，使大批中小私有者群衆破產，把他們拋入無產階級，壓低了他們的購買力，因此生產出來的商品就沒有了銷路。發展了生產，集結了幾千萬工人在大工廠中，資本主義給了生產過程以社會的性質，這便搖撼了它自己的基礎，因為生產過程的社會性質要求生產手段的公共所有，然而生產手段的所有權仍然是資本家私有的

，與生產過程之社會性質不相符合的。

「生產力性質與生產關係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爆發為在週期的生產過剩的危機。這時候資本家由於他自己造成的人民的破產被迫地焚燃生產品，消滅已經製成的商品，停止生產，破壞生產力；這時候千百萬人民被迫地忍受失業和飢餓，不是因為商品不足，而是因為商品生產過多。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不適合於社會生產力的狀態而立於和社會生產力不可調和的矛盾中了。」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成熟着革命，革命的使命就在以生產手段的社會主義的公有來代替資本主義的私有。」

「這就是說：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最尖銳的階級鬭爭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點」。（同前）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使它終於要發生革命，走到崩潰的時期。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就是經過一定過渡時期而建成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是在更高的生產力發展基礎上的，它有更大規模的生產，如全國電氣化，因此它的生產力是更高度的社會的生產，而在生產的關係方面，生產手段是屬於社會全體，所以這就解決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化的生產和資本家的佔有的矛盾。生產手段的私有制消滅了。因此，一部分人靠生產手段的私有來剝削另一部分人的現象也沒有了。」這裡生產過程中人的關係的特點是不受剝削的工作者之同志的合作與社會主義的互助。這裡生產關係是完全符合於生產力的狀態的，因為生產過程的社會性質為生產手段的社會公有所支持」。（同前）

共產主義制度並不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時候馬上就會完成的，因為共產制度是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完全相反的制度，所以它不能夠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胚胎內發展完成。它的完成，必須推翻資本主義，經過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與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一步步建設起來。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是在於：一方面要發展生產力，改造農民的

小生產爲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集體生產，使生產能够達到共產主義的水平；一方面要鎮壓舊的資本家、地主的殘餘勢力的反抗，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把他們完全清洗出去。這樣，共產主義的完成，不是馬上能够達到的，它本身依照生產力發展程度的不同而分爲兩個階段，第一，是社會主義階段，這是共產主義制的第一步完成，在這裡，社會的成員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然而生產力的發展還不够給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要達到這一步，就要更進一步的發展生產力，進到第二個階段，即完全的共產主義制度。共產主義制度曾是世界優秀的思想家幾千年來所夢想的制度，馬克思主義把這種夢想，變成了科學的理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指導之下，這一理想，已經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即在蘇聯變成了現實，——已經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進向共產主義發展的現實了。

爲着明瞭社會發展前途，以及社會主義過渡到

四、從社會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的過程，我們必須首先了解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區別及其關係。

在這問題上首先應當認清的是：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並不是如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或甚至如資本主義社會與封建社會那樣的兩種不同的對立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只是同一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個發展程度不同的階段或階級。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評」中，稱社會主義社會爲「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而共產主義社會則爲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列寧稱這兩個階段爲兩個層級。這兩個階段，都是根據於同一的基礎之上，即生產手段歸社會所有，人對人的剝削完全消滅。這兩個階段，並沒有社會形態的原則上的不同地方（如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區別）。所以從社會主義進到共產主義，就將不須要有革命，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發展，將採取逐步過渡的性質。

其次應當指出，在這兩個階段之間，還存在有重要的區別。這種

區別，基本的是在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程度的差別。在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已是這樣高度的發展，生產品已是這樣的豐富，使得每個社會的成員，能够「各取所需」。可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則尚不能有這樣發展的生產力與這樣豐富的生產品，所以社會主義的原則，只能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

馬克思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因此，這個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知識各方面，都還保留着舊社會的痕跡」。

這些痕跡像馬克思所說的，是在於「人們的經濟與意識中，還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殘餘」。這些殘餘是：

城市與鄉村的對立的殘餘，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的殘餘，就是說資本主義所遺傳的舊的分工制度，還有殘餘的存在，還沒有完全消滅。

舊的階級的區別，還有殘餘存在，還沒有完全消滅，例如蘇聯還存在着有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他們雖然已經完全經過新的改造，雖然已是全世界所從未見過的階級，可是他們仍是階級，還沒有最後的丟掉自己的階級特徵（生產上、生活上、思想上等）。

在人們的意識上，也還有資本主義的殘餘，例如對於社會主義財產的小資產階級的態度，破壞勞動紀律，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情緒，在一部分人中還存在有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道德的殘餘，宗教迷信，對於婦女與兒童的非社會主義態度等等。

由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之尚未充分高度的發展，由於人們在經濟上、意識上還留存着有資本主義的殘餘，所以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還只能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正像列寧所指出的，「在共產主義的最高階段沒有達到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由社會和國家方面來最嚴格地監督勞動量和消費量」。

以上所說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特點。至於共產主義社會，則現在就可以預見，那時的生產力將是無比的高度的發展。這就是說，

構成生產力的各要素，將呈現無比的高度發展的姿態。

在勞動工具和技術方面，共產主義社會將比社會主義社會有更大的更新的發展。現在在蘇聯已經發展了大規模的電氣化，採用了許多最新的機器，農業上亦採用了大批的新機器（曳引機、聯合機等）。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機械化技術，是不能停止不進步的，到共產主義社會，那末可以預料，生產技術將是在電氣化基礎之上的自動機械化。這種自動機械化，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特別在美國）雖已有部分的採用，且收得極大的效果，可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下，這種進步的技術，是不完全的、片斷的，受到束縛和閹割的。祇有從社會主義發展到共產主義，才能使根據於電氣化基礎之上的自動機械化廣大地、深入地、全面的發展起來。這種自動機械化的技術，不僅將無比的、大量的發展生產力，而且將使資本主義舊的分工形式的殘餘，歸於消滅。

在勞動者方面，共產主義社會那時候，他們的生產技能、經驗與學識，將比社會主義社會有無比的、更大的發展。根據列寧的話，共產主義的人是「全面發展的」、「全面熟練的」、「能做一切的人」。（「列寧全集」二十五卷一九五頁）這樣的人，將是技術上來造的、文化很高的、懂得全部生產技術科學基礎的人，在生產過程的高度自動機械化的基礎上，生產過程將不需要生產者的狹隘的專門品質。各種勞動形式的普通化，使得從一種勞動形式轉到另一種勞動形式很是容易了。這樣，勞動者的繁重的、勞苦的體力勞動，將最後的為機器及自動機器所代替，而人的作用將只是管理、照顧及監督整個自動機械體系的工作而已，這就是說，勞動者的勞動，在基本上，將變成技師、工程師式的勞動。對於實行這樣勞動的「全面發展」，勞動已不是一種繁重負擔，而是光榮快樂的事情（這點現在蘇聯已在開始做到了）。在意識上，也將完全消滅任何舊的資本主義的殘餘。

在勞動對象方面，共產主義社會更不知要比社會主義社會擴大好多，增加好多。那時許多現在生產很少，或竟毫不生產的地區，許多

利用得很少或竟毫未被利用的物質，將廣大地、精密地、多方面地被生產起來，被利用起來。由於新的生產工具生產技術與新人的生產技能生產熱忱的廣大運用，一切地區的生產，一切物質的使用，都將大大的增加自己的數量與質量。社會的生產品，於是以無比的豐富的程度增加起來，正像馬克思所說的：「社會財富的一切來源，都將洶湧而流。」

這些構造生產力的原素，在共產主義的和協的生產關係（沒有任何剝削的人們之互相合作互相幫助的生產關係）之下，將造成如此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如此豐富數量的生產品，使得社會可以進而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正像列寧所說的：「資產階級式的權利之狹隘眼界，逼得人們去斤斤計較，我不要比他人多做半小時工作，我不要比他人少得一點報酬——這樣的狹隘眼界，到那時將完全消滅了。社會對於那分配給每個人員的生產品數量的標準，在那時已經沒有必要，各人皆得『按其所需』而自由的取之於社會。」真正的實際的平等於以實現。

經過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生產力如此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那個時候，經濟上、道德上、知識上舊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殘餘，都將被掃蕩以盡。對於社會公共財產的態度，對於勞動的態度，對於道德的觀念，以至對於婦女、小孩的態度，都將是自覺的共產主義的了。於是一切迷信、妄想以及一切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習氣，也都將被掃蕩以盡了。

這時正像恩格斯所說的：「人類終於成爲自己存在的主人翁。因之，也就成爲自然界的主人，成爲自己的主人——成爲自由人。」「這將是人類由必然的王國進於自由的王國之飛躍。」（「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〇〇——一〇二頁）

如何由社會主義社會進到共產主義社會呢？

我們既說明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是同一社會形態的兩個階段，基本上是在於生產力發展程度的差別之後，那麼我們就要來問

，究竟從社會主義社會怎麼樣才能進到共產主義的社會呢？

我們的回答是：進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關鍵，主要的是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的大量發展。這種發展是如何進行的呢？我們拿蘇聯的具體例子來說。

一，爲着準備逐步地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就必須廣大的運用新的生產工具、生產技術。共產主義的社會技術，像上面所說的，可以預定是根據於電氣化基礎之上的自動機械化，這種機械化是要以機械化、電氣化以及化學事業的發展爲基礎的。所以電氣化，機械化以及化學事業的發展，就成爲社會主義社會準備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工作。

機械化。如在蘇聯，經過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已經成立了非常發展的重工業，特別是機器製造工業，使得蘇聯國民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新的機器與其他生產工具，都能自己供給，使得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技術改造，能够深刻的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將使蘇聯重工業及機器製造業，有更偉大的發展，在農業方面，蘇聯現在已有機械化的，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國有農場集體農場），其範圍之大，是任何國家所不及的，其生產過程的機械化的程度，也是任何國家所不及的。就是拿美國來說，其所有的曳引機與聯合機的數目，雖尚較蘇聯稍多，但其農業機器運用的程度，則較蘇聯相差甚遠，所以蘇聯農業機械化的程度，比較美國還高得很多。其他國家，更不用說了。蘇聯的農業生產上，真正實行了偉大的技術的革命。因之，現在蘇聯，無論在工業、農業上以及交通上，都是廣大的且日益增加地發展着機械化。

電氣化。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的經濟任務，是電氣化。如在蘇聯，經過兩個五年計劃，在電氣化上面已經有偉大的成績，蘇聯的電氣生產，現在已佔世界第三位，並且正在飛速地往前發展，蘇聯致力於電汽工業的建設，使電力生產的發展，超越於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現在蘇聯正着手建設世界第一大電站網，

庫比雪夫水電站網（在伏爾加河上，總能力是三百四十萬瓩羅瓦特，每年平均電力生產是一百五十萬瓩羅瓦特小時，將於第四次五年計劃中完成）以及無數的其他中小的電站，經過長距離輸電，可以供給各種工業生產的動力的需要。小的電站特別是小的水電站，可以供給市鎮農村以電力，成為農村經濟電氣化的樁桿。電氣化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於使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採用電力。電力的廣大運用使得自動機械化有了物質的基礎。這種自動機械化，利用電力，經過整個系列的機器，來完成整個的生產過程（從原料粗製一直到產品製成爲止），因之經過許多人手來逐步製成產品的方法，就可以改變。在那時候，只要較少數的人，應用最複雜的、監督的、測量的器具，就可以指揮整個的生產過程，這不但使人的勞動的生產力，可以得到最偉大的發展，而且激進地改變勞動的形式，除去不熟悉的勞動，使產生者脫離細碎的分工以及最易使精神疲勞的單調的動作。這樣的自動機械化，就能使生產者的勞動，提高到技術工程師式的勞動。工作者的文化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他們對於自動機械化的運用，就使舊的資本主義分工的主要殘餘之一，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的對立的殘餘歸於消滅。

電力的廣大運用，長距離輸電制度的建立，使得有計劃的國民經濟的管理，可以大大地集結起來，可是同時又產生一種可能，使得工業在全國內可以實行新的分散。因為電氣化使得中等的甚至小的企業，也能够完全利用近代技術的優點，獲得同樣的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在以前蒸汽機技術的時代，小的企業常是落後的、半手工業的，可是在電氣化的技術之下，就不是這樣了，那時小的工廠可以容易實現一種包含很大技術經濟優點的專門化，來製造產品的個別部分及零件，同時可以實行高度的自動機械化。這種小工廠，經過電氣網及電力交通，可以非常便利地與其他企業聯繫起來，好似大工廠裡的各個車間一樣。這些專門化的企業，在某一區域內，形成一定的合作制度。這種小企業，既可享受電氣化的自動機械化的利益，又可以比較迅速地

開工製造。所以在那時，與積壓許多資材、長期不能開工，而且生產組織及領導非常複雜的過大企業相比較，就要有利得多了。沉湎於建設過大工廠的傾向，是不合馬克思主義的（在第三個五年計劃中，已經採取了一些辦法去克服這種傾向，並着手建設中小工廠的網）。這樣，電氣化的發展以及自動機械的運用，既使生產的管理可以大度的集結起來，又使生產可以大批的分散，使他們接近原料來源，並在全國內平衡地分配工業的建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於平衡的分配國內生產力的指示之實現，以及農民生活根本改變（應用電力的生產，汽車交通，電燈、電話、電氣烹飪洗滌、自來水、新式房子；各種文化建設，學校、俱樂部、電影院、醫院、圖書館、託兒所的發展等等）；使得舊的資本主義分工的另一種殘餘，城市與農村的對立的殘餘，亦歸消滅。使得蘇聯現在勞動組合式的集體農場，在集體農民自覺擁護的條件之下，逐步轉為共產主義的公社。

由此可以看到電氣化將不可免地要成為共產主義的自動機械化技術的基礎，要成為完全消滅舊時分工制度的殘餘之有力條件。這就是為什麼列寧這樣重視電氣化，說「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的電氣化」。

化學事業。為着廣大發展生產力以便從社會主義社會進到共產主義社會，還必須大量的發展化學事業。因為只有這樣事業的發展，才能發現並運用許多現在無用或少用的原料，製造出多種的、大量的、新的產品（如人造橡皮，人造摩托油、人造織物、人造皮革、人造羊毛、人造絲、人造食物等等）。化學事業發展所引起的許多新的人造物品的生產，各種原料的毫無廢棄的利用，從簡單原料中製造許多複雜產品的方法，大部分近代化學生產的不斷進行的性質（這使化學生產可以最大的自動機械化）——所有這些，將偉大地提高社會勞動的生產力，同時使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社會可有一種強有力的國防武器。

電氣化，機械化及化學生產的發展，綜合起來，將造成共產主義

社會的高度發展的無可比擬的生產技術，使得社會生產品得到空前的豐富的增加。

二，但是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有新的生產工具與技術，還是不行的，除生產技術以外，還應當有具備新的生產技能與新的勞動態度，能够很好掌握並運用這種新的技術的人。這就是蘇聯的斯大哈諾夫式的工作者。斯大哈諾夫運動正是準備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之具體道路之一。這些斯大哈諾夫式的工作者，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

「大多數都是年青的或中年的男工和女工，有文化程度的，有技術修養的人物。他們的工作做得非常準確，非常認真，可作為一般工作人員的榜樣，他們十分愛惜工作時間，不僅是不肯浪費一分鐘，就連一秒鐘也是不肯浪費的。在他們中間，大多數的人，都已經受過所謂技術常識的教育，而且還繼續加深自己的技術的研究。他們沒有某些工程師、技術員以及經濟管理員底保守主義的惡習和苟且偷安的思想；他們很勇敢的前進着，打破陳舊的生產定額，創造新的更高的生產定額；他們自動的修改工業領導者所規定的標準生產率和生產計劃，往往補充和糾正工程師技術的工作，他們有盡量利用技術的本事。……斯大哈諾夫式的工作者是我國工業裡的革新家，斯大哈諾夫運動表示我國工業有無限遠大的前途，這個運動包含有我國工人階級將來文化、技術、知識程度高漲的種子，這個運動給我們開闢了一條唯一正確的道路，使勞動生產率達到必要的高度，以便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形勢——所有這些情形，難道還不顯而易見嗎？」（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第一次全國斯大哈諾夫式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

祇有在蘇聯的社會主義條件之下，在「全國生產力已經擺脫了資本主義的枷鎖，勞動已擺脫剝削制度的壓迫，工人階級已掌握着政權，工人階級的青年，已經有受到完備技術教育的一切機會」的時候，

才能「把工人階級的文化、技術程度提高到這樣的高度，才可以打破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對立形勢的基礎；也只有這樣，才可以保證必要的高度勞動生產率與十分豐富的消費品。以便開始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關於這一點，是絲毫不容懷疑的」。（同前）

這種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所造成的，具備新的生產技能，擁有新的生產熱忱並在各方面求發展的人，正是創造着共產主義的新新人類。這種新的人的增加，這種運動的發展，正是準備着有力的過渡到共產主義去的條件。

有了上述的高度發展的技術，有了運用這種技術的新新人類，那末，在如蘇聯這樣廣大的土地上，這樣豐足的富源上，就可以造成這樣高度發展的生產力，這樣豐富的生產品，使得「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的原則，可以在蘇聯實行起來。

當然，這一原則的實行，決不能採取立即全部完成的方式，而將採取逐步漸進的進化的方式。在理論上，現在已經可以設想，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分配原則的情形，將是：首先將用必需品（例如糧食、肉類、蔬菜等），根據需要，實行無償的分配；以後隨着社會財富發展的程度，來實行對於其他產品的無償的分配。

不管進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將來可能採取什麼具體的形式，可是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列寧曾經嘲笑資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荒謬的設想：「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似乎是一種無生命的、僵死了的、萬古不變的東西。殊不知事實上却只有在社會主義時代，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各方面才開始發生迅速的、真正的、確實是群衆的前途，在這前進運動中，起初有大多數人民，繼則全體人民都來參加。」列寧明白指出：「在社會全體人員對於生產資料領有的平等獲得之後，也就是說在勞動平等獲得了之後，在人類的面前，必然立刻會發生一個從形式上的平等到實際上平等的更進步的問題，也就是說，發生一個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原則問題。」

早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在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準備時期，列寧就已指出：「我們的黨看得更遠：社會主義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轉入共產主義，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將無疑的會造成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實際可能與必需條件。

。…………。由以上幾節所述，我們就可以知道，生產，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基礎，生產方式包含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方面。不同的生產力發展的程度和建立在這生產力之上的生產關係，就形成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人類歷史時期。  
五、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  
。…………。

為什麼人類社會發展中有這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歷史時期？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和造成這不同制度的原動力是什麼？科學的歷史觀的答覆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就是歷史發展的原動力。或者也可以說，生產方式的兩個方面的矛盾，就是推動歷史發展的人類社會的最基本的矛盾。當我們分析任何國度的社會的歷史的時候，當我們要認識它的某一時代的一切事變的根源的時候，我們首先應該去了解，什麼是這一個社會時代的生產方式，這生產方式的矛盾是怎樣的？或者說，它的生產力發展到了什麼程度，在這生產力之上的是什麼生產關係？例如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把資本主義的一切運動法則歸結為社會化的生產和資本家的佔有的矛盾。這一個矛盾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這一個矛盾表示資本主義是在生產力發展到成為社會化的生產的水準而生產關係仍在資本家佔有的階段上。一切資本主義的其他矛盾，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鬭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危機等等，都是以這基本矛盾為原動力而在它的基礎上表現出來的。

什麼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這要從以下幾點來了解：第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分不開的，它是同一生產或生產方式的兩面。人的生產都是以一定生產力的水準為基礎的生產，而為要生產，人和

人中間就不能不發生一定的關係，這就是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在一定階段上，是與生產力適應的，生產力發展到什麼樣的程度，就要求什麼樣的生產關係。奴隸制度適應於當時較低度的生產力發展，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又必須在近代手工業工場和機器工業的高度生產力出現之後才會發生。共產主義的生產關係必須在更高的生產力（如全國電氣化，更多的富源的開發，更新的勞動人民的出現）基礎之上才能出現。這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不可分的關係。這是兩者的統一。

第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不僅僅是統一的，同時也是對立的。這對立的表現是：生產的發展永遠是「開始於生產力的變化與發展，首先是開始於生產工具的變化與發展」，「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與最革命的要素」，而生產關係却是比較固定的要素。這樣，生產關係的變化發展，是首先由於生產力的變化發展，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它就要求把舊的生產關係打破，另外建立新的生產關係。倘使在這種時候，新的生產關係仍未能建立，那末，在舊的生產關係之下，生產力的發展一定就要受到阻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就一定要發生劇烈衝突。這種衝突，在階級社會下面，就以階級革命的形式表現出來，被壓迫階級它們代表着新的生產力的發展方面，因為它們不滿於舊的生產關係，以武力推翻壓迫階級（它們代表舊生產關係，因為保持舊的生產關係對於它們有利），建立起新的生產關係。

這樣，生產關係並不完全是消極適應於生產力的，它對於生產力有以下的反作用：它在一定時期是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那時新的生產關係建立起來，它對於新發展了的生產力能夠發生促進的作用。它在經過一定時期後是障礙生產力發展的，那時生產關係已經陳舊了，而生產力仍向前發展，那時它就會成為後者的桎梏，阻碍後者的發展，那時它就遲早要被後者的發展所衝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樣的說道：「開始社會生產力變化了發展了，以後依賴於這些變化及適合於這些變化，人們的生產關係，人們的經濟關係亦變化了。但是，這不是說：生產關係不影響生產力的發展，後者不依存於前者

• 依賴於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生產關係，自己亦影響着生產力的發展，加速或阻滯它。這裡必須指出，生產關係不能過久的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和處在與生產力矛盾之中，因為生產力要能充分的發展，祇有生產關係能適應生產力的性質與狀態並給生產力以發展的領域，因為不論生產關係如何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它早晚必須走向（而且真正的走到了）與生產力發展的水準，與生產力的性質相符合。不然，我們就會有在生產體系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統一完全破裂，整個生產的破裂，生產的危機，生產力的破壞。」（「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

### 第三章 階級

「一般地說來，階級是什麼東西呢？階級是允許社會的一部分人去佔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的東西。如果社會上一部分人佔有了所有的土地，我們就有了一個地主階級和一個農民階級；如果社會上一部分人佔有了作坊和工廠，股票與資本，同時另一部分人在這工廠裡做工，我們就有了一個資本家階級和一個無產階級」。（列寧「論青年團的任務」）

「按其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系統中的地位，按其對於生產手段之關係（大部是在法律上固定了規定了的），按其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同時還須按其收入的方法，及所能支配的財產之大小，按上面這許多不同情形而分成『人群』，即叫做階級。階級是一群人，他們因在一定的社會經濟體系中，處着不同的地位，所以某一『人群』，可以掠奪另一『人群』的勞動」。（列寧「偉大的發端」一文）

資產階級的學者，通常只是以數量上的區別，例如收入之大小，生活的情況等等，為社會階級區別的基礎。

例如，資產階級的學者，把工人階級看成是由幾個階級組成的，因為工人中的工資並不是平均的，而是互相不同的。

若是佔在這樣的一個觀點上，那末，我們應該把一個比別一個收入更多的資本家，算入另一階級去。這當然是絕頂荒謬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實質不可免的要引起各個資本家或資本家集團間的矛盾與競爭。在市場上，資本家與資本家，是互有矛盾的。資產階級，是可以分成幾個「階級下之集團」的，因為他們相互間的利益不同；可是財政資本家，重工業資本家，輕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的利益，雖有不同之處，但他們都是屬於資產階級，因為他們都是分佔工人所造成的剩餘價值的，他們都是僱傭勞動者的剝削者；但他們在分割剩餘價值上，分成了幾個不同的「階級下之集團」。

無疑的，在工人階級中，也有各種的「階級中的階級」。有得到報酬較多的上層工人，有得到報酬較少的工人。雖然工人的工資各有不同，但是他們同樣都是出賣勞動力，都是被剝削剩餘價值的人，他們在社會生產關係中，處在同一的地位上，所以他們形成了一個階級。

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私有制的維持——利用來剝削勞動力的——是一切資產階級集團生存的基礎，所以不管他們在某些個別的利益上有什麼衝突，他們還總是同屬於一個階級的。

工人之所以成為一個階級，因為他們都是勞動力之出賣者，都是被資本私有者所剝削的。無產階級要從資本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之主要前提，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私有制；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生產關係。

還有一種相反的主張，也是因為單單從數量上去區別階級的結果。這種主張認為，社會上人和人中間的貧富懸隔一定要非常的大，才能算是成為階級，如果這懸隔不大，就不能算有階級，不管這中間是不是有一部分人依靠生產手段的私有而剝削別人。例如中國，有人就以為中國人中間貧富的懸隔不如歐美的厲害，所以中國沒有階級。這種主張也是錯誤的。因為他們不了解：第一，中國人中間貧富的懸隔雖然比不上歐美，然而懸隔仍然是存在着的，而且這懸隔是往前發展的。第二，主要的是在於中國社會內也有種種剝削的關係的存在。雖然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華民族剝削壓迫與侵略是目前主要的矛盾，可是在中華民族內部地主與農民，資本家與工人等等的階級區別是存在着的。所以否認中國階級的存在是錯誤的。

階級，是必須與等級和職業區別開來的。在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及絕對君主專制之下，基於一定生產基礎之上的階級特權（土地之佔有，牧畜和農村生產手段之佔有），採取了法律所規定的等級特權的形式（奴隸制也是如此）。所以奴隸制與封建社會中的階級，是等級的階級。

封建制度的崩潰，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使等級也陷於崩裂。因此就發生新的階級經濟利益與舊的等級形式間的衝突和矛盾。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夜，存在着三個等級：兩個特權等級，僧侶與貴族。一個「第三等級」被壓迫者。事實上沒有政治特權的第三等級，本身是極其複雜的，它是各階級（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混合物。資本主義社會和封建社會（或者半封建制）的區別之一，是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不知有等級和特權之存在。形式上，在法律之下，一切人好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都是「平等」的，而事實上，這當然不能消滅真實的階級不平等。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人群，佔有生產手段，而別一個人群，則沒有，因此後者爲着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在壓制之下，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生產手段之佔有者。在這種經濟不平等的基礎上，不可免的就要發生事實上法律及政治的不平等。關於這點，在第四章中，將有詳細的解釋。

職業與等級和階級的分別，在於職業之產生是直接基於生產的技術關係上，因此它在未有階級的社會裡，即已存在着。社會之有職業的區分，並不像社會等級和階級的區分，由於生產手段私有制而發生；職業之產生，沒有階級等級那樣對於生產手段私有制的直接關係。

在共產主義社會裡，將不會有像在階級社會中的那種被壓迫而固定於某種職業的狀態。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人若是一陷入於某種職業界，那末，他必然會被自己的職業所束縛，一直到死爲止。想從這一職業改變到別一職業，是非常困難的。

在資本主義生產下面，勞動者在苛重壓迫與剝削之下，受了極端狹隘的和專門職業化的限制。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消滅了階級的奴役，因之也就把人從職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技術的偉大發展，階級區分的消滅，廣大的社會教育，這些都是足以使人克服分工所造成的限制和隔離。

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每一個公民都可以得到各方面生活所需要的充分的指導的知識。

在共產主義社會裡，農村經濟的生產方法，也同城市中的生產一樣，在集體勞動的基礎上，應用着高度發展的技術之基礎。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裡，工作人員相互間，就沒有了筋肉勞動和腦力勞動之分別，同樣的沒有農村經濟和工業的工作人員間之區別。

一切職業，當然都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產物。但職業區別與階級區別不同的地方，是在於一切職業之產生，主要的，是根據於技術的關係之上。此地應該說明，許多職業之產生，是與國家及各種觀念的發生，有關係的。職業比階級為多，例如，五金工人、紡織工人、木工等，他們的職業是各個不同的，但他們共同組成一個階級，以與別個階級相對立。

怎樣產生了社會的階級呢？

階級的發生，首先是在於原始社會裡，由於生產力的發展而發生了私有財產，發生了少數人佔有生產手段而剝削其他多數人的情形，在這樣的基礎上，才發生階級。原始社會裡，是沒有階級的，原始的共產制，是建立在最低度的生產力之上，那時人才開始脫離動物狀態不久，而「人在最初脫離動物界（狹義的說）而進入歷史以後，還是半動物性的、粗暴的，他既無力對抗自然界的力，又沒有覺到自己的力，所以他們像動物一樣窮，他們的生產力，也並不怎樣比動物來得大。在原始人中間，存在着某種狀況的物質的平等，對於家長，至少也是有特種社會地位的平等，那時沒有社會階級，他們繼續生存於以後開化民族的自然興發的農業大雜居中」。——這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裡描寫的原始共產社會的情形。（見第二編第四節）

從始社會裡產生階級是有兩種方式的。

第一，在原始社會裡為了保護社會成員共同的利益及調整相互的原關係，不能不讓某些指導者來負這種專門的職責，這些務有種種，例如：「解決爭端，制止個人方面之違犯規律，看守水源，特別是在

炎熱的國家裡，是後，在原始的條件之下，也有一些宗教的儀節。」（同前）這些負公共職責的指導人，起初是在社會成員的共同監督之下，爲大家服務的。但是當生產力發展以後，情形就漸漸變了，這些爲公衆服務的人，後來就漸漸變爲公衆的統治者。

生產力的發展，當然使原始公社經濟的結構，更具複雜的內容，因此，很明顯的就必須加強這些指導者的作用，該公社的指導者，在這指導的過程中，利用他自己的影響及能力，奪取大部分的公社的財富。這些指導者，漸漸由公社的服務者，變成公社的統治者。這種變動之所以成爲可能，同樣的又是因爲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生產手段的私有制之發生。私有財產制使社會上一部分人可以掠奪和強佔公社共有的財富，因爲，社會生產力，變成了當時社會中某一部分人的私有財產，這一部分人，指導生產的進行和消費品的分配，他們也掠奪了別人的勞動。當這些獨立的公社統一成爲國家時，統治階級的地位，更加提高，他們的作用也更大了。

恩格斯曾詳細描寫這一種階級發展的方式說：「他們（那些負公共職責的人——編者）擁有某種的全權，來便利他們的工作，這種職權是國家政權的萌芽。生產力逐漸發展起來，人口密度的增加，在某些場合上，形成共同的利益，在別種場合上，又形成各個農村公社（原始共產制在農業上的表現形式就是農村公社——編者）間的利益衝突，各個農村公社，組成更大的集體，這點又引起新的分工，和新的機關建立，以保護共同的利益，反抗敵對的利益。這些機關，乃成爲整個集體共同利益的代表，它們對於單獨的村社，佔有特別的而且有時是敵對的地位，它們很快的更加獨立了，一部分是因爲公共的職務，繼續遺傳，此遺傳在一切事情自發而生的社會裡差不多是自動形成的。還有一部分是因爲一個集團和其他集團之間的衝突加多了，所以這樣的權力更覺需要了。……這種公共的職權對於社會的獨立，……以後變爲凌駕社會的統治，最初社會的傭僕，……在順利的條件下，逐漸轉成領主。（同前）

第二種階級形成的方式，是原始共產制的公社，因生產力的發展而直接吸收了奴隸勞動。原始公社因為它的生產力最初不够維持社會各成員的生存，所以不能不共同勞動，共同分配，這裡每一個成員都必須盡自己的能力勞動生產。任何人都不可能依靠他人的勞力來維持自己的生存，也就是不可能有誰剝削誰的現象。但生產力漸漸發展，到達了這樣的程度，即每一個人勞動的所得，除了維持他自己的生活以外，還可以多少有些剩餘（第一種階級發生的方式也必須是以這樣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前提），這時在公社內就有可能吸收一些人為奴隸勞動者，使生活資料的生產更加豐富（這種情形一般是在生產力發展到家庭農業的程度時方顯著地表現出來）。在這樣的情形下，原始人就開始把戰爭時所掠得的俘虜用做奴隸勞動者，在以前，俘虜一般都要被殺死或被吃掉的，而現在可以保存他們的生命，以剝削他們的勞動力了。恩格斯描寫這種方式說：「農業家庭的天然的分工，在一定的物質狀況的階段上，使他有吸收一個或幾個勞動者的可能。在舊的公社的土地的所有權已經崩毀，或是至少以前的共同耕種制已經讓位給各家庭單獨分種小塊土地的制度，在那些國度裡，上述情形，尤其普遍。生產力已經發展到這個程度，使人的勞動力能够生產比較勞動力簡單生存所必需的數量更多的東西；給養多數勞動者的資料，已經具備了。這樣勞動力得到了價值。但是這種勞動力所屬的自己的公社及集團，還不能從自己的內部，分出自由的多餘的勞動力。戰爭使他們得到了這些勞動力，戰爭的現象，和幾個社會集團同時毗連的現象，是一樣的陳舊。以前都不知道怎樣處置軍事的俘虜，或者把他們殺了，再以前簡單的把他們吃了。但是在已有的『經濟情形』的階段上，他們得到了某種價值；所以俘虜留得了性命，而由人來利用他們勞動……奴制於是發明了。」（同前）

這樣，階級是隨着社會上的私有財產與剝削制的發生而產生的。私有財產的存在，使社會上一部分人佔有了主要的生產手段，並利用這種佔有權力來剝削另一部分失去了主要生產手段的人，階級的矛盾

就是這剝削所採取的形式，所以，隨着私有財產社會的發展變化，剝削形式也發展變化，也就是說，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也發展變化。奴隸社會的主要階級矛盾是奴隸和奴隸主；封建社會的主要階級矛盾是封建主和農民；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階級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歷史上的各種階級矛盾，就形成各種階級鬥爭。隨着階級的發展與變化，階級鬥爭，也發展與變化。我們不應該設想，階級鬥爭僅僅是在某個經濟體系中，爲着改良階級狀況而進行的，實際上階級鬥爭，具有更深刻的意義：每一個敵對的生產方式，都具有特殊的階級壓迫及階級矛盾的形式。而這階級矛盾必然要表現爲階級鬥爭，因爲：首先，壓迫階級爲了剝削的目的，就要不斷地與被迫階級鬥爭，爲了保持現存的剝削制度而向被剝削者鬥爭，被剝削者是被迫而不能不加以反抗。因此，當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階級時，正是在反對一定的與他利益相敵對的經濟制度。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利益就代表着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利益，也就是與全社會的真正利益相一致。在鬥爭的過程中，如果壓迫的剝削的階級鎮壓了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前進的鬥爭，而繼續維持其反動的統制，那麼社會生產力就要陷於停滯、破壞或後退。如果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得到了勝利，得到了解放，造成適合社會生產力發展與被壓迫階級利益的新的經濟結構來，那就使社會生產力往前發展，使全社會得到進步。

所以我們可以說：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的歷史過程的主要推動力。每個階級社會形態中的矛盾，表現於那些在生產關係中代表各種不同利益之人群的鬥爭上。這種鬥爭的結果，必然像我們上面所說的，或是被壓迫被剝削階級革命鬥爭的勝利與全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或是壓迫階級反動統治的勝利與社會發展的停滯與破壞。但無論如何，社會的形態及經濟結構，總是變動的。

爲着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即爲着更易舊的生產方式起見，無產階級就必須依一定的具體的客觀社會條件，經過一定的革命階段（如經過民族民主革命），領導革命以至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

專政，用這政權的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只有這樣的政權的力量，才可以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完全消滅舊的統治階級以及一般的消滅階級區分，才可以完成自己的勝利。因為從資本主義這私有制度到共產主義制度，是一個絕大的轉變，不但在政治上要推翻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推翻生產手段私有制，而且要在文化上、思想上克服幾千年來私有財產制度所養成的人類的舊意識的一切殘餘，沒有一個改造的過渡時期，這任務是不能完成的。所以，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必須經過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參看第四章）在這個專政的過程中，無產階級要消滅資產階級，同時因此也就使自己的階級的性質歸於消滅。在這意義上說來，這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切階級鬭爭的歷史之總結和完成，無產階級的任務，正是為着要最後消滅階級鬭爭，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同時改造自己與廣大勞動民衆的生活形式和其他一切舊的社會機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是在經濟上、生活上、心理上，消滅資本主義社會殘餘的一個時代。

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於他們錯誤地了解階級的實質，因而抹殺階級鬭爭的性質。他們對階級之實質，提出一種不正確的觀點來，他們認為階級僅僅的表示經濟利益相同的一個人群，他們不懂得經濟利益正是以一定的生產方式所固有的矛盾為基礎的。他們不懂得生產手段的佔有關係，就是生產力發展的某一階段上生產過程的出發點及決定點。因此，事實上，階級矛盾，正是生產矛盾的表現，有什麼樣的生產方式就有什麼樣的階級對立，也就有什麼樣的階級鬭爭。從他們的觀點看來，在經濟利益上某種調和之下，就可以不發生任何階級鬭爭，而達到建立新社會的目的。他們不知道，不破壞生產手段的私有財產制，基於階級對立之上的經濟體系的矛盾，也不能解決；他們不知道，階級鬭爭是由於剝削階級首先為着要保持舊剝削關係而進行着，而這樣的關係保持着的時候，就不可能達到任何社會主義制度的新社會，也就是說，不經一

定的革命階段以至最後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創造新社會。因此，他們關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經濟利益可以調和的謬論，完全成爲空的有害的幻想。相反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階級矛盾及階級鬭爭的尖銳化。

反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的理論，最明白的一個例子，就是考茨基，雖然他也承認資本主義的發展，加銳了階級的矛盾，但同時他又說：僅僅由「階級調和」的道路，可以走到社會主義去。這個「階級調和」的道路，在事實上，完全是妥協的議會主義的政策，完全是減弱無產階級的力量和鞏固資本主義的政策。實質上，考茨基只是用他自己的花言巧語，來掩飾他的有害的機會主義的理論，他對於階級與階級鬭爭的認識，是與馬克思主義沒有絲毫共同點的。大家都知道，馬克思無數次的說明過，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鬭爭，是客觀的必然的存在，這既不是馬克思的「創造」（「創造階級鬭爭」是不通的濫詞），也並非是馬克思所發明（好些資產階級歷史家如贊也里等，已先馬克思指出階級社會內階級鬭爭的存在），他自己的階級鬭爭理論與資產階級理論不同之點，是在於馬克思主義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作爲進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經的道路。「若是僅以階級鬭爭的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這完全是分裂和曲解馬克思主義，接近資產階級所承認的馬克思主義。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承認階級鬭爭進而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馬克思主義與許多小資產者（並大資產者）深刻的不同點」。（列寧：「國家與革命」）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中得到解決。由這裡發生以下的問題：是否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也可以有造成新的階級矛盾之條件？有許多資產階級的學者斷定說：雖然將來共產主義者可以得到勝利，但他們的天才，終是不平等的，因此在領袖與民衆間，指導者與被指導者之間，是不可避免的會發生社會的不平等。換句話說：共產主義者，可以得到勝利，而共產主義則不能得到勝利。

我們看事實的發展是否會和他們的想像相適合呢？首先我們須知道，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沒有生產手段私有制與剝削制的存在。那時文化程度是很高的，那時差不多每個人民，都不僅是一個單純的執行者，而是都可以成為指導者。同時，到了那時，因為技術到了高度的發展，勞動組織也合理化。另一方面，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生產力高度的發展，使社會人員的要求，完全可以滿足。這樣，我們試問：在那種條件之下，誰需要自己的特能，來取得特殊的經濟利益呢？此外我們儘可以說，在共產主義制度之下，人的心理，完全是另一種樣子，而與現在庸俗的個人主義不同。資產階級的學者，不能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們認為只有共產主義者勝利的可能，而沒有共產主義勝利的可能。自然，在共產主義社會裡，還可以存在天才的相當的不平等。而共產主義者，並不需要把全人類削做一樣的平。可是這種不平等，不會引到社會財產上的不平等。資產階級慣於私有制，所以他們以為才能也是私有的，在他們看來，才能即是錢，錢即是才能。因此，他們就說共產主義沒有勝利的可能，這自然是由於他們觀點的偏狹與無知。事實上，在生產手段私有制不復存在之時，天才的某些不平等，是不會造成財產上及社會上之不平等的。

任何社會的階級，並不是一時立刻形成的，它.....  
二、「自在的階級」、「自爲的階級」.....的形成，是經過長期的發展，由這發展中漸漸的形成起來。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無產階級只是社會內在生產條件上與別一群人不同的巨大的尚未組織的一個人群。在這初期的發展階段上，無產階級還沒有自覺的知道自己是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階級。它還沒有發展自身的能力，在這時期，按馬克思的術語，它就稱為「自在的階級」。最好的例子，我們可舉十九世紀初英國工人階級，或是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俄國工人階級。可是在工人階級存在的最初時期，工人階級已經為增加工錢，為減少勞動時間，為改良生活條件，而與資產階級作激烈的鬭爭了。在最初的時期，工人的鬭爭，是單獨的，某

工廠的工人，是和自己的工廠的廠主鬭爭。工廠不但集中了幾千幾百的工人，不只使他們共同參加生產過程，而且還使他們共同來作鬭爭。漸漸的，工人更覺悟到，要得到勝利，必須有更廣大的經常的戰鬪的聯合。當時的鬭爭，如罷工，是常常得不到良好的結果的，因為每當罷工之時，工廠主可以從本國別的地方或者從外國，收買許多工賤來代替工人，或是廠主乘工人的鬭爭組織解散之際重新舉行進攻，於是勝利的罷工的結果，也歸於消滅。廠主爲着更加便利的和工人作鬭爭起見，自己結成組織，所以產生了各種輕重工業廠主的聯合會。工人爲着自己的階級利益，也組織了自己的職工會，其目的在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樣，無產階級的鬭爭，開始由狹隘的鬭爭範圍，漸漸地擴大起來，由一工廠到一區，以至更廣大些。但在鬭爭的過程中，幫助廠主壓迫工人的，還有剝削階級的國家政權，廠主不僅有經濟的權力，而且還有政治的權力。資本家剝削工人，向工人進行階級鬭爭，但反對工人進行他們合理的階級鬭爭，他們經常壓迫工人的組織。所以，工人階級要爭取自己的解放，就必須進行主要的政治的鬭爭。可是這上面應當指出，工人階級對於自己階級歷史使命的清楚理解，不是從工人自發運動內部形成的。「階級的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是說只能從經濟鬭爭的範圍之外，從工人對資本家的關係範圍之外，灌輸給工人。祇有在各階級及各階層對國家和政府的關係方面，祇有在各階級相互關係方面才可以得這種組織」。（「做什麼？」）工人階級的真正的自覺的政治意識，必須有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才能形成。固然自發的成份，實際上無非就是覺悟的雛形，而且原始的騷動也已經表現了一些覺悟性的激發。可是「工人階級如果單靠自己的力量，就只能夠鍛鍊出工聯主義的意識，就是說只相信必須組織工會，必須與業主作鬭爭，必須要求政府頒佈某些工人所需要的法令等等。社會主義的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中受過教育的代表——知識界所製造出來的哲學的、歷史的、經濟的各種理論中生長出來的」。（「做什麼？」）祇有工人運動與科學社會主義相結合，才

能有真正自覺的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

對於這一個問題，應當說明下列三點：第一，科學社會主義固然是從「知識界所製造出來的哲學的、歷史的、經濟的各種理論中生長出來」，可是它的生長與發展，是根據社會發展規律的唯物的認識之上，並且是和工人運動的發展和工人階級從自在階級進到自爲階級的過程，密切聯繫起來的，沒有這樣的唯物的認識，不和工人運動相聯繫，那末，科學社會主義是不能形成與發展起來的。第二，一部分知識分子，雖然出身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但當他們認識了領會了科學社會主義，並且爲此而堅決鬪爭的時候，他們已是脫離了原來的階級立場，已不復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是爲無產階級謀利益的知識分子與無產階級的戰士了。第三，我們不能說，工人不能參加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與發展，工人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是能够而且應當參加這種創造與發展的。可是他們「不是以工人的資格來參加創造，而是以社會主義的理論家的資格來參加」，「換句話說，就是祇當他們和因爲他們多少已經能够具有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知識，而且能够把這種知識推往前進的時候，他們才會來參加這種創造。要使工人更加時常地能够具有這種知識，就必須儘可能地多注意於一般的提高工人覺悟程度，必須工人不拘束於工人讀物的工人的狹隘範圍之內，而要使他們多了解一般的讀物」。（「做什麼？」）

在科學社會主義與工人階級運動相結合，工人階級接受並擁護科學社會主義（這是爲工人階級爲全人類謀解放的正確學說）的過程中，在工人階級的階級基礎之上，工人階級政黨，就必不可免地要產生與發展起來。這一政黨是工人階級的自覺的先鋒隊，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隊伍，是工人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是工人階級先鋒隊與廣大群衆之間的聯繫的體現，是在集中主義基礎上組織起來的隊伍，是有嚴密紀律的隊伍。工人階級的政黨，爲着工人階級，廣大人民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而堅決奮鬥，它指導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階級，領導廣大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作政治鬭爭、經濟鬭爭與理論鬭爭，它清

楚認識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性與各國民族的特點，根據社會發展的具體情況與民族特點，具體領導革命鬥爭，經過那些必須經過的階段，以至最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

這樣，工人階級就從「自在的階級」轉成「自爲的階級」了。它已覺悟到自己的歷史使命和目的，並且它也造成了爲自己目的而鬥爭的適當的組織。

政治鬥爭，就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絕不可忘記，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是有不可分離的密切聯繫的。上面已說過，經濟鬥爭，是工人階級爲保證他自身的經濟利益而進行的。但經濟鬥爭如果沒有政治鬥爭的勝利，是不能給工人階級以鞏固的利益的。固然，經濟鬥爭是團結工人階級的武器，固然，經濟鬥爭不能被忽視，而且經濟鬥爭常時與政治鬥爭相錯綜，並可轉變爲政治鬥爭，可是經濟鬥爭並不就等同於政治鬥爭，而且只靠經濟鬥爭，工人階級是決不能得到解放的，工人階級要得到解放，必須經過艱苦的政治鬥爭（包含軍事鬥爭）。這是階級鬥爭最高最重要的形式。把工人階級鬥爭限制於經濟鬥爭的「經濟主義」是拋棄和出賣工人階級的最高的最重要的利益，是資產階級影響的表現。這種「經濟主義」是必須加以反對的。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清楚認識無產階級領導其他革命民衆進行政治鬥爭的重要性，並且把政治鬥爭、經濟鬥爭、理論鬥爭確當的配合起來，聯結起來，成爲統一的階級鬥爭。祇有在上述的意義上，我們才能正確了解「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句名言的意義。

工人階級在政治鬥爭中，爲自己整個的階級利益而奮鬥。也有時部分的工人利益與整個階級利益不相適合的，有時部分工人，可以爲了自己的狹隘的行會的利益（例如爲了自己當前的一些小利，被資本家所欺騙，不參加整個階級的運動）而有害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是一種行會主義的表現，是必須加以克服的。

工人階級有暫時的部分的階級利益和整個的久遠的階級利益。工人固然要爭取自己暫時的部分的利益，但是最主要的是要爭取自己整

個的久遠的利益。部分的暫時的階級利益，應當服從整個的久遠的階級利益。在帝國主義國度內的資產階級，因有從殖民地剝削來的高度利潤，所以可以把殖民地利潤的一小部分，在某一時候以較高工資的形式，分與本國的某些上層工人。在這個收買的基礎上，生長了這些國度中的階級和平和階級妥協的意識，但是這樣所得到的部分的利益，是非常不穩固的（例如，英國在大戰前工人生活狀況，雖然較為好些，但是現在呢？就每况愈下了）工人階級政黨，在革命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經常代表着全部運動的利益（「共產黨宣言」），所以工人階級政黨，需要正確的把工人階級中各個部分的利益和無產階級總任務之利益配合與聯繫起來，對於這一問題的正確的指導，就成為黨在階級鬥爭過程上的重要任務。

黨是不能與階級對立的。工人階級的成份不一，它是由很多各種不同的職業及文化程度不同的集團組成的。這些集團不僅是經濟利益上有某些差別，就是覺悟的程度也是各有不同的。階級為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起見，就不能不有一個代表整個階級的組織，來指揮鬥爭，並克服階級中某些不正確的意識。工人階級祇有在工人階級政黨的指導之下，才能够和資產階級作有力的鬥爭。

在階級社會裡，每個新的生產方式出現後，必然的會產生新的階級統治的形式，它決定各該社會的主要階級和階級關係的性質。在古代社會，主要階級，為奴主和奴隸；在封建社會，為封建主和農民；在資本主義社會，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若抽象的拿剝削制生產方式來看，那末，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看到某種剝削方法所表現出來的兩個階級的劃分。可是實際上，每個社會中，除主要階級外，還存在着別的階級。例如資本主義社會中，還很長期的存在了封建殘餘的階級——地主貴族，他們都是經過很長久的時期，才漸漸與資產階級相融合。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英國貴族還有長時期的存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除主要的中國民族與異族

侵略者的對立外，在國內還有極複雜的階級矛盾，有地主與農民的矛盾，也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在階級社會裡，知識分子（所謂知識分子是指社會上巨數的腦力勞動者）並不是一個階級，知識分子的本身，在社會中是有不少的力量。按他們的地位，可以分屬於各種不同的階級，例如一部分知識分子——銀行經理，各種企業之經理，大律師等——是佔着指揮的地位，很接近資產階級或是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相反的，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幹部——下級職員，鄉村小學教員等——按他們的勞動狀況，是接近工人的。知識分子很大一部分，按其地位、出身、生活條件以及在意識上，又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中國過去所謂士大夫階級，其實只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封建知識分子的集團，決不是地主農民之外的超然的另一階級。由此觀之，知識分子是向社會各階級分化的，雖然他仍保存他自己的特點，他自己的社會形象。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為生存而鬪爭的困難境遇，腦力勞動者的過程，常使一部分知識分子，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必須確當地運用舊的知識分子的人材，同時，並大批培養工農的知識分子幹部，輸送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部門上去。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由於經濟的破產，知識分子經常的遭遇到生活的困難，他們很多是傾向於革命的，並且由於他們在全國人民中是較有知識的人，這一個特別條件，使他們對於民族的命運和災難特別具敏感，使他們成為中國革命啓蒙運動者與喚起民衆的橋樑。中國每一次大的政治經濟變動以前，總有一個時期的學生運動或文化運動作為先兆，就是一個明證，但這並不是說，知識分子可以獨立的推動革命運動，他們在革命中的推動作用，是要當他們站在革命階級的立場上，和這階級及其政黨打成一片的時候，才能够實現的，單獨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本身是無力的」。（見列寧「或是跟着君主制資產階級的尾後，或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及農民的前面」一文）因着他們所站的地位不同，所以中國知識分子雖然大部分是革命的，

也有少部分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所以如果有人說中國今天的革命是中國知識分子領導，那是極大的錯誤。

在現社會裡，另外還有一個中間的集團，就是小資產階級……中農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基礎，依賴於生產手段的小私有財產之上，有一定的很少的生產手段，當時自己勞動，大部分不足以剝削別人的勞動爲生（就是一部分有些剝削，也不是主要的）。小資產階級的成份是複雜的，它的經濟地位是動搖的，他們受到帝國主義的、地主的或資產階級的（隨國度情形而有不同）種種剝削，一部分下層小資產階級，差不多和工人過着同樣痛苦的生活，他們很多破產補充工人階級隊伍。只有極少數的小資產者能達到富裕地位，變成剝削者，加入到資產階級的隊伍裡去。小資產者一方面由於自己的勞動性，所以能够同情於無產階級，另一方面，由於自己的私有（雖然很少）性，所以也能接近資產階級；這種兩重性，完全是從小生產的條件中造成的。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應當領導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爭取民主革命澈底勝利。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應當聯合城鄉半無產階級被剝削群衆，取得小資產階級群衆的中立以至同情，來取得革命勝利。接着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起來的時候，對於農民就應該依靠貧農，親密聯合中農，反對富農；幫助貧農、中農並逐漸改造他們，以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進向共產主義社會。

在小資產階級的階層中，起主要作用的還是農民。我們已經知道，在封建社會中，農民是和整個封建地主（貴族）對立的一個階級。資本主義發展起來時，封建時代的整個的農民階級，就要分化爲好些階層，我們可以分出下列的階層：（一）貧農，他是在一塊極小的土地上耕種的，部分時間還出去做僱工（列寧叫他做半無產階級）；（二）中農，通常，有自己的一些生產手段，還能維持自己的簡單的生活，並且不剝削別人勞動，或是只有很少的臨時的僱傭勞動，他們是農村小有產階級；（三）富農，他們利用僱傭勞動者經營生產，他們是農村的資產階級分子。除這三個集團外，還須加上僱農，他們是農

村的無產者。

農民對於無產階級是最重要的革命同盟者，無產階級要使自己得到革命勝利，必須與農民聯合。只有帝國主義反動資產階級無恥走卒的託洛茨基派、孟塞維克，才會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以及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與領導能力。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革命方針，就是要把廣大的農民群衆，組織於自己指導之下，來進行革命鬭爭；因此，無產階級就要努力使農民群衆不受資產階級影響，而成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者。

在現在中國無產階級忠實地、堅定地與全民族各抗日階級（包括參加抗日資產階級），國內各少數民族聯合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堅持抗戰到最後勝利與建立新中國而奮鬥。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與城鄉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是最基本的堅持抗戰的力量，應當真正喚起民衆，特別是動員廣大的農民熱烈來參加抗戰，祇有出賣民族破壞抗戰的漢奸、託洛茨基派，才會無恥的侮蔑農民，說「老百姓只知道要麵包」，否認農民在抗戰中的重大作用。

## 第四章 國家政權

在上面，我們已經研究過階級社會的起源，階級及其歷史鬭爭的意義，我們知道，在階級的社會裡面，各階級的對立利益的衝突，是必然的，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的。我們更知道，剝削階級，總是居社會的少數；少數人的奴主，統治了巨數的奴隸；少數人的地主，統治了巨數的農民；少數人的資產階級，統治了多數人的無產階級。從這裡，自然而然地發生這樣的問題：怎樣少數人能够統治多數人呢？少數的統治者究竟握有一種甚麼工具，使他們能够壓制和剝削大多數的人們呢？包涵着不可調和之階級矛盾的階級社會，怎樣能够存在了這許多世紀呢？這問題的答覆如下：當階級矛盾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時，就必然產生了一種和緩階級矛盾的特別組織——國家。關於國家，恩格斯在他的「家族，私有財產的起源」一書中，這樣地說道：「國家絕對不是從外面來強制社會的一個力量，也絕不是如黑格爾所斷定的甚麼『道德觀念的實體』，或『理性的外形和實體』，它是社會發展到了某個階段時的產物；它是社會捲入了自己的不可解決的矛盾，和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抗，而又無法擺脫時的表現。而且為使這種對抗，這些經濟利益衝突的各階級不致在無結果的鬭爭中消滅，並使社會同歸於盡，於是一種表面上似乎站在社會之上，而用以和緩衝突，使這些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以外的力量，就成為必需了，這種由社會產生而超出於社會之上且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疏遠的一種力量，便是『國家』。」

在表面的觀察國家作用之時，國家似乎是站在社會以上的一種力量，它似乎是可以調和階級間的矛盾的，事實上，絕對不是如此。國家是一定的組織，其中所包涵的，即是軍隊、警察、官廳、法庭、監獄和學校等等。若是我們很注意地、很詳細地去研究國家機關的各部分——軍隊、警察、官廳、法庭、監獄和學校——之行動，那末，我

們即刻就可以明白，所有這些國家機關的各部分，都是統治階級統治的權力（政權）的機構，都是完全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軍隊和警察，是統治階級的一種極有力的武裝力量；一切的行政機關，也都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法庭、監獄是維持統治階級所規定的法律，而處罰社會上一切違犯這種法律的平民；學校的任務，是在於實行教育，若是被教育者是屬於統治階級的，則教育他為能幹的指揮者（特權的教育者），若被教育者是屬於被統治階級的民衆，則教育他們成為馴服的受指揮的好百姓（一般學校），一般說來，在階級鬭爭過程中產生的國家，是經濟上佔支配地位的階級之組織。握有基本生產手段的階級，同時即是政治上居統治地位的階級，以即是指揮國家機關為自己謀利益的階級。這就是說明為什麼階級矛盾的表面上的「調和」，並非別的，只是有利於統治階級的「調和」；統治階級並不是把自己利益和被統治階級的利益相協調，而是把被統治階級的利益隸屬於統治階級之下。（關於這點，可以參看列寧有名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與「國家與革命」）在奴隸社會時，統治階級是奴主，所以國家也是奴主的國家（不論其形式是貴族國家或是共和國家）；在封建社會，統治階級是貴族地主，所以不論國家的形式如何，國家是貴族地主的；在資本主義社會，有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已經知道，國家本身的產生，是與社會的階級的分化相聯繫的，所以某種國家或政治的制度，都是由某種階級統治的性質來決定的。斯大林說：「國家是因社會分裂為敵對階級而產生的，其所以產生，就是為着剝削者少數的利益來控制被剝削者多數。國家政權的工具，主要都是集中於軍隊，懲罰機關，偵察機關，監獄。國家底活動是表現於兩種基本職能上。內部的（主要的）職能——控制被剝削者多數；外部的（非主要的）職能——依靠侵略他國領土來擴大本國統治階級的領土，或是抵抗他國侵犯而保護本國的領土。以前在奴隸佔有制度和封建制度之下的情形是如此，現時在資本主義之下的情形也是如此。」（「聯共第十八次大會的報告」）所以，「政權是公民社會

中階級對立的正式表現」。（馬克思：「哲學之貧困」）在資產階級國度，「國家政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一般事務的經理機關而已」。（列寧：「國家與革命」）

爲說明上面的話起見，現在來概括地說明各個時代國家的實質。

列寧清楚地指出了：「像我已經說過的，在社會未分成階級以前，國家是不存在的。隨着階級社會區分的產生與固定化，隨着社會階級的產生，國家也產生與固定化起來。」「祇當產生了社會階級區分的第一種形式，當出現了奴隸制的時候，……爲着使奴隸主階級的存在鞏固起來，就必然的出現了國家」。關於奴隸主國家，列寧指出了：「它——奴隸主國家——是這樣一種機關，使奴隸主手中擁有權力，使奴隸主可能統治一切奴隸。那時社會與國家，都比較現在小得多，所擁有的聯繫機關，也比現在差得多——那時沒有現在的交通工具。那時山河與海所給予的阻礙，不知比現在多得幾多；那時國家的組成，是在更狹窄得多的地理疆界的範圍內進行的。技術上薄弱的國家機關，服務了那種處於比較狹窄的疆界內處於狹窄行動範圍內的國家。可見，這總是壓制奴隸使之處於奴隸地位中，並強制社會的一大部分人爲別部分人所壓迫奴役的一種機關。要壓制社會的一大部分人爲別部分人經常地工作，沒有經常的壓制機關是不成的。沒有階級——也沒有這種機關。當出現了階級之時，在一切地方，一切時候，都隨着這一（階級）區分的鞏固，而出現了特殊的機構——國家。國家的形式是非常複雜的。奴隸制度時候，在當時最先進、最文化、最文明的國度裡，例如在古代希臘與羅馬（他們完全建立在奴隸制之上的），我們已看到各種各樣的國家形式。那時已經發生君主國與共和國的區別，貴族制與民主制的區別。君主國是一人專權，共和國是沒有那個非選舉的政權；貴族制是比較不大的少數人的政權，民主制是人民政權（「德謨克拉西」從希臘文直譯是人民政權），這些區別是在奴隸制時代產生的。不管這些區別如何，奴隸制時代的國家，君主國或共和國，貴族制或民主制，都是奴隸主的國家。」「……你們聽到君主國

家與共和國家（指古代的）間所有的鬭爭，可是基本的，都是奴隸不被看做是人，不但不被看做是公民，而且不被看做是人。不說其他保護人格的法律，就是關於殺人的法律，也用不到奴隸上面的。這法律僅僅保護奴隸主，他們是唯一被承認的有完全權利的公民。建立了君主國，那就是奴隸主的君主國，共和國那就是奴隸主的共和國。在國家裡，奴隸主有一切權利，而奴隸則法律上註定是東西，對於奴隸，可以採用任何的暴力，殺死奴隸，不算是犯罪。奴隸主共和國有內部組織的不同：有貴族制共和國，有民主制共和國，在貴族制共和國裡，不大數量的特權者，參加選舉，在民主制共和國裡全部參加，可是全部是奴隸主，而不是奴隸。這一基本情形，應當看清楚，因為它最好地說明國家的問題，清楚地指出國家的實質。」

關於封建國家，列寧指出了：「地主爲着保持自己的權力，就一定要有這樣的機關，使能把極大數量的人統一起來，服從於它，使這些人服從一定的法律規則——這些法律，在基本上，歸結到一點：維護地主對於農民農奴的政權。這是農奴主的國家，它在俄國有過，在那些直到現在還統治着農奴制的完全落後的亞洲國度裡，還有着，它在形式上有共和國與君主國之分。君主國只承認一人專權，共和國，承認地主社會的被選者的或多或少的參加——這是在農奴制社會中。農奴制社會形成了這樣的階級區分，使得極大多數人——農民農奴——完全隸屬於極少數的佔有土地的地主。」（以上引文俱見列寧「論國家」一文）

在西歐，當資產階級社會開始萌芽，資產階級僅僅開始走向和封建的統治階級（地主貴族）鬭爭的道路之時，這時的國家，是絕對（無限制的）君主專制。這種國家，實際仍是地主式的國家。那時，資產階級還沒有充分的力量把政權剝奪到自己手裡來，而經濟上已經減弱的封建主，又不能獨立統治，因此，不能不聽從資產階級的某些要求，並在相當的限度內滿足它的要求，以保證自己地主階級的利益。同時，國王只是地主階級中的最大的地主，他依靠地主貴族而壓制資

產階級，同時，又部分地從資產階級手裡取得維持國家機關的經費，當國王要影響那些企圖限制國王行動的地主貴族時，他自己又依靠於資產階級。但無論如何，他總是為統治階級謀利益的：他給地主以剝削農民的必須手段，給資產階級以剝奪勞動人民的必須手段。

當機器技術的發展，資產階級已經強固起來，國家的形式也變更了。資產階級因自己經濟力量的增加，所以要求在國家機關中擴大參加之權，換句話說，即是想增大本階級的政治勢力，如是，就產生了有限君主專制政權。在這時候，有限君主專制就代替了無限君主專制。君主的政權，受了所謂「人民代表」制的限制。這種有限的君主政權，也稱為「君主立憲」。因資產階級社會中封建殘餘力量大小之不同，君主立憲制，也分為二種，二元的君主立憲和國會的君主立憲。在二元的君主立憲國家中，除資產階級統治之外，還保留有地主統治的殘餘。在這種形式的國家之中，還保留有絕對君主制的殘餘。但同時已有「人民代表」的存在；在此地，君主的權力，似乎是由國會來限制的，可是內閣則是由君主任命的，而且可以不顧國會的意旨；同樣的，內閣也只對君主負責，而不是對國會負責（這樣國家的例子，如一九一八年革命前之德國）。國會的君主政體，則已是比較純粹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形式了。這種地主貴族統治的殘餘，差不多是沒有了。在這裡，資產階級是完全的執政者。雖然有些國家（如英國）仍然保存其君主的形式，但其實際的權力，則極微末，它是沒有重大作用的，在國會制的國家裡，內閣是由國會中獲得多數票數的政黨來組織的，內閣對國會負責，而不是對君主負責。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國會制的君主國與國會制的共和國，在實質上是沒有什麼分別的，雖然在形式上君主國是世襲的，而共和國的大總統則是選舉的，但在實際上，二者之政權，都不在總統或君主手上，而是在內閣手上，就是說，握在資產階級的有力的政黨手中，所以說，實際政權，是在資產階級之代表手上（例如，現在英國即是君主立憲之例，而法國則是共和國之例）。自然，最適當的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是民主共和

國。「自由主義的君主立憲國，也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一）在開始，當資產階級還未完全脫離絕對君主政體之束縛之時；（二）在結束，當無產階級要造成太過危險的民主共和國之時。但無論如何，民主共和國的形式，總是資產階級最後的統治形式，也就是資產階級依以滅亡的形式」。（一八八四年恩格斯致倍因斯坦書）

當我們討論資產階級國家形式，國會君主國或共和國之時，我們似乎忽視了這一事實，即在國會中，除資產階級之代表以外，還有其他階級的代表，根據這點，資產階級的學者，就以爲資產階級的國會主義，是代表全國各階級利益的國家形式。這是不是對的呢？當然是完全不對的。不錯，普選制的民主共和國，和封建專制國家比較起來是一種大的進步。普選制也是勞動人民不斷的英勇奮鬥才爭出來的。所以，「普選制是工人階級成熟的標誌」。（恩格斯）但是，資產階級國家中之所謂「普選制」，事實並不是普選，因爲在資產階級國家中，選舉權是有財產限制的，選舉權或被選舉權，都不是全體某種年齡以上的國民所有的；而是受最低限度收入的限制。選舉人須有一定的財產的標準，被選舉者，須有更高的財產的標準。對於選舉權之限制，除財產之大小外，還有知識程度的限制。這些都是不利於工人、農民，而只是利於資產階級的。這是全民嗎？當然不是的！

除此而外，在有些資產階級的國家裡，對於選舉權，還加以居住時間的限制（在法國半年，在挪威則長至五年）。很明顯的，這又是不利於工人、農民的，工人是出賣自己勞動力的，他們不能經常在一地久居，他們時常由這一城轉到別一城去。還有好些資產階級國家裡，婦女是沒有選舉權的。更有些國家，剝奪海陸軍兵士的選舉權。這裡，當然很明顯的，婦女選舉權之被剝奪，主要的是爲對付大部分農婦女，因爲她們，正是和男人一樣，參加社會勞動的。對於海陸軍兵士的剝削限制，是完全要使海陸軍人沒有可能參加國會討論問題的解決，使他們馴良的受統治者的指揮，而成爲統治階級之工具。

可是我們在討論的問題上，最有重大意義的，還是資產階級的經

濟力量。資產階級國家裡，資產階級「民主」，實際上也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祇有在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才能在改選之時，大規模地利用宣傳及鼓動的工具，應用大批金錢，來作廣大的宣傳；他們握有大部分的報章，他們擁有很多的公共集會場、廣播台，他們可以自由的開盛大的改選會議，他們可以撥巨量的經費，來遣派演說家到各城市和鄉村去，作廣大的宣傳；他們還利用教堂的牧師，去愚弄民衆，叫他們選舉資產階級的代表，諸如此類的怪現象，真是不勝枚舉。因此，就在國會主義之下，人民的代表，也並不是真正的人民的代表。他們除極少數的例外，都是只代表統治的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國會不過是資產階級統治機關之一而已。

法西斯蒂國家——大戰後，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度內，發生了一種最反動的國家組織——法西斯蒂國家。

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乃是最反動、最主張民族侵略主義，最抱帝國主義野心的財政資本家底公開的恐怖的專政」。（季米特洛夫）「法西斯主義，並不是超階級的政權，也不是小資產階級或流氓無產階級控制財政資本的政權。法西斯主義，乃是財政資本自己的政權。這是用恐怖手段摧殘工人階級、革命農民及革命知識分子的政權。在對外方面，它是最野蠻的侵略主義，像野獸一般地仇視，侵略其他民族。

雖然，由於各國歷史的社會的條件的不同，由於各國民族特性及國際地位的不同，所以，法西斯主義的發展，和法西斯專政的本身，在各國所採取的形式，也各有不同。雖然，法西斯主義會無恥地根據各民族特點，甚至各社會階級的特點，來實行其欺騙武斷的煽動，和騙人的宣傳。但是，「無論法西斯主義所戴的假面具怎樣，無論它的活動形式怎樣，無論它上台執政的方式怎樣，可是，法西斯主義——就是資產階級向勞動群衆施行的最殘酷的進攻；法西斯主義——就是橫行無忌的民族侵略主義和強盜的戰爭；法西斯主義——就是瘋狂猖獗的反動和反革命；法西斯主義——就是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群衆的

死敵」。（季米特洛夫）

為什麼財政資本家要採用法西斯主義呢？

因為，極端深刻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猛烈爆發，因為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特別緊張化，因為資產階級政治之趨於動搖，於是財政資本家，便日益依靠法西斯主義來挽救自己垂死的壽命。

「帝國主義者，想把整個危機重擔，完全堆在勞動群衆身上。因此，他們需要法西斯主義。」

「他們想以侵略弱小民族，加緊壓迫殖民地和進行戰爭來重新瓜分世界等辦法來解決市場問題，因此，他們需要法西斯主義。」

「他們想用先發制人的手段，來阻止革命力量的增長，因而企圖預先打破工農革命運動和武裝侵犯蘇聯——世界無產階級的堡壘。因此，他們需要法西斯主義」。（季米特洛夫）

法西斯主義的勝利，「不僅是表明工人階級底力量還薄弱，不僅是因為社會民主黨叛變了工人階級而給法西斯主義掃清了道路。而且還是表明資產階級底力量已經軟弱，資產階級在內政方面已經不能採用舊的國會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法來維持其統治，因此，就祇得實行恐怖手段的行政；而在外交方面，已經不能依據和平外交政策以找得擺脫現狀的出路，因此，就祇得採用戰爭的政策」。（斯大林）

絕對不應當把法西斯主義上台執政，看做是普通的一個資產階級政府之代替另一個資產階級政府。法西斯主義之上台執政，是表示由資產階級統治的某一種國家形式，替代其另一種國家形式，就是說，由資產階級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替代資產階級的民主制的資產階級專政。

更絕對不應當把這種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形式的變更，看做是和工人階級不關痛癢的。馬、恩、列、斯指明了：在某個國度中，究竟存在着什麼政體，這對於工人階級與人民的解放運動，是有絕大的關係的。因此對於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資產階級專政，或是公開的法西斯

主義的專政，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是必須有正確的態度與對策的。

固然，無產階級民主，才是真正廣大人民的民主，才是最高的與最廣泛的民主（如蘇聯所實現了的）。這種民主是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所主張與擁護的最高的民主。但是，要實現這種最高民主，就必須要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在未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前，雖然資產階級民主制，對於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人民，只有極有限的民主權利和自由，但是，它比法西斯主義之公開的恐怖的手段，比剝奪人民之一切最低限度的民主權利，却是一種進步。因為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工人階級還有某一部分的權利和合法的可能組織自己的力量去保衛自己的利益。而且，這一部分的民主權利，也還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經過了無數次的英勇鬪爭，受了多少犧牲，才得來的。

所以，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必須堅決領導勞動人民，用盡一切力量，來捍衛自己許多年來艱苦奮鬥所奪得的每一絲毫的民主權利，並堅決地為擴大這種權利而奮鬥。

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對於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態度，並不是在一切條件之下都是一樣的。在無產階級革命形勢已經迫近的時候，在資產階級民主制成為發動反動力量來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旗幟的時候，那就應當集中火力，去反對這種形式的資產階級專政。而當法西斯蒂的反革命勢力攻擊資產階級民主制，企圖取消資產階級民主的最後一點殘餘，而在工人階級和廣大的人民身上建立最野蠻的剝削和壓迫的制度時，當勞動人民眼前所不得不具體選擇的，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資產階級專政，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時候，那就應當集中力量來反對法西斯主義，為保衛和擴大人民既得的民主權利而鬪爭。

祇有工人階級力量的統一，以及一切保衛民主的人民力量的統一戰線，才能戰勝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專政是殘暴的，但同時却又是不穩固的財政資產階級的專政。

二、國家  
政權與政  
府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

這就是國家的實質。國家有兩種重要的特點：第一，國家是有一定的統治的領土範圍的，「它依照地域來分治其下的人民。（列寧：「國家與革命」）

第二，國家的組織是採取政權的形式，「是社會政權的建立」。政權，可以說是國家的表現形式。政權的工具，主要是集中於軍隊、政府、懲罰機關、偵察機關、監獄、警察等上面，此外還有學校、文化機關之類，都是幫助統治的工具。這些工具，尤其是其中主要工具軍隊等等的「特殊武裝隊伍」，造成一種武裝力量，使統治階級能够用這種力量對內來壓迫被統治階級，對外來侵略別國領土，或者抵抗別國侵略保衛本國領土。這就是國家的兩種職能（上面已說過）。

國家的兩個基本的職能，在其演變的過程上，在各個階段與各種情況中，就要採取不同的政權形式來表現。例如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可以有種種不同的政權形式，法西斯蒂等等。列寧說：「各資產階級的國家形式是非常複雜的，可是它們的實質却是同一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這樣或那樣，但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複雜的政治形式，但實質在這裡却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

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從十月革命到現在，它的職能與形式，也是經過了兩個階段的（見下）。

國家政權和政府是有分別的。政府只是政權的一個部分，而且還不是主要的一部分。因為上面我們已經說過，除政府外，政權還包含軍隊、法庭、監獄、偵察機關以至學校等等，而其中主要則是軍隊等等「特殊的武裝隊伍」。所以政府並不就等於政權，政府也並不等於國家。政府是國家的上層機關，是它的上級領導機關。所以如果國家的根本的階級性，不經過革命的改變（就是根本推翻舊的反革命政權，建立新的革命政權），而只掉換一個政府（如大戰後歐洲曾有多次

社會民主黨組織了政府），那末國家的根本階級性質還是沒有改變的。不過政府雖然不能改變國家的根本的階級性質，但是它可以決定和執行國家的許多日常政策，依據不同的客觀條件，來規定實行政策的各種不同的具體方法。所以在這上面，就要反對兩種錯誤的觀點：一種觀點以為只要經過國會選舉，掉換政府與內閣，就可以改變國家的根本階級性質，從資產階級國家和平地轉到社會主義國家去。這是完全抹煞了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應當破壞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有名原理，這是適合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謬論。因為資產階級由於客觀情形的必要，可以有工黨、社會民主黨內閣的政府，而這工黨、社會民主黨政府，並不改變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本質。許多社會民主黨政府的經驗，已經最清楚沒有地證明了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的謬誤。同時我們也應當反對另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政府的改變，對於工人階級與人民沒有關係。這也是錯誤的。為什麼？因為政府雖然還不能改變國家的根本的階級性，但是比較進步的政府，却可以使其日常政策與實行政策的方法，在一定程度內，比較減輕一些對工人階級及廣大民衆所加的苛待。

此外還應當反對那種認為在革命未勝利前沒有可能組織統一戰線政府的那種觀點。統一戰線政府，在一定條件之下是可以而且應當組織的。例如在資本主義國度內，在發生一定的政治危機，並且具有組織統一戰線政府的條件時，就應當組織人民戰線政府，去反對法西斯主義與反動勢力。人民戰線政府應當是由於統一戰線運動的結果而產生的政府。它應當毫不限制工人階級政黨及民衆組織的活動，應當堅決反對法西斯帝及其走狗。組織這種政府的問題，應當和政治的危機的存在聯繫起來，應當和工人階級及勞動人民的統一戰線的群衆運動底發展聯繫起來。這種政府是和一切自稱「工人政府」的社會民主黨政府根本不同的。因為，社會民主黨政府，乃是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合作以保持資產階級統治的一種工具，而人民戰線政府則是工人階級政黨與其他反法西斯主義政黨合作以擁護整個勞動人民利益的機

關，是進行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反動勢力的鬪爭之政府。人民戰線政府，應當進行適合於形勢的革命的要求。在某些資產階級國度內，人民戰線政府也許會是過渡或接近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種形式。爲着吸引真正廣大民衆到革命先鋒隊方面來，適當的過渡形式的運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發生政治危機時，可以建立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戰線政府，只要這種政府真正進行反對人民公敵的鬪爭，並給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以行動的自由，那末工人階級政黨是會盡量擁護這一政府的。但是應當對群衆公開說：這種統一戰線政府，決不能澈底挽救民衆，不能推翻剝削者的階級統治，不能改變資產階級國家的根本階級性，因此也不能一勞永逸地消除法西斯蒂反革命的危險。所以必須準備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才能澈底挽救人民。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有工農政府。這工農政府是執行無產階級國家的任務，它的基本階級性，是無產階級的。工農政府，不僅不與無產階級專政相違背，而且正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必須的政府組織形式。斯大林說：「我們主要的趨向是工人與農民基本群衆的聯合保存與鞏固起來，使得執政的無產階級在這個聯合中的領導能保存和鞏固起來，除此種聯合外，那末我們的政府絲毫無力量，我們也沒有可能實現剛才我們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種種任務。……我們還要注意：（一）工農聯合，不是爲保存農民這一個階級，而是要改造他們使之走向恰恰適合於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方面；（二）蘇維埃政府鞏固此種聯合政策，不在鞏固階級，而在消滅階級，而在加緊消滅階級的速度。」（「關於工農政府問題」）

上面已經說過，國家除第一種基本職能——統治階級壓制被統治階級——之外，還有第二種基本職能——侵略別國，或是抵抗別國侵略的職能。

因此，在各個國家間，在一定情況之下，要發生戰爭。當然戰爭不僅發生於國家與國家間，而且

三、戰爭  
問題

發生於階級與階級間。

戰爭是什麼？一般地說，戰爭就是以武力來達到一定政治目的手段。「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上，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毛澤東）列寧說：「戰爭不僅是政治的繼續，而且，政治在戰爭中發展着。」

戰爭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將來永遠要有的。社會上有了階級的對立，有了剝削階級的統治，有了剝削階級國家，就會有戰爭的發生。將來全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實現了，階級消滅了，各民族都親密聯合了，戰爭也就要最後消滅。

從其表現的形式上看來，戰爭有對外的國家與國家間的戰爭與國內的階級與階級間的戰爭之區別。

從本質上看來，戰爭有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之區分。

正義的戰爭，就是反侵略的、求解放的戰爭。這或是保衛本國人民，保衛本國革命勝利，抵抗外來的侵略的戰爭，或是使人民從封建的壓迫下，從資本主義奴役下解放出來的革命戰爭（如保衛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戰爭（民族革命戰爭）。例如：

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所進行的民族武裝起義和民族革命戰爭，是這種性質的戰爭（如中國的抗戰）。

工農勞動大眾反對封建勢力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武裝起義和革命戰爭，是這種性質的戰爭。

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武裝起義和國內戰爭，是這種性質的戰爭。

社會主義國家，抵抗資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侵略，保衛社會主義祖國和幫助解放他國人民的戰爭，是這種性質的戰爭，等等。

對於正義的戰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該堅決的擁護，和積極的參加。

非正義的戰爭，就是侵略的、掠奪的為反動統治効力的戰爭。其

目的在侵略別的民族、別的國家和鎮壓民衆革命力量。例如：

資本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侵略別的民族的戰爭，是這種性質的戰爭（如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

帝國主義列強間，爲爭奪殖民地而進行的戰爭，是這種性質的戰爭（如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的帝國主義大戰）。

封建反動階級反對民主革命的戰爭，是這種性質的戰爭。

地主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戰，是這種性質的戰爭。

資本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是這種性質的戰爭，等等。

對於這種非正義的戰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當進行堅決的鬪爭去反對它；應該用民族革命戰爭去反對民族侵略戰爭；應當用反對本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列強間的戰爭（如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時的世界帝國主義大戰）；應當用革命的戰爭去反對地主資產階級所進行的內戰；應當用保衛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高舉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的旗幟去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的反革命戰爭。一句話，應當進行正義的戰爭，去反對非正義的戰爭。

祇有用正義的戰爭去消滅非正義的戰爭，才能求得真正的和平。這是關於戰爭問題的正確理論與策略。

在第二章（論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和第三章（階級鬪爭的學說）裡，我們已經研究過，共產主義是一種社會經濟的結構；我們知道，共產主義社會是無產階級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極樂社會，而共產主義之建設者，則爲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廣大城鄉勞動群衆。在下面第八章裡，我們還要詳細研究一般的革命問題，並且還要研究歷史上無產階級作用的實質，從整個社會發展學說的觀點上來研究這些問題。這裡我們僅僅研究與國家學說

相關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們在此地主要的就是研究無產階級是否需要自己政權的問題。如果需要，那末，應該是怎樣一種形式的政權機關？怎樣才能用政權之力去戰勝資產階級的國家？握取政權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國家的關係，又應如何？

首先就要說，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無產階級的重大任務，是在於把生產手段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過來，並且把這些生產手段轉為全社會所有。以前，大資產階級把生產手段握到自己手中，使大批勞動群衆，逐漸無產階級化（對於農民、手工業者、小資產階級的剝削）；現在須從資產階級的手中，將它剝奪所得的生產手段，奪取過來（對於剝奪者的剝奪）。馬克思這樣的說道：「這個剝奪，是由資本主義生長的內在法則，資本的集中，來完成的。一個大資本家消滅了很多的小資本家。與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於很多資本家的剝奪共同往前發展的，有勞動過程的協力形式，自覺地科學的技術應用，有計劃的土地的應用，只能共同應用的勞動工具的製造，社會勞動聯合上生產手段的經濟化，各方人民之被捲入世界市場中，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性，在這個變革過程上掠取並獨佔全部利益的資本大王之數目，不斷減少。同時，貧窮、壓迫、奴役、墮落、剝削等等，不絕往前發展，而工人階級（它的數量，不絕增加，並且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構所訓練及組織）的義務，亦日益增加，資本的獨佔，變成了生產方式的阻礙物，這一生產方式，以前正是依靠於資本獨佔，資本獨佔一起繁榮的狀態。生產手段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使它已不能為資本主義的外殼所容。這種外殼，終於破裂，剝削者將被剝奪了。」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最明顯地表現於不絕震撼整個經濟機構的經濟危機及帝國主義戰爭上，在這戰爭上，資本主義國家，利用最新的技術，來破壞社會的文化。帝國主義戰爭，正是資本主義社會開始崩潰的最明顯的證據。同時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了在歷史上破滅資本主義社會，建設新社會的一種力量，這力量就是無產階級。資本主

義生財，是建立在廣大的社會分工之上，並非是爲着供給社會的需要而生產的，因之，生產是社會化的，可是佔有的形式，却仍和以前一樣，是私人的資本家的佔有形式，所不同的，只是在於以前的生產手段所有者——小工業者——佔有自己勞動所產的生產品，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所有者——資本家——則佔有別人勞動所產的生產品。因此，在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家私人佔有形式之間，發生了深刻矛盾，這矛盾表現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尖銳的鬭爭之上。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中的地位，絕頂明顯地反映出那種毀滅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當經濟恐慌發展之時，資本主義的整個機構，都要爲之震撼，可是受苦最甚的，却還是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在某些企業中，生產縮小，在別一些企業中，生產完全停頓，這些就造成了成千成萬的失業工人，這些失業工人，就不得不躡躅於街道之旁，陷入於飢寒之境，而在業的工人，亦更受到加重的壓榨，其他勞動人民，也要受到加重的剝削與壓迫。當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之時，資本主義社會全部的文化，都爲之毀壞，戰爭的重負，完全落於千百萬的無產階級和勞動民衆的身上。所以當無產階級起來謀自己的解放之時，它代表着本階級的利益，同時代表着全社會的整個利益。

要脫離資本主義社會所陷的絕境，只有一條道路，即社會主義的革命，資本主義生產手段私有制的消滅。無產階級用革命的手段去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手段的私有制，消滅人對人的剝削，同時也就解決以前社會內部所包含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工廠作坊的工人，不是別的，正是全部被剝削人民的最先進的代表」（列寧在一八九四年這樣說的）。很明顯的，在革命的過程中，無產階級正起着領導作用，正是領導的階級。無產階級，聯合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無產階級聯合城鄉一切被剝削的民衆，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

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轉變，是一定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

工人在最初時，用散漫的形式，來反對自己直接的僱主，以後，工人運動，就進到與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鬭爭的地步。隨工人覺悟性與組織性的提高（見第二章）與工人運動的發展，工人階級更甚地領會到政治鬭爭的意義，奪取國家政權鬭爭的意義。社會主義革命一開始，無產階級即應奪取政權到自己的手中來。從資本主義轉到共產主義，並不是立刻就能到達的，這個轉變，必須經過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過程中，無產階級還不可免地要和被革命推倒的地主資產階級之殘餘，作堅決之鬭爭。資產階級決不會自願的放棄自己的特權，它還要繼續掙扎，企圖恢復本階級的獨佔的權利，恢復它的生產手段的私有權，回到舊時的統治地位。因此必須用堅決的手段，去粉碎地主資產階級殘餘的這種反抗。推翻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必須有自己的強有力的國家機關，資產階級的專政，應該被無產階級專政所代替。無產階級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之後，應該建設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

無產階級的專政是「一種絕頂嚴格的、急速的、堅決的暴力，用以壓倒剝削者、資本家、地主等等的反抗」。（列寧：「致匈牙利工人的祝詞」）「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並不是僅僅在於暴力，而且主要的還不是在於暴力，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實質，還是在於勞動群衆先鋒隊、前衛隊、唯一指導者——無產階級——的組織和紀律。無產階級的目的，是在建立社會主義，消滅社會階級的區分，使全社會的人都變成勞動者；毀滅一切人對人剝削的根基。這一目的，並不是立刻可以達到的。為達到這一目的起見，須經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一個很長久的時期——因為生產之改造，不是很容易的事，因為，為根本改造各方面的生活起見，需要很長的時間；小資產階級的及資產階級的經濟生活的巨大習慣力量，必須經過長期底嚴格鬭爭，才能克服」。在這段文字中，列寧已把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區別，資產階級國家和無產階級國家的基本區別，指示出來了。無產階級專政之目的，是在於根本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而造成無階級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專政，又是實

行最高的民主，它是和資產階級在根本上不同的。「資產階級爲着掩飾自己的真面目起見，稱民主共和國爲「全民的政權」或是一般的民主，或是所謂純粹的民主；實際上，它完全是資產階級的專政，剝削者對於勞苦群衆的專政。……在事實上，民主共和國立憲會議……都只是資產階級的專政。……祇有無產階級，才能把人類從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欺詐的資本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而造成勞動者的民主，來代替剝削者的民主；就是說，造成那一種民主，使工人和貧苦農民在事實上能够享受得到；至於現在那樣的民主（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包括在內），那末它在實際上是爲經常的大多數勞動群衆所不能享受的」。（列寧：「資產階級關於出版自由的虛偽」一文）「這一時期（無產階級革命以後時期）的國家，不可免的必須是新的民主（爲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和新的專政——用來反對資產階級。」（列寧：「國家與革命」）

我們已經看到，無產階級專政，是把資本主義社會改造爲共產主義社會的不可免的道路，這個專政是與社會主義革命過程必然相聯的，因此我們在解答爲什麼十月革命所造成的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恰當形式的這一問題之時，我們首先應該說明：（一）在十月革命之時，資本主義社會是不是已經發展到這樣的階段，使社會主義革命（因此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成爲必不可免？（二）社會主義革命，爲什麼在歐洲資本主義比較落後的俄國首先勝利？

關於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時期的問題，列寧在其著作上，給我們以很明白的指示：「在現時（約自二十世紀開始）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已經到達了帝國主義的階段。帝國主義，或財政資本時代，是這樣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經濟，使在此時，資本家的獨佔組織——新迪加·卡特爾·託拉斯——得到了決定的意義，巨量集中的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溶合起來；對於外國的資本之輸出，發展到極大之限度；全世

界的領土，已經爲最富強的國家所分割完畢；並且國際託拉斯對於世界經濟的瓜分，已經開始，帝國主義的戰爭——就是爲着爭全世界的統治，爲着爭銀行資本的市場，爲着爭對少數民族及弱小民族的剝削，爲這些問題而起的戰爭——是不可免的。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的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就是如此。全世界資本主義一般發展的提高階段，自由競爭之爲獨佔資本主義所代替，銀行以及資本家聯合對於調劑生產過程及生產物分配過程的機關之準備，與資本壟斷同時發展的生活費用的昂貴，新迪加對於工人階級的壓迫，工人階級經濟政治鬭爭的極大的加緊；帝國主義戰爭所產生的苦難、災禍、破產、狂暴等等——所有這些，都使現在到達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成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這一時代已經開始了。祇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把人類從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火坑裡挽救出來。」（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社會民主工黨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綱上理論的政治的等部分的修改草案」）所以，對於第一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是已經來到了。

現在來看第二個問題，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俄國得到勝利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幾個：

「一，十月革命所遇到的是這樣一個比較薄弱的、組織得不好的、少有政治經驗的敵人——俄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還未強固的、完全依賴於政府定貨的俄國資產階級，既沒有政治獨立性，又沒有充分自動性，而這種獨立性與自動性是爲它找到現狀出路所必需的。它既沒有大規模的政治拉攏和政治撞騙的經驗，如像法國資產階級所有的那樣，又沒有大規模的狡猾妥協的經驗，如像英國資產階級所有的那樣。它昨天還是力圖和那被二月革命所推翻的沙皇實行妥協的，即當它在二月革命後執掌政權時，它除了在一切基本問題上繼續可恨的沙皇底政策外，就不能想出任何較好的辦法。它也和沙皇一樣主張『戰到勝利結局爲止』，而不顧國家已無力再戰，人民和軍隊已被戰事弄得疲困不堪了。它也和沙皇一樣，主張在基本上保持地主土地私有制

，而不顧農民因缺乏土地和遭受地主壓迫而奄奄待斃。至於對工人階級的政策則俄國資產階級比沙皇更加仇視工人，因為它不僅力圖保存與加強工廠主的壓迫，並且採用大批停業辦法而使這種壓迫成為更難忍受了」。

「無怪乎人民在沙皇政策與資產階級政策之間，看不出切實區別，並且將其對於沙皇的仇恨轉向於資產階級臨時政府」。

「當妥協黨——『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在人民中間還有相當的影響的時候，資產階級會能夠躲藏在它們的庇護之下並把政權保留在自己手裡，但是，當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已經暴露自己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走狗，並因此而在人民中間喪失了自己的影響的時候，資產階級及其臨時政府就懸在空中了」。

「二、領導十月革命的，是俄國工人階級這樣一個革命階級，這個階級是在鬪爭中受過鍛鍊的，它在短期間內就已經過兩次革命，而在臨到第三次革命前夜，它並且已經取得在爲和平、爲土地、爲社會主義而鬪爭中的人民領袖威信。如果沒有像俄國工人階級這樣一個配受人民信任的革命領袖，那就不會有工農聯盟，而沒有這樣的聯盟，則十月革命就不會勝利了」。

「三、俄國工人階級在革命當中有佔農民人口絕大的多數貧農這樣一個嚴重的同盟者。革命八個月的經驗——而這經驗是完全可以等於『常態』發展幾十年的經驗的——對於農民勞動群衆，不是徒然過去了的。在這個時間，他們會有可能來在事實上考驗俄國一切黨，並且確信：無論是『立憲民主』黨人，無論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都不會去認真和地主鬪爭並爲農民利益去流血；在俄國只有一個黨才是和地主沒有聯系的，並且是準備推翻地主以便滿足農民需要的，——這個黨就是布爾塞維克。這個情況，就成了無產階級和貧農聯盟底實在的基礎。而工人階級與貧農之存在，就已決定了中農的行爲，而中農是曾經動搖許久的，只是臨到十月起義時才着實轉到革命方面來，而和貧農結合在一起」。

「根本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樣的聯盟，那末十月革命就會不能勝利了」。

「四、領導工人階級的，是布爾塞維克黨這樣一個在政治鬥爭中受過鍛鍊的黨，只有像布爾塞維克這樣的黨——這個黨是充分勇敢，以至於是引導人民作堅決的衝擊；這個黨是充分慎重，以至於足以繞過路途上所有一切任何暗礁而達到目的，——只有這樣的黨，才如此善於把這樣一些不同的革命運動，如爲爭得和平而進行的一般民主運動，爲奪取土地而進行的農民民主運動，被壓迫民族爲求得民族平權而進行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無產階級爲推翻資產階級、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的社會主義運動，匯合成一個總的革命巨流」。

「毫無疑義的，這些不同的革命巨流，就決定了資本主義在俄國的命運」。

「五、十月革命是開始在這樣的時候，這時帝國主義大戰正在熾烈；這時，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會分成兩個彼此敵視的營壘；這時，他們因忙於彼此間的戰爭和互相削弱之故，會沒有可能來認真干涉『俄國事件』和積極出來反對十月革命」。

「毫無疑義的，這個情況，是大大促進了十月革命的勝利」。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七章）

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開了世界革命的新紀元，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建成，正是世界革命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最偉大的勝利。

這就說明，爲什麼社會主義革命首先發生於俄國，社會主義社會，首先建成於蘇聯。由此就會發生過以下的問題：俄國在一國內建成社會主義是否可能呢？列寧根據其一貫的革命理論在一九一五年得到了結論指出：「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的不平衡，這是資本主義的絕對定律，因此社會主義最近在不多的甚至於在一個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度內獲得勝利是可能的。這一國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剝奪了資本家，在自己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這樣就會起來反對其餘資本主義世界，其辦法就是吸引各國被壓迫階級到自己方面來，並加強它們反對

資本家的起義，如必要時，甚至用軍事力量來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以上這段文字，是他在十月革命前一九一五年寫的。可是作出這結論所需的一切基本的成份，列寧早在一九〇五年所著的「兩個策略」一書以及其他許多著作中，已經完全具備了。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在其「論合作社」一文上，更這樣的說道：「國家對於全國大生產手段的所有權，無產階級手中的政權，無產階級同成千成萬的小農和貧農的聯合，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的保持等等，——所以這些，難道還不够使我們從合作社，僅僅從合作社……建立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難道這些還不是建立完全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須的一切嗎？」關於一個國家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已經得到了明白確切的回答，一個國家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在蘇聯已經成了活生生的事實。蘇聯一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正在向共產主義社會邁進着。

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開了世界革命的新紀元，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建成，正是世界革命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最大的勝利。

斯大林對於這個問題，更給了清楚明確的闡明：「……這個問題是包含有兩個不同的問題：（一）我國（指蘇聯——作者）內部關係問題，就是戰勝本國資產階級與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問題。（二）我國外部關係問題，就是說，完全保證我國免除武裝干涉危險和復辟危險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已被我們解決了，因為我國資產階級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這就是我們所說社會主義勝利，或者更確切的說，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如果我們國家是在海島上，如它周圍沒有其他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話，那我們可以說這勝利是最終的。但是因為我們不是住在海島上，而是在一個『許多國家的整個體系』裡，其中大部分國家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採取仇視態度，製造着武裝干涉與復辟的危險，那末我們公開地誠懇地說，我國內社會主義勝利還不是最終的。因此第二個問題，現在尚未解決，還得去求解決。並且用第一個問題解決的方式，即用我國本身的力量

量來解決第二個問題，是不可能的。祇有在國際無產階級的大努力與全蘇聯人民的更大努力的配合情形之下，才能解決第二個問題。祇有法西斯走卒的託洛茨基派，才能爲着他們主子的利益，無恥的否認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完全勝利的可能。鐵的事實已經把他們這種否認的胡說完全粉碎了」。

在解答了上述二個問題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而研究蘇維埃——新國家的形式——的意義之問題。爲革命政權形式，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工農民主專政可也採取這一形式）的蘇維埃，產生於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時期。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產生了實際上實現了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雖然實現得非常奇特，而且那時妥協黨的「社會革命」黨的與孟塞維克，佔了蘇維埃的上層領導）。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俄國無產階級握取了政權，取得了統治的地位，建立了新的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這一專政的任務，是在於鎮壓被推翻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反抗，鞏固工農聯合，改造小農經濟，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爲完成上述任務起見，無產階級必須有新的蘇維埃的國家形式。

無產階級需要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用無產階級民主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爲着這一目的，無產階級需要這樣一種新式組織，它不僅能够用無產階級的民主去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够成爲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基礎。這樣的新式組織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與舊式組織比較起來有那些優點呢？

- 一、蘇維埃是最包括一切無產階級的群衆組織。
- 二、蘇維埃不僅包括一切工人，而且包括農民、海、陸、空軍的兵士及知識分子等一切勞動群衆的群衆組織。在蘇維埃中，無產階級可以最容易地和完全地實現對於群衆鬪爭的政治領導。
- 三、蘇維埃是群衆革命鬪爭（革命時實行武裝起義，革命勝利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的最强有力的機關。
- 四、蘇維埃是群衆本身的直接組織，是群衆的最民主的與最有威

權的組織。它最能吸收最廣大群衆來參加國家的管理，最能發揚群衆的革命積極性。

五、蘇維埃政權是各個地方蘇維埃聯合而成的總的國家組織，是無產階級的國家組織。

所以，蘇維埃是國家組織的新形式，與舊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有原則上的差別。它是新形式的國家，是適合於無產階級的任務的（當然這不是說一切的蘇維埃都是無產階級專政，例如過去中國蘇維埃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曾是工農民主專政）。

蘇維埃政權有些什麼特點呢？

一、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下，蘇維埃是一切可能國家形式中最廣泛與最民主的國家組織。它在各方面保證最大多數人民（工人、農民、勞動知識分子）有最廣大的民主，它是大多數人民統治少數人的政權，是這大多數人民的國家，是大多數人民的專政的表現。

二、在有階級的社會中，蘇維埃政權是一切國家組織中的最有國際性的組織。它反對並粉碎一切民族壓迫，它使各民族自願地團結成爲一個親密的聯盟（如蘇聯就是五十多個大小民族親密團結的大聯盟）。

三、蘇維埃政權就其本身結構（見上節）講來，使無產階級易於領導其他被壓迫、被剝削的群衆。

四、蘇維埃將立法、行政、司法等權合併爲統一的國家組織。它以生產單位（如工廠、農場、機關、學校等）的選舉制來代替區域的選舉制。它使工人及一切勞動群衆和國家機關直接聯繫起來。

五、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使軍隊脫離對於資產階級指揮的服從，使無產階級和軍隊真正融合起來，創造出強有力的紅軍，來保護社會主義的勝利。

六、只有蘇維埃才能一下子澈底破壞舊的資產階級的官僚機關與司法機關，而組織起新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與法庭等。

七、蘇維埃吸收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群衆組織，來經常地參加國家管理。只有蘇維埃才能準備將來的國家的衰亡（國家的衰亡，是共產

主義的基本特徵之一)。

在蘇維埃的這一政治形式中，應該完成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完全勝利。所以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最高的民主機關的形式，而且是唯一的能够保證最順利的過渡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形式。

因此，蘇維埃就是獲取政權的無產階級所必需的國家形式，是無產階級專政時代所必不可少的國家形式。可是，在蘇聯，除無產階級外，還有廣大的農民，他們是同樣參加蘇維埃政府的。這種情形，是否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以及蘇聯無產階級國家論斷相矛盾呢？當然是絲毫沒有矛盾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獲得勝利握取政權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鬭爭，這資產階級雖然被擊敗，但尚未消滅，尚在作着反抗，而且還作着更強烈的反抗」。列寧同時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勞動群衆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和廣大非無產階級勞苦群衆（即小資產階級、小生產者、農民、知識分子等，或其中的大部分）階級聯合的特殊形式，聯合來反對資本，聯合來完全推翻資本，來克服資產階級的反抗和資產階級的死灰復燃的企圖，聯合來建設和鞏固社會主義。」「這是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精神上，情況不同的階級之聯合。」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中，列寧指出工人階級必須聯合全體農民，孤立資產階級，反對沙皇和地主的戰略方針。當十月革命之時，列寧就提出新的戰略方針——無產階級聯合貧農和半無產階級分子，使中農保守中立，而反對資產階級與鄉村富農。當蘇維埃政府鞏固起來的時候，列寧又提出第三個口號——無產階級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反對富農。在一九二一年時，列寧這樣的說道：「最主要最基本的問題，是工人階級對於農民關係的問題，是工人階級和農民聯合的問題，就是先進的工人，經過長期的、艱苦的、有效的大工廠訓練之工人，應該能夠措置得這樣，使之可以把資本主義所壓制的、地主所摧殘的、貧苦小經濟所束縛的農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並且證明給農民看，祇有聯合工人，無論其行程如何困

難——困難是很多的，我們決不能對之閉目無睹——祇有在這個聯合之下，農民方能從地主和資本家的長期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祇有在工農聯合之下，人類才能從帝國主義大戰那樣的災難，以及我們所看到的資本主義的野蠻矛盾之中，解放出來。……」由上面我們可以看見，列寧認為工農的聯合，具有如何重大的意義。以後在一九二三年的「怎樣改組工農監察部」一文上，列寧便特別指出，蘇聯共和國的命運，最後還是依靠於農民群衆是否隨從工人階級的這點上，「在寧少毋濫」一文上他又說道：「我們必須建設這樣的國家，使在其中工人階級可以保持對於農民正確的領導以及農民對於工人階級的信仰。」「無產階級專政之最高原則，即保持工人和農民的聯合，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領導作用及國家政權。」（「列寧全集」第十八卷）在經濟方面，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無產階級應該是廣大農民群衆的領導者。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無產階級根據於國家的大規模的工業化，實行農村經濟的集體化，改造小農經濟為大的集體經濟，使農民也由小生產者轉為社會主義勞動者，與工人一起，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進向共產主義社會。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群衆的聯合是如何的重要；第二，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建設上，無產階級都應該是廣大農民群衆的領導者。祇有這樣，工人階級才能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所以蘇聯的蘇維埃國家，根據其階級性，或政綱，或根本任務，或行動，或事業，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國家。雖然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無產階級有親近的同盟者——農民，可是全國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思想方面的領導權，是完全掌握於無產階級手中的。蘇聯的蘇維埃，是工人階級專政的政權形式。

。…………。 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工人階級國家  
六、鞏固 工人階級 政權是否須要減弱呢？馬列主義對這一問題的回答  
國家政權： 是否定的，就是說，工人階級國家政權，在這一過

的必要：程中，不但不應減弱，而且應當鞏固與加強。斯大林說：「我們贊成國家衰亡，同時，我們主張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這專政是從來所有政權中的最有力最強大的政權。高度發展國家政權，來準備國家衰亡的條件，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公式，這是矛盾的。是的，是矛盾的。可是，這種矛盾，是合乎實際生活的，是完全反映馬克思的辯證法的。」

### 為什麼需要鞏固與加強工人階級的國家政權呢？

因為就對內方面來說：第一，須要澈底剷除剝削階級殘餘分子的一切破壞搗亂的行爲，堅決肅清一切反革命派（託派、布哈林派等等）偵探奸細的出賣國家謀害人民的賊行（它們是在外國特務機關指使之下，進行這種賊行的），嚴厲打擊不良分子損害社會主義財產與社會主義生產的行爲；第二，須要繼續加緊鞏固與加強工農的聯合，教育與改造農民，並加緊工人階級本身的共產主義教育；第三，須要廣大的發展社會主義的各方面的經濟建設，發展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化，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爲着完成這些重大任務是非鞏固工人階級國家政權不可的。

就對外方面來說：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隨時有受資本主義國家武裝侵犯的危險。資本主義國家，即在不是正式開戰的時候，也經常派遣許多偵探奸細（託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各種奸細），到工人階級國家，來進行危害破壞的工作。所以爲着強有力的打擊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侵犯，肅清它們所派的偵察奸細，保衛社會主義的勝利，也就必須加緊工人階級的國家政權。

帝國主義反動資產階級走卒的託派，布哈林派胡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工人階級國家政權應趨削弱。這種胡說，是完全適合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要求的。

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國家，就一定要無比的鞏固與强大起來。爲什麼呢？因爲如斯大林在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現時蘇維埃社會別於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特

點，就是在蘇維埃社會裡，彼此對抗的、彼此敵視的階級已不復存在，剝削者階級已被消滅，而構成蘇維埃社會的工人、農民以及知識分子，則在友愛合作的基礎上生活着和工作着。當資本主義社會正被工人和資本家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農民和地主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所撕裂着，致使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情況動搖不穩的時候，而我們這個早已擺脫剝削枷鎖的蘇維埃社會，却根本沒有這種矛盾，根本沒有階級衝突，而是表現爲工人、農民以及知識分子友愛合作的圖畫。而正在這個共同性的基礎上，就使蘇維埃社會的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蘇聯各民族人民間的友誼，蘇維埃的愛國主義這樣的動力，擴展了起來，同樣，也就在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通過的蘇維埃憲法，以及我國各最高機關選舉制的完全民主化」。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國家鞏固與強大的原因，就是在此。但是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國家的形式與職能，並不是永遠不變的，斯大林指明了，從十月革命時起，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在其發展中，已經過兩個主要階段：

「第一個階段，這就是從十月革命時起，至各剝削階級被消滅時爲止的時期。這時期的基本任務，就是鎮壓已被推翻階級的反抗，組織國防以打退武裝干涉的侵犯，恢復工業和農業，準備條件來消滅資本主義成份。與此相適應的，就是我們的國家（指蘇聯——作者）在這個時候實現了兩個基本職能：第一個職能，就是鎮壓在國內已被推翻的階級。這樣，我們的國家在外表上就和從前的國家底職能相似，因爲從前的國家的職能，也在於鎮壓那些不降服者，可是，在這裡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就是，我們的國家是爲着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鎮壓剝削者少數，而從前的國家却是爲着剝削者少數底利益來鎮壓被剝削者大多數。第二個職能，就是保衛國家而打退外來的侵犯。這樣，我們的國家在外表上也和從前的國家相似，就是，從前的國家也會從事於武裝保護本國的事情。可是，在這裡，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就是，我們的國家是打退外來侵犯而保護了勞動者多數的勝利品，而從前

的國家，在這樣情形下，則是保護了剝削者少數的財富和特權。這裡，還有過第三個職能——這就是我們國家各機關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就是發展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和重新教育人們以社會主義精神。可是，這個新職能，在這個時期內，未能得到嚴重的發展。

第二個階段，這就是從城鄉資本主義成份被消滅時起，至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完全勝利和通過新憲法時為止的時期。這時期的基本任務，就是在全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和消滅資本主義成份最後殘餘，組織文化革命，組織完全現代式的軍隊來保衛國家。與此相適應的，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職能也變更了。在國內實行武力鎮壓的職能已經消失——衰亡，因為剝削制已被消滅，剝削者已不復存在——已沒有甚麼人必須鎮壓了。鎮壓的職能，就由國家方面用以防範那些偷竊和侵吞人民財富者而保護社會主義公產的職能所代替。武力保護國家而反對外來侵略的職能，也依然完全保存着，所以，紅軍，紅色海軍，以及為捕捉和處罰那些被外國偵探機關派來我國的間諜、兇手、暗害分子所必要的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也仍然保存着。國家機關之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職能，依然保存着，並且得到了完成的發展。現在，我們的國家，在國內的基本任務，就在於和平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於說到我們的軍隊，懲罰機關以及偵察機關，那末，它們的鋒芒，已經不是向着國內，而是向着國外，向着反對外部敵人了。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所有的，乃是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這個國家按其形式和職能，是和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大不相同的。」

七、共產主義社會與國家問： 在這裡，自然而然的要發生一個問題：當一國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並向共產主義前進時，國家是不是還會保留下來呢？

題.....：

關於這個問題，恩格斯會這樣說過：

「.....一旦沒有任何一個應被壓迫的社會階級，一旦跟着階級統治之消滅，和由現代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各個生存競爭之消滅，同時，由這種競爭所產生的衝突和過分行動也一起消滅的時候——從那時起，便沒有東西要壓迫，也無須乎特殊的壓迫力量的國家了。國家真正以全體社會代表的資格而作第一個行動——以社會的名義取得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國家）的最後的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將由一個部門又一個部門地成為不需要，而無形中自然泯沒了。此時，管理物品的機關和指導生產過程的機關，便來代替對人的管理，國家並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衰亡的。」（「反杜林」）這就是說，在共產主義之下，不應有國家的存在。恩格斯這個原理，是否正確呢？

「是的，是正確的，但只是在有下述條件之一時，才是正確的：

(一) 如果只以某國內部發展為觀點來從事於社會主義國家之研究，而預先就撇開國際因素不說，並為便於研究起見，而把該國和該國家看作是離國際環境而孤立的，或者是(二)如果假定說社會主義已在所有一切國家裡或大多數國家裡勝利了，而那時所有的，並不是資本主義包圍，而是社會主義包圍了，已不復有外來侵略的威脅，已經不復有加強軍隊和國家的必要」。（斯大林）

很明顯的，恩格斯在這裡所持的出發點，就是假定社會主義已經是多少同時在所有一切國度裡，或大多數國度裡獲得勝利了。同時，他在這裡所研究的並不是這一國或那一國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是一般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因此，他就完全把國際條件撇開不說。因此現在蘇聯，「不可把恩格斯關於一般社會主義國家命運的一般公式，推廣來運用到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度裡勝利的局部的具體的情況中來，而這個國度在自己周圍是有資本主義包圍的。這個國度遭遇着外來武裝侵略的威脅，這個國度因此就不能把國際環境撇開不說，

這個國度應當既握有訓練得好的軍隊，又握有組織得好的懲罰機關，又握有堅固的偵察機關，因而也就是說，應當握有自己的充分強有力的國家，——以便可能來保護社會主義底勝利品而打退外來的侵犯」。〔斯大林〕

所以，斯大林回答這個問題道：「是的，會保存着的，如果資本主義包圍在那時（一個國家共產主義社會建成的時候——作者）還未被消滅，如果外來的武裝侵犯危險在那時還未被剷除。同時，很明顯的，我們的國家的形式，又會隨着國內和國外環境變更而變更的。」

當然，也還可以有另一種可能，就是說，可能在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過程完成以前，就已經最後克服和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那末，對外也不復需要保護的特殊機關了，國家也就不會保存着，而逐漸自行衰亡了。所以，斯大林的另一回答道：「不是的，不會保存着的，而會衰亡下去，如果資本主義包圍在那時（共產主義社會完全建成時——作者）已被消滅，如果它在那時已由社會主義包圍所代替。」

## 第五章 民族與民族鬥爭

### 一、民族 是甚麼

近代民族是一定的歷史的產物，就科學意義上說，是隨着封建主義崩潰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由各個不同的部落、氏族、宗族、種族等等結合而成功的。

民族有自己的特徵。

共同的語言，是民族的第一個特徵。每個民族一定要有共同的語言，然而，說相同語言的人，並不是就是同一的民族。英國人和美國人說同一的語言，而他們不是一個民族。為甚麼？因為他們不是在共同的地域上生活。因此，

共同的地域，乃是民族的第二個特徵。「祇有由於長期的和經常的互相往來之結果，祇有由於人們歷代共同生活之結果，民族才漸次組成。而長期的共同的生活，却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然而，共同的地域本身，還不能造成民族，要造成民族，還要有內部的經濟聯繫，來把民族各個部分團結成爲一個整體。因此，

共同的經濟生活，經濟的聯繫性，乃是民族的第三個特徵。祇有內部共同的經濟生活與經濟聯繫，才能把生活在共同地域上的部落、氏族、宗族、種族等等團結成爲一個近代的民族。

此外，共同的心理結構（它是由於歷代以來生存條件不同而形成的，它表現於共同文化之上），也是民族底特徵之一（第四特徵），但決不是民族的唯一特徵。所謂民族共同心理結構，並不是什麼神秘不可捉摸的東西，它具體地表現於各民族的文化特點上與風俗習慣上。自然，民族心理結構，是由民族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是隨着民族的物質生活條件之變化而變化的。

不言而喻的，在這些民族的特徵中，無論把那一個特徵單獨拿來，都不足以用來作出民族的定義。而且，只要這些特徵中缺少任何一

個，都不足以使民族成其爲民族。祇有這一切特徵具備時，才能成爲近代的民族。

所以，斯大林說：「民族是在歷史上形成的，一種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結構的固定集團。」

民族是由內部各個階級組成的。民族內部，有剝削壓迫的階級——地主資產階級；也有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工人和農民。

地主資產階級只是民族中的少數，工人和農民，則佔民族中的絕對大多數。

地主資產階級雖然在一時期內、某種限度內能够參加反對異民族侵略壓迫的鬪爭，但是，他們總是想由自己來獨佔民族鬪爭的利益，總是想以抽象的「民族」口號，來壓制民族中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由於他們的階級地位的特點，他們在民族鬪爭中，帶有動搖性妥協性。他們時常壓制民族中廣大工農勞動民衆的民族鬪爭。他們到一定階段，甚至會叛賣民族利益，脫離民族解放事業。所以他們不是民族的真正代表者。

工人階級是真正能够澈底地、堅決地代表民族利益的階級。工人、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群衆佔全民族的最大多數。工人領導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群衆，能够始終一貫，爲民族的當前的與久遠的利益而堅持奮鬥。工人階級不僅能領導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群衆，爲民族獨立解放的澈底勝利而鬪爭，而且要領導農民的基本群衆爲消滅一切剝削壓迫，求得全民族和本身的澈底解放而鬪爭。所以工人階級，真正堅決地澈底地代表民族的利益。

民族不是自古就有的，正如斯大林所說：「民族，也與任何歷史現象一樣，是受變化法則所支配，它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始末。」

在原始共產制社會中與奴隸制社會中，那種低下的生產力，比較不發展的社會生活條件，使那時，只能夠有部落、民族等等存在。在封建社會中，生產力雖然比較往前發展了些，但還是狹小的地方性的

自然經濟，那時的社會生活條件，只能够形成宗族與種族等等集團，而不能形成民族。民族，是商品生產，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產物。祇有商品生產和貨幣關係的發展，才能把共同地域上各自分工的小集團聯繫起來，逐漸的形成了近代民族。

但是，異民族的侵略壓迫和封建勢力，却妨害了本國民族自由的發展，於是，就必須向異民族壓迫和封建勢力進行革命的鬪爭。祇有用革命鬪爭的手段，才能够求得民族的獨立與統一，建立民族國家，造成民族自由發展的必要條件。

所以，民族本身，並不是什麼用「自然力」造成的團體，而是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到將來世界共產主義勝利了以後，階級消滅了，生產力高度的發展，各民族親密的聯繫，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民族也會逐漸融合起來，民族的區別也將消除了。

在資本主義世界，階級的剝削與壓迫，必然會

二、民族問題與民族革命運動  
.....  
發展為民族的剝削與壓迫。有了民族的剝削與壓迫，就必然要產生民族問題，必然要發生民族革命運動。  
.....

特別在帝國主義時代，全世界的殖民地，都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完結，許多民族受到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剝削與壓迫。帝國主義不僅進行「和平的」經濟、文化侵略，而且，還野蠻地經常進行武裝侵略，來霸佔被壓迫民族的財政經濟命脈，強佔他們的領土，並使他們政治上屈服於自己。帝國主義還故意扶助被壓迫民族內部的反動勢力，使他們成為自己的爪牙。

現在，世界上，有許多民族亡了國，完全失去了政治上的獨立性，作了亡國奴（如印度、朝鮮等）。這叫做殖民地。

有些民族，還沒有被一個帝國主義所獨佔，或幾個帝國主義所瓜分，還有某種程度的獨立的國家，人民還有一種半獨立的性質，還沒有直接變成亡國奴，但是這國家的財政經濟命脈，掌握在帝國主義手裡，政治上也受着帝國主義的直接的或間接的支配，這就叫做半殖民

地。半殖民地之所以沒有變成完全殖民地，主要原因是在於，這個民族，特別是其廣大的勞動民衆，能够不屈不撓，英勇壯烈的進行民族革命鬪爭，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剝削壓迫，反對內部爲敵作倀的奸徒勢力。而半殖民地之所以沒有得到完全的獨立，主要原因就是，這個民族內部各種反帝力量，還團結得不够鞏固，廣大民衆的反帝力量，還未得應有的發展，致使民族的偉大力量，不能充分發揮，因此，還未能驅除帝國主義和民族叛賊。

還有一些民族，自己也剝削壓迫一些別的民族，但同時，自己在政治上、經濟上却附屬於別的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自己並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這樣國家就叫做附屬國。

帝國主義財政資本集團，用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武裝的種種方法，「對最廣大的殖民地附屬國內十數萬萬人民實行最殘暴的剝削和最慘無人道的壓迫」。（斯大林）特別是目前帝國主義強盜對於半殖民地和附屬國所進行的民族侵略和強盜戰爭（如日本對於中國），那更是曠古未有的野蠻殘酷，根本的危害了這些被壓迫民族的生存。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的時候，不得不在那裡建設鐵路、工廠及工業的和商業的中心。」（斯大林）同時，殖民地、半殖民地商品經濟、貨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在與資本帝國主義鬪爭的過程中，也部分的發展了某些民族資本主義，於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度內，無產階級出現了，某些民族資產階級也產生了。民族覺悟興起了，解放運動也更有力了，更加緊了。

所以，民族問題和民族鬪爭，並不是什麼超階級的東西，也不是和一般革命問題沒有關係的東西。恰恰相反，「布爾塞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基本態度，就是：布爾塞維克歷來都把民族問題當作與革命前途緊密聯繫着的一個問題」，「他們過去和現在觀察民族問題完全是與一般革命問題密切地聯繫着的」。（斯大林）

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民族問題，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總問題的

一部分。那是，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如波蘭、愛爾蘭、美國等），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問題，已經變成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剝削壓迫的問題。因此，民族問題也變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總問題的一部分。這時，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鬭爭，已經變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自然，這並不是說：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本身已經變成了社會主義革命。決不是這樣的。民族解放運動本身，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的。這只是說：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僅客觀上幫助了帝國主義國內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而且，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繫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各國革命勝利底道路，須經過與殖民地和附屬國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底革命聯盟。

所以，根本反對一切剝削和壓迫的無產階級，就最堅決的、最徹底地反對任何民族的剝削和壓迫。

所以，「在每一個國家裡，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都應當『適應本地的氣候』，以便在本地種下自己的深根。個別國家裡無產階級鬭爭和工人運動底民族形式是不違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恰恰相反，正是在這種形式裡，同時還可以勝利地擁護無產階級的國際的利益」。

（季米特洛夫）

在帝國主義國度裡，無產階級及共產黨，必須了解：「壓迫別的民族的民族，本身是不自由的。」（馬克思）民族的剝削與壓迫，恰恰就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之打擊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維持其垂死的統治的重要據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民族剝削和壓迫，絕對不是本國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本國民族的真正幸福和光榮，而正是他們的痛苦與恥辱。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度中，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必須領導本國一切被剝削的勞苦民衆，堅決反對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所進行

的民族剝削和壓迫，用積極的行動來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必須和任何輕視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傾向作鬭爭；必須進行堅持的思想鬭爭，來反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民族欺騙。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了解：自己是全民族血肉相關的一部分，是民族中最優秀的男女，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和自己階級的根本利益一致的。民族的獨立，是自己階級和民族澈底解放的一個首先必經的階段和過程。其次，必須了解：「帝國主義者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的基本群衆（首先是農民群衆），而這種剝削和壓迫，同時又引起了這些群衆與帝國主義鬭爭……」，「農民是民族運動的基本軍隊，沒有農民的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也不會有強大的民族運動。」（斯大林）而農民的基本群衆，又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所以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竭力發動、組織、武裝廣大農民群衆來參加民族民主革命鬭爭，除農民外，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領導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群衆及革命知識分子，來積極參加民族解放鬭爭；必須堅決的反對一切民族虛無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傾向；在一定條件之下（即民族資產階級真正參加民族革命鬭爭，允許無產階級政黨獨立存在，並以無產階級精神去教育訓練廣大勞動民衆），必須和參加民族解放鬭爭的民族資產階級其他反帝階層與黨派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共同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鬭爭。

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度的具體表現。

馬克思列寧主義指明了，而事實證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鬭爭，是帝國主義的民族剝削和壓迫所必然引起的結果。這些國度的民族，爲了反抗異民族的侵略和壓迫，爭取自己的解放，就不得不進行堅決的鬭爭。

民族解放鬭爭，有各種鬭爭形式，而它的最高形式，就是武裝鬭爭——民族起義與民族革命戰爭（如在中國，就有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自衛的抗日戰爭）。

三、民族  
革命戰爭

被壓迫民族反帝的武裝鬪爭，是帝國主義的民族侵略和壓迫所引起的結果。所以挑動戰爭的是帝國主義侵略者，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民族，爲了自己的生存，必得以正義的、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去反對野蠻的、侵略的反動戰爭，真正爲世界和平而戰。

這種民族武裝鬪爭——民族革命戰爭，在帝國主義時代，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不可免的。爲甚麼？因爲帝國主義（特別是法西斯帝國主義）殘暴的民族侵略和壓迫，必然要引起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附屬國人民的民族義憤的增長，同時，因爲這些國度內部興發着新的革命的力量（民族團結的發展，廣大民衆的民族覺醒的增長，無產階級力量的成長，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和發展，它在民族鬭爭中的作用以及在人民中作用和威信的增大等等）。於是，民族解放運動便必定要發展起來，以至發動起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

所以，列寧說：「在這個帝國主義時代，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方面發生的民族戰爭，不僅是可以指望的，而且是必不可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國、土耳其、波斯），有多至十萬萬的人口，就是說有超過全球半數以上的人口，這裡的民族解放運動，或者是已經強大，或者是正在增長與日益成熟。任何戰爭都是政策之採用別種手段的繼續，殖民地方面之民族解放政策的繼續，必不可免的成爲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

無疑的，這種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是革命的、正義的、進步的。因爲這種民族戰爭，一方面直接打擊着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削弱着帝國主義的力量，幫助着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另一方面，推翻帝國主義的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統治，就是推翻殖民地、半殖民地內部黑暗的反動勢力的支柱，也就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從中世紀的黑暗痛苦境況中解放出來所必經的一個階段和過程。列寧說過：「最近十年來，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及其他附屬國中，千百萬民

衆已經覺悟到，要求從列強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在這樣歷史範疇內的戰爭，應該是而且已經是資產階級進步的民族解放戰爭。」「反帝國主義列強的民族戰爭，不僅是可能的，不僅是可以指望的，而且是必不可免的、進步的、革命的。」

所以，在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時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可以而且應當提出「保衛祖國」的口號。因為，在這裡，「『祖國』二字，還未完成其歷史使命，『擁護祖國』，還可算是擁護民主，擁護本民族語言文字，擁護自由而反對壓迫民族，反對封建制度」。（列寧）在這裡，「保衛祖國」，還是具有全民意義的事業。列寧說：「真正的民族革命戰爭中，『保衛祖國』的口號的確完全不是欺騙。」「社會主義者曾經認為，而且現在還認為以推翻外族壓迫為目的的保衛祖國的運動或防衛祖國的戰爭，是理所當然的、進步的、正義的戰爭。」

至於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中，在那裡，民族問題已經解決，「民族運動，早已成為過去的事跡。……『祖國』二字，已完成其歷史的使命，換句話說，在這裡，民族運動，已不能表現進步的作用，已不能推動與新興的人群來為新的經濟、政治生活而奮鬥，在這裡，擺在歷史發展現階段上的問題，已經不是由封建制度或宗法野蠻制度過渡到進步的民族軌道，過渡到文明的政治自由的『祖國』，而是要早已過時的資本主義『祖國』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列寧）。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說：「工人沒有祖國！」。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開始時，堅決反對那種反動的戰爭；堅決反對第二國際首領們所擁護的「保衛祖國」的口號，認為這完全是背叛無產階級。他寫道：「至於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在現時（即當時）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衛祖國』，却完全是欺人之談，因為他們在事實上所保衛的，並不是自己民族發展自由，而是保衛自己的奴隸剝削制度，保衛自己的殖民地佔有權，保衛自己的財政資本在別國的『勢力範圍』等等，……在現時帝國主義戰爭中，主張『保衛祖

國」，即是欺騙民衆，因為這並不是民族戰爭。」因此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帝國主義俄國國內的列寧及布爾塞維克黨堅決主張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

所以，在不同的國度內，在不同性質的戰爭中，無產階級對於「保護祖國」的口號，是根據革命的利益來決定自己的正確態度的。

四、民族  
統一戰線

爲着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必須聯合全民族的一切反帝力量，組織反帝民族統一戰線（如在中國，就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民族內部各種力量的團結，就是偉大的不可戰勝的力量。

民族統一戰線就是被侵略被壓迫民族內各反帝的階級，各黨派爲了反對共同敵人（帝國主義侵略者），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民族的團結。爲着能够更多明瞭民族統一戰線的一般問題起見，我們就來具體研究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個問題。

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是人民戰線。第一，產生的環境不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產生於資本主義還只有部分發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在這裡，民族的獨立問題具有首要的意義。人民戰線則產生於資本主義較爲發展的國度中。第二，反對的對象不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反對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及其走狗，而人民戰線則是反對國內法西斯蒂以及幫助國內法西斯蒂的外國干涉者。第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鬪爭目標，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爭取自己民族的獨立，而人民戰線則是打倒法西斯蒂，保衛國內民主與世界和平（自然，人民戰線的鬪爭目標，也隨各國具體情況而有所不同，有的也包含重大的保衛民族獨立的任務，如西班牙人民戰線）。第四，特別主要的，是組成的範圍不同。民族統一戰線是要包括全中華民族所有一切生動力量，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黨派、團體，除了極少數的民族叛賊以外都可以參加。人民戰線則主要的是勞動人民的統一戰線，參加人民戰線的是廣大勞動人民以及一些真正愛護民主愛護世界和平的人士與集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階級組成，要比人

民戰線廣泛得多，因之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部，就有更複雜的關係。

民族統一戰線，絕不是什麼人隨意製造出來的，更不是從外國輸入的。它的形成，是因為中國本身產生了前面所說的條件。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確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首先發起人，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忠實的執行者。它的偉大的功績，就在於它不僅首先認識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產生的客觀條件；認識了沒有全民族的團結與進步，要戰勝兇暴的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的真理；而且還能够進行堅持的鬭爭，艱苦的說服教育工作，去打破日寇、漢奸、汪派、託派的破壞阻撓，克服內部某些分子的反對，而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為什麼中國無產階級政黨能夠這樣做呢？

因為，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全民族和全人民解放事業的最堅決的戰鬪隊伍，是與全民族和全體人民血肉相連而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因此，它們對於全民族和全體人民的命運最關切、最負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事業，既然是全民族和全體人民生死攸關的事業，所以，同時也就是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切身事業。

因為，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馬列主義的黨。馬列主義是科學的共產主義，它清楚地了解社會發展的規律，它指明了各國一定要根據各民族的歷史、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等具體特點，經過必經的革命階段與過程才能達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勝利。所以，它不僅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的理論和策略，而且同時又是全世界一切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論和策略。馬列主義不僅能够科學地預見在嚴重的民族危機下，中國各階級關係變化和發展的趨勢，而且，更清楚的指明：在這一民族危機下，聯合革命同盟軍的方針與方法。當然在一切革命鬭爭中，無產階級都必須根據革命階段的特點，去聯合必要的而且可能的革命同盟軍，共同奮鬥，爭取勝利。孤軍苦戰，是沒有不失敗的。因此，在進行民族鬭爭時，特別是在進行民族抗戰時，無產階級應當而且可能，運用一切方法，戰勝一切困難，和一切不願當亡

國奴的階級、階層、黨派、團體，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所以，無產階級政黨的這一主張和行動是完全正確的。這完全忠實於工人階級、全體人民及全民族的利益，完全忠實於馬列主義的。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由幾個階級及其黨派組成的。這些階級、階層與黨派，雖然爲了反對共同敵人而聯合起來，但同時，仍然保存着各自不同的階級利益與思想，不同的革命態度與觀點。所以在民族抗日戰爭中，各階級還有堅決程度與貫徹程度的不同。這些不同，是不能由人們的主觀意志來取消的。

因此，在民族抗戰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必然會有兩條政治路線的分歧。一條是不澈底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路線，另一條則是澈底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路線。

什麼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不澈底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路線呢？

當日本帝國主義堅決進攻中國時，它是要進行抗戰的；但是這必須在少數上層統治者無理的包辦統治底下來進行，不贊成全面的全民族的總動員，不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於軍事、政治、黨務、民運、文化教育等等方面，只求某些不得已的、緩慢的、膽怯的、微小的改革，不願，並且懼怕各方面的、主動的、大膽的、澈底的改革，尤其不願與懼怕給人民大衆以民主的自由權利，不願改善他們的生活與地位，來大量的發動與組織他們，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使他們積極的參加抗戰。相反的，它的很大力量常常不用於長期堅持抗戰爭取抗戰勝利，而用於打擊比較進步的分子與團體，尤其用力於打擊無產階級政黨及其所領導的革命力量。而對於落後的、頑固的、黑暗的、甚至民族叛賊汪派、託派，則表示最大的容忍、袒護與縱容。對於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的執行，表示不澈底與不堅決，特別對於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表示怠工。對於外力援助有過度的希望，對於自力更生的信念極不堅定。它企圖經過國際會議的方式來中止抗日戰爭，而且不斷的爲着這種希望的實現而活動。對於內部一部分動搖分子

投降妥協的傾向的打擊，很不澈底，很不堅定。而且在敵人誘降的活動與某些其他國家妥協派的調停之下，自己也表示動搖不定，準備投降妥協，甚至表示只要日寇退出一部分地方，就可以停止抗戰，另一部分領土它是準備放棄的……。

### 什麼是澈底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路線呢？

它始終站在堅持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抗戰的各黨各派的合作，用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難，驅逐日寇出中國，收復一切失地的立場上。它堅決主張全國軍隊、政治、黨務、民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主動的、大膽的、澈底的、迅速的改革，尤其着重於民主自由權利的保障，與現代民主政治的建立，大量發動、組織與武裝民衆，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使他們在中華民族與國家內取得他們應有的政治的與社會的平等地位。它堅決擁護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而且要求三民主義的全部實現。他認為民族解放運動，應該對於全國一切參加抗戰的階級、階層與黨派有利，而不應只對於少數上層分子有利。它堅決擁護與贊助一切前進的、光明的、自由的、民主的、活躍生動的運動與力量，而反對一切落後的、黑暗的、保守的、腐化的、專制野蠻的東西。它主張力爭外援，但堅持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針。它在日寇誘降與某些其他國家妥協派調解之前，決不動搖。它堅決反對任何國際會議形式的投降妥協，它揭破一切國內投降妥協分子反對無產階級政黨的陰謀，它指出這是他們準備投降的具體步驟，主張從一切機關與團體上肅清漢奸及各種隱藏的民族危害分子……等等。

誰都可以看到前一條不澈底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路線，主要是為一部分上層資產階級及少數上層分子所支持，而後一條澈底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路線，主要是為工人階級及最大多數人民所支持。

顯然用不着證明，不澈底的路線，是有害於民族利益的路線，而澈底的路線，則是真正民族至上的路線。

這兩條路線的不同，必然要產生各種性質和各種方式的磨擦，這

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鬭爭的一個主要的表現形式。

首先，而且經常進行無理磨擦的，就是那班高唱「反對階級鬭爭」的剝削分子。這不僅是因為它們在民族抗戰中繼續剝削和壓迫工人和農民，而且，還因為它們要強迫廣大民眾執行它們那種有害於爭取抗戰勝利的政治路線。它們鬭爭的鋒芒，首先就是向着最忠實於民族與人民利益的無產階級政黨。它們縱容民族叛賊汪派‘託派’，進行反對無產階級政黨的工作，它們不僅極力進行思想上的影響和物質上的引誘，而且用威脅，暗殺種種方法來破壞無產階級政黨及其所領導的革命力量。

顯然用不着證明，它們這種階級鬭爭（磨擦），是有害於民族與人民的利益，是有害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族抗日戰爭的。在抗戰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的一些動搖分子，以反對無產階級政黨的活動，來作為向敵人妥協投降的具體準備工作。

為什麼反對無產階級政黨是向帝國主義侵略者妥協投降的實際準備工作呢？

第一、因為「共同防共」是日寇的方針，反對無產階級政黨，是適合於日寇滅華的要求的。

第二、因為打擊無產階級政黨，就可以使其他抗日的階層、黨派，部隊及革命民眾，失去支柱的力量。

第三、因為無產階級政黨及其所領導的抗日力量，是對日妥協投降的最大障礙。

第四、因為反對無產階級政黨，容易博得某些其他國家反動階層的歡心與贊助。

第五、因為以反對無產階級政黨的「工作」來準備妥協投降，便於蒙蔽一部分革命將士與民眾的警覺性，減弱革命將士與民眾的反對妥協投降的運動。

所以，反對無產階級政黨，就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動搖妥

## 協分子對民族敵人妥協投降的主要準備工作•

因此，爲了全民族與全人民的利益（也就是爲了工人階級的利益），無產階級政黨還必須善於發動民衆反對向民族敵人妥協投降，鞏固與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各抗日黨派的合作，真正實行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祇有這樣，才能保證民族抗日戰爭得到最後的勝利。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必須用堅決奮鬥、英勇衛國的先鋒的模範作用，去影響同盟者，而且，還必須始終堅持自己的正確的政治路線，發動廣大民衆批評資產階級的不澈底性，堅決反對動搖妥協派向民族敵人日寇投降的陰謀，反對它們所進行的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違反民族利益的行爲，以堅持民族統一戰線推動民族進步，堅持持久抗戰到最後的勝利。

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人民來開展這樣的鬪爭，是完全正當的，完全必要的。因爲這種鬪爭完全是爲了民族利益的。如果沒有這種鬪爭，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鞏固發展起來，民族解放事業就不能得到勝利。所以，用適當的方式，向資產階級進行批評與鬪爭，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與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

民族統一戰線是要隨着民族抗日戰爭的發展而發展的。而在這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面固然會有無數新的力量生長起來，另一方面，還必然會有動搖變節的事件發生，這是毫不足怪的，因爲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階層，原來就有澈底程度與堅決程度的不同，而日寇也會用分化引誘的手段，來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每當這種時機，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必須動員廣大民衆，堅決反對日寇陰謀，澈底的打擊那些已經公開叛變民族，投降日寇的汪派漢奸，而且必須警惕地揭發一切隱藏的民族危害分子以反對無產階級政黨在準備妥協投降的陰謀，並動員全民族的一切生動力量去粉碎這種陰謀。無產階級政黨還必須堅持抗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各抗日黨派的合作，堅持三民主義，以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爲着能够有力地達到這個目的，無產階級政黨本身必須鞏固與發展起來。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始終絕對保持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必須始終努力加強自己所領導的革命力量。黨還必須大大的鞏固；要更加加強黨的理論的修養；要更加嚴格黨的紀律；要更加提高革命的警惕性；要堅決反對任何不良傾向，並嚴厲地和破壞分子作鬭爭。這些都是完全正當的，完全必要的，完全合乎民族與人民的利益的。因爲無產階級政黨是民族革命的一個支柱力量，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首先發起人和最忠實的執行者，它的鞏固和發展，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和發展的有力的保證。它更強大更有力，就是民族解放運動更强大更有力，它的鞏固和發展，不僅是全民族從帝國主義侵略中解放出來的有力保證，而且是全民族從內部封建剝削與壓迫以至從一切剝削與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真實保證。

這就是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些要點。這些要點，也能幫助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度的民族與工人階級根據他們的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去正確地了解、進行與實現它們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線。

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與擴大，廣大民衆之加入民族統一戰線，熱烈參加民族革命戰爭，民族內部各方面的進步，就是爭取民族解放運動與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最主要的條件。

此外，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還有如下的條件：由於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的加劇，使得帝國主義列強彼此之間的矛盾與鬭爭，異常緊張，以至形成他們之互相間的戰爭。同時，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上彼此利害的衝突，使各個帝國主義可以對某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民族革命戰爭採取某些不同的態度。

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在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時候，可能而且應當利用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去打擊當前最主要最危險的帝國主義侵略國家。

當然在這上面，被侵略的民族，決不能對帝國主義侵略國的同盟國，存任何的幻想。因為歷史事實證明了：走侵略者同盟的路線，只是暗藏着的民族危害分子企圖經過其他侵略國家來抵達妥協投降的手段。

而且被侵略的民族，也不應該依賴那些樂於維持現狀的帝國主義國家，來作為自己的靠山。

因為這些樂於維持現狀的帝國主義國度內的反動資產階級為了保持自己的帝國主義利益，是會乘機出來（而且事實上發生了的）壓迫被侵略民族向侵略者投降的。這種陰謀，是必須警覺地揭露與防止的。

其次在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矛盾，是更加緊張了。當某一帝國主義大規模的武裝侵略某一半殖民地國家的時候，它必然要更殘酷地剝削壓迫本國的殖民地，大大地增加這些殖民地民族的戰爭負擔，大批的驅送殖民地人民去當炮灰。這樣，就不可避免的要激起本國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加緊，以至於成為民族革命戰爭。

因此，被侵略民族的民族革命戰爭，就要影響與推動侵略國本國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就會把這兩方面的民族解放運動結合起來，去反對共同的帝國主義壓迫者。同時，被侵略民族的民族革命戰爭，還可以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精神上、物質上的援助。這些，對於被侵略民族的民族革命戰爭，無疑是一個有利的條件。

再次，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與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民衆間的矛盾，更是異常緊張的。當帝國主義發動野蠻的侵略戰爭以後，它一定要更加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本國無產階級與勞動民衆，一定要使它本國內部的階級矛盾更加劇烈起來，必然要使無產階級及廣大勞動民衆日益革命化，使革命運動日益高漲。以至於走向反侵略戰爭反本國資產階級的武裝起義。

因此，被侵略民族的民族革命戰爭，就要影響與推動帝國主義侵

略國內部的革命運動與起義，就會把被侵略民族的民族革命戰爭與侵略國內部的階級革命戰爭結合起來，去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同時，被侵略民族的民族革命戰爭，當然還可以取得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及廣大民衆的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援助。這些，對於被侵略民族的民族革命戰爭，無疑是一個有利的條件。

最後，極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强大更使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戰爭得到真誠的幫助。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力量，是一切被壓迫被侵略民族的好朋友。關於它的外交政策，斯大林在聯共十八次全國大會上曾這樣明確的指出了：「蘇聯的外交政策是明白而顯然的：第一，我們主張和平並主張鞏固我們與其他各國的實際聯繫，我們現在是站在這個立場上，而且將來還會站在這個立場上，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只要它們不來試圖侵犯我國的利益。第二，我們主張和那一切與蘇聯交界的鄰國保持和平的、親近的與善隣的關係；我們現在是站在這個立場上，而將來還會站在這個立場上，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保持這樣的關係，只要它們不來試圖直接或間接侵犯蘇維埃國家的邊界完整和神聖性的利益。第三，我們主張援助那些遭受侵略並為自己祖國獨立而奮鬥的民族。第四，我們不怕那些來自侵略者方面的威脅，並準備以加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試圖侵犯蘇維埃國界神聖性的挑戰者的打擊。」

因此，被侵略民族在進行民族革命戰爭時，應當和蘇聯親密的聯合。這無疑是爭取勝利的有利條件。

這就是帝國主義時代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條件。這上面，主要條件是被侵略民族內部團結（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發展，內部各方面的往前進步。所以，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戰爭最後勝利的取得，基本上是靠自力更生。祇有堅持並加緊團結，堅持並加緊進步，堅持民族革命戰爭，才能取得其他有利條件的配合，以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最後勝利，列寧曾經明確的指示着：「反帝國主義列強的民族戰爭，

不僅是可能的，不僅是可以指望的，而且是必不可免的、進步的、革命的。雖然，爲要保障這種戰爭的勝利，當然要有：或若是被壓迫國內巨大數量的居民之共同努力（例如我們所引作例證的印度和中國內數萬萬居民之共同努力），或者是國際形勢中種種條件之特別順利的配合（例如帝國主義列強因本身勢力的削弱，因其彼此進行戰爭，因其彼此對抗而無法實行干涉），或者是某一個强大國家裡，無產階級同時舉行反資產階級的武裝起義（最後的一個情況，從無產階級之勝利觀點看來，乃是最有希望和最有利的情況）。」自然，這三個條件，主要的還是「被壓迫國內巨大數量的居民之共同努力」，亦即全民族的團結。

一切民族解放運動的趨向是甚麼呢？換句話說

五、民族自決與民族國家  
.....  
一切民族解放運動的目的是甚麼呢？就是實現民族自決，實現民族的政治上的獨立，建立民族國家。  
.....  
實現民族自決權，是一個民主主義的要求。

列寧說：「所謂民族自決，就是民族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外族的集體，就是組織獨立的民族國家……從歷史的、經濟的觀點看來，馬克思主義者綱領上的民族自決，只是政治的自決，國家的獨立，民族國家的形成。決不能有其他意義。」

民族自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民族問題的原則。

一切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民族解放運動民族革命戰爭的基本問題，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取得民族政治上的獨立，建立民族國家。

但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民族國家，在進行民族革命戰爭中，就必須發動廣大民衆，給人民以政治自由，並且確當地改善人民生活。不然，民族革命戰爭的最後勝利與民族國家建設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馬列主義清楚指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趨向，是朝着互相接近的方面發展的，大國比小國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思想文化

上等等各方面，都有許多更加便利的地方。但是，祇有經過民族的自決的實現以後，祇有各民族平等以後，才能走向各民族間自願的、自由的聯合。祇有各民族站在完全平等自願之上的自由聯合，而不帶絲毫強迫的性質，才能產生各民族間的互相信任與友愛。祇有站在這個原則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各個民族的親密的團結。

- 馬列主義，一方面堅決主張民族獨立自決，同時堅決主張全世界各民族的工人階級親密聯合，這兩者並無絲毫矛盾，而是完全一致的。
- 這兩個原則，是馬列主義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主張。

馬列主義所主張的民族自決，不等於提倡無原則的民族分散，建立許多小國。馬列主義所主張的民族自決，是指各被壓迫民族有脫離帝國主義壓迫，政治上完全獨立自主的決定自己命運的完全權利。被壓迫民族，應以整個革命利益為依歸來決定實現這一權利的步驟。在民族自決權實現之後，各個平等的民族，可以根據平等自願的原則來和別的民族聯合，形成一個多民族的聯盟國家。

民族自決權絕不是「民族文化自治權」。這種「文化自治」是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的擁護者的口號。因為它主張被壓迫民族只要有建立自己文化機關的權利，而可以讓全部政權仍然掌握在帝國主義手裡。

民族自決權也不是地方的民族自治。以「民族自治」來反對民族自決，是適合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行爲。

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後，首先建立了某些民族自治共和國或民族自治區，但這是民族自決權澈底實現的一種形式，決不是機會主義所說的「地方民族自治」。

民族的獨立解放，是達到民族最後解放的一個必經的歷史階段，但本身還不是民族的最後解放。因為民族的獨立解放，只是使民族脫離了異民族的侵略和奴役，而民族內部廣大的工農勞動人民，還仍然受着本民族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奴役。

**祇有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存在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勝利，才能把民族內的最大多數的人民從一切奴役下解放出來，才是全民族與全人民的最後解放。**

**經過了民族自決權的澈底實現與各民族自願的友愛聯盟，再經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的勝利，當各民族在各方面都得到高度的發展的時候，各民族才能逐漸融合起來。**

## 第六章 家族

人類生活的繼續和發展，有兩個方面：一是社會成員本身的生活的維持，二是種族的繼續。為了維持成員本身的生活，就要取得一定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爲着這一目的，人類就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之下進行勞動，進行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然而爲着種族的繼續，就不僅僅需要生活資料的取得，而且要有兩性間的結合，要使兩性在一定的方式之下結合起來，以進行子女的生產。這就是說，人類要繼續和發展自己的生活，不但要進行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而且要進行人類自身的生產，在進行人類自身的生產時，人類間所形成的關係，就是家族關係。

家族關係是人類生活中重要的要素之一。家族的生產（即人類本身的生產），和勞動的生產（即物質資料的生產），都成爲人類歷史及人類社會制度的基礎。（恩格斯說：「爲某一時代某一地域之人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制度，是受兩種生產形式的制約，即一方是勞動之發展，他方是家族之發展。」）（「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第一版序）這就是說在一個時代、一個地域的社會制度裡，家族關係是有着一定的作用的，要具體認識這一時代、這一地域的社會歷史，除了要認識它的生產力生產關係的發展，階級矛盾的發展之外，還不可以忽略了它的家族關係的發展。

但這並不是說，家族關係是社會發展的唯一的或決定的基礎，或者說，它和勞動的物質生產關係有同等的決定意義。在中國，就有這樣的一種思想，想把中國的封建的家族關係和宗族關係看做中國社會永久不變的基礎，並企圖從這基礎上來說明中國的一切道德、文化、政治、革命等等的問題。甚至於把這些關係理想化了，以爲在舊的家族關係基礎上，也可以建立起一個新中國。這種思想，是把家族在社會史上的作用估計得錯誤了。依據唯物史觀的科學理論，社會歷史發

展的基本的推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在一定生產力發展階段上的一定的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的性質。家族的關係，也是因着生產力發展程度的不同，因着社會的生產方式的不同，而採取着不同的形式的。

因此，家族的形式，必須要適應着一定社會經濟結構的形式，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化時，家族形式也要跟着變化。這理由是很明白的：人類在進行一切文化政治等等活動之先，首先要求得物質生活的一定程度的滿足，在進行子女的生產之先，首先要維持個體本身的生活。所以，首先是要有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家族的關係，兩性的結合，只能以這物質的生產過程為基礎，適應着這生產發展的階段，而採取一定的形式。沒有永久不變的家族關係或家族形式（馬克思說：「把基督教的日爾曼的家族形態絕對看待，正像把古羅馬的、希臘的、或東洋的家族形態絕對看待一樣，都是非常愚陋的見解。」——「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隨着社會形態的變化發展，家族關係也變化發展。原始共產制時代的家族關係和私有財產制的家族關係不同，私有財產時代裡，也隨着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的發展而家族形式也有不同的發展。中國的封建家族形式和家族關係，是中國的封建經濟基礎上，適應於中國的過去的低度生產力水準（以自然經濟為主的）的家族形式。這種家族形式是會變化，而且現在已經起了變化的了。

家族的發展，怎樣被勞動生產力所決定呢？一般地說，勞動的發展愈幼稚，生產力愈低，人類的經濟生活的發展範圍愈狹小，則人類中間的活動和相互關係愈要被限制於血族的系統之內。血統關係和家族關係也愈在社會制度中起其作用。在原始共產制社會的時候，家族關係在社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原始共產社會崩潰以後，生產力的進步，私有財產的出現和階級的產生，使家族關係適應着這種新的經濟基礎而發生一大變化，在這裡，我們就可以明顯地看出家族關係是受財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的支配的。一直要到私有財產制度消滅，新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的建立的時候（在蘇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社

會階段），才能够有真正美滿的自由幸福的新的家族關係。

這就是家族關係的發展的最簡略的圖畫，恩格斯說：

「勞動的發展愈幼稚，它的生產之量，從而社會之財富愈有限制，那末，社會制度愈可看出是受血統關係的支配的。然而，在以血統關係為基礎的社會組織之下，勞動之生產力逐漸發達，同時，私有財產與交換，貧富之差別，他人勞動力之掠奪，從而階級對立之基礎也漸被形成。這種新的社會要素，竭力謀使舊的社會制度適應於新的境遇，一直到了兩者調和的可能性告終，遂引起一個完全的革命。這個以血統關係為基礎的舊社會，在和新發展的社會諸階級之衝突中，就被廢除。以後新的社會出現，……在這個社會中，家族關係完全受制於財產關係，而構成從來一切成文歷史的內容之階級對立及階級鬭爭，也由此自由發展。」

（同前）

這是描寫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私有財產社會中間的家族關係的變化。關於私有財產過渡到高級共產主義社會的家族關係的變化，恩格斯這樣說：

「跟着生產手段之轉化為社會的財產，一夫一妻制也不復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私的家政變為一種社會的產業，子女的教養成為一種公共的事務。社會對於兒童，無論是合法的或是私生的，都平等地養護，這使得現在成為本質的社會因素的（道德的及經濟的）阻止一個女子無條件地委身於所愛男子的那種對於『結果』之顧慮，可以除去。」（同前，第二章）

以上只是一個簡單的素描，以再作詳細的說明。

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生產力最低度發展

二、原始共產社會的家族 ..... 時代的社會形態。然而就是在這種社會形態的範圍  
..... 以內，生產力也決不是只停止在一個固定的水準上  
..... 的，在這裡，生產力的發展也有不同的水準和不同的  
..... 階段，隨着這生產力發展的不同的水準和不同的

階段，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也分成了不同的發展時期。依據恩格斯所給予的劃分，大體上有兩個時期，從使用粗石器到發明弓箭，即主要依靠漁獵爲生的時代，是蒙昧時期；從發明弓箭到金屬的鎔鑄，即主要依靠畜牧和初步的耕種爲生的時代，是野蠻時期；野蠻時期更進一步的發展，是文明時期，文明時期已進入了階級社會，而不是原始共產主義時代了。在以上所說的兩個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時期裡，人類的家族形式是怎樣發展的呢？

人類開始從動物脫離的時候，是無所謂家族，而只是群居的集團。那時，人類的個體是防禦能力極薄弱的，要維持人的生活，要在自然界爭取生存，首先必須採取經常群居的生活，依靠群的力量以增強防禦的能力。這時人類兩性的關係，是採取集團婚或「無規律性交」的形式，即「在那種情形下，全團的男子與全團的女子互爲所有」。

(同前) 為什麼要採取這樣的形式呢？因爲在那樣力量微弱而數量又小的集團裡，一定要採取這樣的形式才能維持和鞏固群居的生活，才不至於因性的嫉妒而妨害了群的生活。這是人類脫離了動物的第一步，而動物則不能這樣做。在動物界裡：「爲家族的紐帶又爲其限制的雄之嫉妒，引起動物家族對群的對抗。較高級的群居形態的群，爲了雄的嫉妒，不是變爲不可能，便是被弛緩了，或者在交尾期間被解體了。即算在最好的場合，也要阻止牠的發達。」因此，「爲脫離動物性而向上發達，爲實現自然所指示的最大的進步，尚有一個要素是不可缺的，即由全群的協力與合作，以補足個體所不足的防禦能力。……但只有已成年的雄之相互忍耐與由嫉妒之解放，才是構成那樣大而且永常的集團之第一條件，而由野獸到人類的進化，便惟有在那種集團內能以實現。」(同前，第二章)

● 由「無規律性交」的集團婚向前發展（由於生產力的較進一步的發展和群團的數量的增大），就有以下兩種更進一步集團婚的形式：

一、血緣家族：在這裡「無規律的性交」是第一步受到了限制，雖然仍是集團婚的形式，然而只能在同輩中間實行，父母一輩只能與

父母一輩的男女互相結合，而不能與子女一輩的男女結合。這樣「在家族的範圍內，所有祖父皆互夫妻，他們的子女（即父母）也是一樣，再由他們的子女成為共同配偶的第三群，這批人的子女，即第一群的曾孫們，又成為第四群。……」

二、普那路安家族 (PunaLuan, Family)，是比血緣家族較進一步的形式，結婚集團更受限制，不但禁止親子間及不同輩的世代中間的性交，而且禁止兄弟姊妹間的性交。這種集團婚的形式，是逐漸形成的，首先是由最近親的兄弟姊妹開始禁止起，漸漸再達到遠緣的兄弟姊妹。所以稱為普那路安家族，是根據夏威夷的一種土人的情形而取名的。在這些土人中，有兄弟關係的男子集團互稱為普那路安，他們和與他們沒有姊妹關係的女子集團結婚，而這些女子還互稱為普那路安。普那路安家族的形式出現以後，用一定方法來識別兄弟姊妹關係就成為必要，於是氏族社會就發生起來。又因為在集團婚的情形下，所生子女只能確定誰是他們的母親而不能確定誰是父親，血緣的關係只能由女子方面得到證明，所以氏族關係都是依照母系來繼承的。這就有了母系社會或「母權」社會的形式。這樣，在普那路安家族的基礎之上，原始社會的部落內部就分成了許多母系的氏族部落，「在氏族內部是都絕對禁止通婚的，某一氏族的男子雖能在部落內部娶他們的妻，而且普通原是這樣做的，然而他們必須從氏族外部娶妻」。（同前，第四版序）

由血緣家族發展到普那路安家族，中間還可以有種種過渡的中間形式。但普那路安家族，是集團婚家族的最高發展形式，由普那路安家族再進一步發展，就衝破了集團婚的形式而走向對偶婚的形式了。

所謂對偶家族，是「某種程度的對偶關係，時期雖有長短……一個丈夫在他的許多妻中間，有一個正妻（還不能稱她為愛妻），而他對於她也是許多婦中間的一個主婦」。（同前）這就是說，在一定的時期內，一個男子與一個女子共同過活，這種關係可以自由脫離，或再自由結合。這和集團婚已不同，而是成為一男一女的單獨的結婚了

，但對偶婚的這種結合關係，不是永久的，而是一時的，所以不能夠形成正式一夫一妻的家族，血統關係也仍是依母系繼承的。

對偶家族是野蠻時代的主要的家族形態，它「發生於蒙昧與野蠻之間的境界上。大概是在蒙昧的末期，還有幾處是在野蠻的初期。這是野蠻時代的典型的家族形態，正猶集團婚之於蒙昧，一夫一妻制之於文明一樣」。（同前）「對偶家族出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親族間的婚姻限制的習慣向前發展的結果，這種婚姻限制之益見盛行，於是集團婚成為愈不可能，由對偶婚起而代之」，（同前）另一方面是由於勞動生產力發展，工具進步，生產品增加，人口密度增大，私有財產的萌芽，使集團婚的必要因此就漸漸減小了。

對偶家族再向前發展。到社會經濟的基礎的發展已使私有財產成為重要的因素時，就過渡到一夫一妻制了。

一夫一妻制，就是以一男一女的結合為基礎的。  
三、一夫一妻制的家族制度，它和對偶家族不同的地方，「是在婚姻的約束更來得堅固持久，所以不能由雙方任意解除」。（同前）然而這並不是雙方平等的結合，相反的，一夫一妻制的發生是女系氏族的崩潰，和男權制度的建立，一夫一妻制只是男權確立的表現，是剝削女性的自由而把她們隸屬到男子的支配下的表現，所以，解除婚約的權利，仍保留在男子方面。「通常，仍是只有男子得解除婚約，離棄他的妻，男子的通姦的特權也依然至少是由習慣而得保證」。（同前）

一夫一妻制的發生在野蠻的末期，這時勞動生產力更發展，生產物已不僅僅只能維持生活，而有了相當的剩餘，私有財產和奴隸的使用也產生了。一夫一妻制為什麼在這樣的時代發生呢？

首先是由於財富愈增加，男子在家族的地位也愈比女子重要」，因為，「依據那時期家族內的分工，獲得食物及製造所必要的工具之責任，由男子擔負。因之他佔有了那些工具」。生產力愈發展，工具的佔有者在經濟上的地位也愈重要，由工具的佔有者進而為「新的生

存資料即家畜的所有者，後來便是新的勞動力即奴隸的所有者」。財富的佔有的增加，使他們發生一種新的慾望：想使這些財富給自己的子女來繼承。為了這目的，就不能不打破女系氏族制度，因為女系的氏族制度是不容許男系的子女實行繼承權的。於是就要建立男權，而將女子降到附屬的地位。

另一方面，女子自身方面也有着一夫一妻制的要求。因為，社會經濟愈發展，男子在生產上的地位愈重要，則男女關係也自然地發生了變化，而女子在社會上也更會感受到壓迫，例如在對偶婚時期，社會雖然仍是女系氏族，而女子也仍被尊敬，但已經由於結婚的限制而感到女子的缺少，由女子缺少的感覺，而發生了女子的買賣和掠奪，掠奪和買賣的發展，使女子感到很大的痛苦，因此，在她們則不如委身於一個男子還好些，恩格斯說：「在經濟發展過程上，跟着發生古代共產主義的沒落與人口密度的增大，從而傳統的性關係愈加失去了它們的適於原始森林時代的素樸的性質，於是在女子方面也自然的感到更低微更被壓迫，……使暫時的和永久的只與一個男子結婚以資救濟的希望，也不得不更加強。」（以上引句皆同前）由於女性方面也有這種要求，所以一夫一妻制的成立以至於向男權制度的變革，「決不如我們今日所想到的那樣困難。因為這一革命（人類所曾經經驗過的最激烈的革命之一），並沒有須侵害氏族中任何一個活着的氏族員的必要，全體氏族員仍然照常過活，只要有一個簡單的決議，從今以後，男子氏族員的子女應屬於氏族，女子氏族員的子女應該除外而轉屬於他們的父之氏族，就很够了」。（同前）

一夫一妻制的家族，是採取「家長制家族」的形式而存在，並不是簡單一男一女的結合。即「在父權之下，家長有妻子，及許多奴隸」。男子為一家之長，他的妻、子、女、奴隸完全隸屬於他的支配之下，他對他們有生殺予奪之權。

所以，一夫一妻的產生，總括起來，有以下的特點：（一）一夫一妻制的出現是表示女性地位的降低，她們成為滿足男子慾望及生產

子女的工具；（二）一夫一妻制的建立的目的，是爲着生產男系的合法的財產繼承人；（三）一夫一妻制是建立在階級壓迫的基礎上，一切階級社會的家族關係，都是男權的一夫一妻制，婦女是處於被壓迫的地位。奴隸制時代婦女的地位，實際上也只等於奴隸的地位，「最初的階級壓迫是與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相一致的」；（四）家長制家族的一夫一妻制包含着以後一切的階級社會的家族形式之萌芽，它的基本特點和矛盾都在以後階級社會的家族形式裡發展着，所以馬克思說：「近代的家族（指家長制家族——作者），因當時與農業有了關係，所以在胎種中，不僅包含奴隸制，也包含農奴制，它是具體而微地包含以後社會及由社會所發生的國家中所更普遍發展的一切對立。」

（同前）

這樣，一夫一妻制並不是男女雙方平等自願的結合形式，相反的，這種結合是建立在男性的權力強制之上。女子的婚姻，也不是自由的，在奴隸制及封建制時代一方面要由父母的意思來決定，另一方面要由財產來決定，因此，就伴隨着形成買賣婚姻的制度。就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婚姻採取自由結合的形式，然而這種結合，也要受到財產經濟的束縛和限制，所以不是真正自由的。正是由於這種原因，所以在一夫一妻制發展過程中，雜婚和亂交的男女關係並不消滅，它還是以種種形式，甚至於最惡劣的形式繼續進行。在男子方面就應用他們的優越的特權實行一夫多妻、嫖娼或通姦之類的性生活，而在女子方面，通姦和賣淫也成爲文明史上的不可少的隨伴物，成爲片面貞操的一種必然的對抗物。

。 . . . .  
四、封建  
時代的家  
族制度  
. . . . .  
秩序。

封建制度是以自然經濟下分散經營的農業生產和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爲基礎。封建剝削的方法是在於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用政治的、道德的、法律的等等經濟外的力量，強制地剝削農民。封建的家族關係，也就必須適應着這一種剝削關係和統治

因此，更嚴格的、更發展了的家長制家族，家族中的宗法制度，就成為封建家族的典型的形式。男性的家長是一家的最高的支配者，是財產的唯一的所有者。在一個家族之內輩分的關係，都有一定的規則和禮法，父子、兄弟、夫婦、以及一切遠近的親族，都要按照一定的輩分的秩序互相發生關係。由於看重這種秩序，所以宗族觀念就非常發達，自己的宗族和別的宗族中間界限看得很嚴。而這宗族自然是男系的宗族。這種宗族制度，正是封建割據制度的基礎，中國的封建制度，就是以宗族制度為構成原素的。

家長又是封建財產的所有者，家長以下的一切家族成員，不過是不同輩分的財產管理的助手和勞動的被剝削者。財產的繼承權，在這裡被看得非常重要，財產必須遺傳與長子，所以結婚的目的首先就是為要生產合法的繼承財產的長子。如果妻子不能生產這長子，她就要被輕視甚至於被離棄，而丈夫則可以娶別家的女子。

因為特別重視家族的合法系統，所以一夫一妻制也就特別強化和發展，而成為終身的一夫一妻制了。「白頭偕老」，是這種家族制下的理想，除非萬不得已，一般是不許解除婚約的。但這自然也只是對於女子方面的片面的要求，所以女子要「嫁鷄隨鷄，嫁狗隨狗」，而這片面性是達到這樣的程度；對於女子不但要求丈夫在世時的貞操，而且要求丈夫死後的守節，終生只允許她做一個家族裡的人，否則就是紊亂宗族關係，被看做很大的罪惡。而在丈夫一方面，則雜婚，一夫多妻的生活却是當然的權利。

女子在家族中的地位，也等於農奴的地位，她們對於男權壓迫和苦痛必須要能够忍耐、服從，所謂要有「三從四德」。她們要擔負極大的過度的勞動，除了生產子女管理家政之外，常常還要幫助生產。

以上只是說到封建家族的一般的形式。在封建社會裡，各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是不同的，所以家族形式也各表現不同的特點。例如在統治階級的上層，結婚又可以只是為着男子滿足肉慾的快樂，女性就被當做玩弄的工具。皇帝則甚至可以在自己的宮中蓄養成千成萬的女

子。其次，婚姻又可以成為封建政治上的一種手段。在中國，父母為子女選擇婚姻對象時，要注意到「門當戶對」，為的是統治者要與統治者在婚姻關係上互相結合，以增強共同的力量。在西歐也是一樣：「無論對於武士及領主，或對於王侯，結婚都只是一種政治的行為，一個由新的同盟以增進勢力的機會。」（同前）

在農民中間，家族關係也和他們被剝削的地位相適應的。農民的結婚，主要的目的倒不是生產有合法繼承權的子女，而是一方面男子為着得到一個勞動的有力幫手（除家政之外，土地耕作要女子幫忙，照料家畜、紡織等都要女子擔負），另一方面，生產子女，也是為着增加家族內的勞動力。對於農民的婚姻，地主有干涉的權力，特別是在歐洲的農奴制度中，地主對於農民的婚姻，首先有任意使他們結合和脫離的權力，其次有所謂「初夜權」，農民結婚時，領主首先要和他的新娘過初夜，如果農民不願意，就必須繳納一定的物質作為贖價。

封建時代的都市市民，如手工業者的家族，也不能不適應他們的勞動生產的性質。為了保證職業上的特權，保守行業內的秘密，結婚的選擇對象就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制，也因此不能不守一夫一妻制（自然也只是對女性方面的），恩格斯說：「保護他們的特權，行會的規約，法律上或由個別行會，或由他們的職工及學徒以區別他們的瑣細的境界，這種種已經使得選擇適當配偶的範圍十分狹隘，故在此種複雜的制度之下，決定那個女子為最適當的問題者，絕對不是由於個人的好惡，而是由於家族的利害。」（同前）

資本主義是在封建社會倒壞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它破壞了封建的經濟基礎，因此也破壞了封建社會的各種制度（包含家族制度）。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破壞了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因此也破壞了自給自足的家族單位，「把農工業的幼稚未發展的形態互相綜合起來的固有的血族繫帶，被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完全

斬斷了」。（「資本論」同前）在自給自足的經營之下，必須能够分擔各種業務的較大的家族，這種封建的家長制的大家族，在資本主義的洪水前面被衝決解體，於是就產生資本主義的小家族制度，資本主義利於要打破大家族而形成小家族，因為小家族不是自給自足的而是適應於商品經濟的，所以，像在我國五四文化運動（這是一種資產階級啓蒙運動）中，在家族問題上就提出了建立小家庭的要求，而這「分散的小家庭，也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才成為支配的東西」。（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這是資本主義的家族形式的第一特點。

其次，資本對於勞動的剝削關係，在表面上好像是建立在「平等」和「自由」契約的法律基礎上的，在這種「自由」「平等」的外表之下，實行着對於勞動者的奴役。這種表面上的「自由」「平等」，也反映到婚姻的關係上，（自由）戀愛的要求就被提出來了。在這以前，一夫一妻的結合，一般都由父母或家長之類的人來決定的，現在却要以男女雙方的愛情為基礎，而結婚也得是根據當事人的自願的契約了。「戀愛結婚已被宣言為一種人權，不只是男子的權利，而且是女子的權利」。（恩格斯，同前）這樣，形式上根據自由意志的結婚，是資本主義社會家族形式第二個特點。

但資本家與勞動者的買賣契約的「自由」只是表面上的自由，雙方的法律上的平等的外表下面，隱藏着經濟上奴役的內容。在婚姻的關係上，也是一樣的。自由的契約，其實只是商品買賣性質的契約。所以，在資本主義下的家族，就有以下的不自由不平等的實際：（一）家庭的生活是資產階級的特權。資產階級的家庭是建築在商品買賣的基礎上，「建築在資本之上，建築在私人贏利之上。充分發展的家庭只是對於資產階級存在着，而成爲它的補充的却是無產階級被壓迫的無家庭狀態與公娼」。（「共產黨宣言」）（二）就是資產階級的婚姻，也並不是真正自由的愛情的結合，而是受到資本主義經濟條件的一定的限制的。「支配階級依然受支配於大家所熟知的經濟影響，故僅在例外的時候，才表示自由選擇的婚姻」。（恩格斯，同前）（三

) 就是資產階級的家庭，也仍是男權制的家庭，婦女實際上仍只是處於被奴役的地位，而男子則依據他們的權力以進行各種方式的多妻的性生活，不管法律上對於形式上的重婚是怎樣加以禁止。「資產階級把他的妻子看做簡單的生產器具，……我們的資產階級並不因為有其工人的妻女供其支配而感到滿足，更不用說公開的娼妓制度了，他們還更以互相引誘彼此的妻子為最大的快樂。資產階級的婚姻在實際上是公妻制」。(「共產黨宣言」)

至於無產階級的家族，在資本主義下却遭受到破毀的慘劇。長時間過度的勞動，低廉的僅够（而且時常不够）維持最低生活的工資，已經使無產階級失去了享受家庭生活樂趣的保證。隨着資本主義機械大工業的發展，婦女和兒童的勞動力更多地成為資本家剝削的對象，而成年勞動者常常被拋棄在失業的隊裡，於是勞動者被壓着不能不使他的妻室兒女，都離開家庭，而作為資本主義的榨血機下的犧牲品。「勞動者在以前會販賣他自己的勞動力，他在形式上是作為自由人而支配着自己本身的勞動力。但現在他連妻和子也要販賣了，他成為奴隸商人了」。(「資本論」第十三章)於是，家庭的聯繫就被破壞，妻子不再在家照顧家務，小孩失去了母親的看管，父母與兒童的感情，被毀壞了，「由於母親從事於家庭外的勞動的結果，兒童的看管，就被忽略，就酷虐化了。特別是營養的不足和不良，以及常服安眠藥的緣故，就成為兒童死亡率增高的主要原因。再加上母親對自己的子女不自然地疏遠了，因此故意不給與食物或給與有毒的食物，也是原因之一」。「暗中的嬰兒殺害和對兒童投安眠藥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同前)由於兒童轉化為被榨取的對象，於是他們的教育也荒廢了。「把未成熟的人弄成單純的剩餘價值製造機，因而人工地造成了人知的荒廢」。(同前)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出由於從來的家族制度及與之相伴的家族勞動的經濟基礎被大工業分解了的結果，從來的家族關係本身也就分解了」。(同前)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之前，假惺惺地提倡說要維持家庭的良好關係，要保障兒童的教育和親子間的

親愛的感情，而實際上却正是資本主義破壞了這良好的關係和親愛的感情，所以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中間的一切家庭聯繫越是由於大工業而趨於破毀，兒童越是轉成簡單的商業產品與勞動器具，則資產階級關於家庭教育，以及父母與兒童親密關係等等的論調，也越是足以發噓。」（「共產黨宣言」）

但是，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够領導勞動民衆去創造共產主義新社會的階級。在家族方面也是一樣，不管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面是遭受着多少可怕的苦難，無產階級的家族的分解和破壞的景象是多麼悽慘，而在這裡，却已經產生了某些更高級的新的家族形態之條件，包含着更合理的男女關係之萌芽。資本主義破壞了封建經濟基礎上的舊家族制度，產生了新的經濟基礎，但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不容許無產階級建立合理的新家族制度，一切苦難，正是由於這一矛盾產生的。首先，無產階級沒有生產手段的私有，因此，在他們中間的婚姻，就不要而且不能建立在資本主義財產的基礎之上，「一切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基礎已被廢除，一切財產，即專爲它的保護與承繼，使一夫一妻制與男子支配因以確立的，皆不存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其次，憑藉於財產佔有之上的男子的支配權也消滅了，特別是婦女勞動的普遍使用，婦女從家庭轉到勞動市場上來，她們一樣的與男子參加生產活動，真正男女雙方平等自願的結婚也開始可能了。「保護男子支配的民法，僅能應用於財產所有階級及他們與無產階級的交涉上，要適用民法是需要金錢的，勞動者因爲貧乏，所以民法在他對於妻的關係上，就無意義」。（同前）更次。舊的親子間的關係破壞，決不是由於無產階級的人類情感的破壞，而只是說明，新發生的經濟基礎，要求着一種新的家族關係的建立（而這正是創造新社會的任務之一。它也只有在新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完成），要求把「私有家政變爲一種社會產業，子女的教養成爲一種公共的事務，社會對於一切兒童，無論是合理的或私生的，都平等地養護……」。（同前）

這樣，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面，無產階級的婚姻，已經是比資產階級的以至於從來男權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為合理了，已是比較基於自由平等的原則上的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支配階級依然受支配於大家所熟知的經濟影響……但在被壓迫階級中，戀愛結婚却是通例」、「男子對於妻的關係上的性愛，僅在被壓迫階級中間，在今日的無產階級中間，成為，也得成為真實的規則」。「女子在事實上已恢復了離婚的權利，假使夫婦不能和好的話，他們寧願分離」。（同前）

這樣，我們就在無產階級的男女關係中看出了高級社會的更合理的家族形態一個輪廓，馬克思說：

「不管資本制度內部所進行的從來的家族制度是如何可怕和可厭，但大工業這東西，在社會地組織於家庭圈的彼方的生產過程內部，給婦人和青年男女以及幼童等安排了極重大的任務，因此，就給家庭及男女關係的更高級的形態造出了新的經濟基礎。」（「資本論」十三章）

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下的家族

當然，在無產階級的男女關係裡只看見高級的家族關係的萌芽，而不是說真正自由意志的平等的婚姻已經實現了，這一個實現，是必須要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條件下才會完成的。隨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建立，才能實現新的家族關係，所以列寧對蔡特金的談話中，就指出這種過渡是「一個遲緩的和往往很痛苦的消滅和產生的過程」。然而，這一個過程，在蘇聯已完成了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的社會已經建成，我們已經看到新的家族形式，已在那兒實現着了。

首先在蘇聯階級剝削制度已被消滅了，這就是，建立在私有財產和剝削制度上的男權基礎沒有了。因此，片面的束縛女性，使她們處於奴役地位的婚姻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據。男女的結合，已不必再有財產上經濟上的顧慮和限制，而可以做到（從來任何時代所不能

達到的）以愛情爲基礎的自願的婚姻。

同時，在這社會主義共和國下面，勞動婦女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上都獲得了在法律上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婦女有與男子平等的參加政治，管理國家政權的權利，在勞動生產領域中，與男子同樣熟練程度的工作有獲得同樣報酬的權利，婦女與男子有結婚和離婚的自由，取消了私生子和合法子的區分，在結婚之後，婦女和男子仍各自參加工作，……這一切都給予男女真正平等自由的婚姻以一種經濟上、政治上的保障，特別是對於婦女的保障，這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都不能夠做到的，列寧於一九二一年在「國際勞動婦女節」一文裡說：

「在我們蘇俄，男女在法律上的不平等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了。婚姻和親族法中特別卑污的、下賤的、虛偽的不平等，和對於兒童的不平等，都爲蘇維埃政權所完全消滅了。這不過是走向婦女解放的第一步。可是任何一個甚至較爲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都不敢走這第一步。」

的確，這是任何資產階級的國家都不敢走的第一步，然而在這一九二一年也才只是說到第一步，目前的蘇聯，已不僅僅只走了這一步，而是遠遠地向前邁進了。因爲僅僅法律上的平等還不能實現真正事實上的男女平等，正如列寧所說：「要使婦女完全解放和達到她和男子的實際平等，必須要建立社會的經濟，必須要讓婦女參加一般的生產勞動。」

因此，在最近蘇聯的新憲法中，已具體地這樣規定了婦女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平等權利：

「蘇聯婦女在經濟的、國家的、文化的和社會政治的一切生活領域內，均與男子享有平等權利。」

「實現這些女權的可能，藉下列各種規定而得保證，賦予婦女以與男子平等的勞動權利，平等的勞動報酬，享受休息、社會保險和教育的平等權利，國家對母性和兒童利益的保護，婦女懷孕期間給予休假，薪工照給，廣大的產兒院、托兒所和幼稚園網的佈置。」

因此在蘇聯，婦女都廣泛地被吸收到社會主義的生產勞動中去，一九三八年，在蘇聯的產業和機關中服務的，有九百萬以上的婦女，佔蘇聯全體工人和僱員的三分之一以上，單單在大工業中工作的，一九三七年約有十萬女工程師和女技術員。婦女愈來愈廣大地被吸收到一切勞動部門中去……生產、科學、藝術。愈來愈多的女子變成工程師、醫師、教員、科學工作者。有百分之三十的科學工作者是婦女。婦女對生產勞動的參加既廣泛的發展，同時家政事務也轉化為社會的事業，公共食堂、托兒所、嬰兒院、幼稚園、公共洗衣所、公共澡堂等等的設立，更解消了她們對瑣碎事務的關心，也就是使她們從家庭奴役的情況之下解放出來，而有了享受充分家庭樂趣的可能。

由於婦女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地位的提高，因此在家族中她們的地位也提高了。在階級社會裡，婦女是處於被壓迫的地位的，而在蘇聯，她們因為在經濟上是完全獨立的，她們決不像在資本主義社會或其他階級社會那樣，要依靠自己的父親‘丈夫和兒子的地位來決定自己的地位，而是依靠她們自己。因此她們在家族中，也決不是男人的奴隸，而是他們的同志戰士，是他們的朋友和新生活的共同的積極的建設者。

同時，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也改變了。蘇聯的男子在結婚以前，已用不着顧慮是否有能力贍養妻子以至於新嫁娘的粧奩之類的問題，結婚以後也不至於為着家庭經濟的負擔而成爲經濟的奴隸，他們的結婚，不論男女雙方，都可以完全憑愛情來決定。

隨着社會主義的勝利，蘇聯國家對於母性和兒童的保護就愈更周密，但這並不是說，父母對於兒童的保護教育，就可以完全放棄責任和義務。相反地，這責任和義務是更被看得重大，因爲養護兒童，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對於全社會的責任，如果父母放棄這種責任，對於蘇聯國家和社會都是有害的。但蘇聯的父母對於兒童的養護，和階級社會裡的養護完全是兩回事。後者是用私有財產的精神去教育兒童，把自身的利益、家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蘇聯父母對兒童的教育

不僅僅是要使兒童注意到自己的清潔健康，而且要與兒童教養機關（托兒所、幼稚園、小學校等）共同把兒童培養成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積極工作者。」

在蘇聯，個人的家庭利益和整個社會的利益是一致的，因為家族生活的幸福，完全依據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新家族生存和繁榮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蘇聯家族中的成員對於全蘇聯社會的一切問題，都不能袖手旁觀的態度。蘇聯的家族，不像資產階級的家族那樣，只注意自己的狹隘的家族利益。它不是自私自利的脫離全社會利益而孤立的細胞；相反地，它關切着全國人民與全世界勞動人民及被壓迫民族的一切問題。

現在我們來說共產主義的家族制度，一般地說究竟是什麼樣的家族制度？

我們可以說，在共產主義社會下面的家族，將是舊的一夫一妻制的消滅。因為舊的一夫一妻制是建立在私有財產制下的、商業性的、虛偽的一夫一妻制，是以階級剝削為基礎的女性方面片面的一夫一妻制，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裡舊的「一夫一妻制之經濟基礎將與其補充物的賣淫之經濟基礎，同歸於消滅。……既然一夫一妻制是由經濟的原因發生的，那末，當這種原因消滅的時候，它不是也要消滅嗎？」（「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

舊的虛偽的一夫一妻制將要消滅！可是新的真正合理的一夫一妻制，要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真正美滿地實現起來。因為祇有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才有真正自由自願的一男一女的結合，恩格斯說：「一個人可以有理由地回答，它（即一夫一妻制——作者）不僅不消滅，反將充分實現，因為把生產手段轉化為社會的財產，……為金錢而獻身的必要却要歸於消滅。賣淫消滅了，一夫一妻制不是沒落，將終成為現實——對於男子也復如此。」（同前）在已經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蘇聯，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真正自由的沒有強制的一夫一妻制度，真正夫妻親愛，父慈子孝，兄弟友好，敬長養老的美滿的快樂的

新的家族生活了。

對於社會主義底一夫一妻制家庭起着重大的鞏固作用的，是夫妻兩造高度的文化水準，排除對婚姻的輕浮態度的那種高度的自覺性，此外，自願的訂婚，絲毫不帶有父母的強迫性；自願的維持婚配，而兩造中任何一造隨時有離婚之權，——這種情形也是鞏固社會主義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要因。假如夫妻間的愛情已經失去而只存在着互相憎厭的時候，則不論丈夫或妻子都沒有瞞騙對方的必要，因為社會主義之下的離婚自由權，給予這些人們以脫離的機會。然而馬克思列寧主義雖然主張離婚自由，却並不主張社會主義社會內實行混亂的兩性關係實行經常不斷的胡亂離婚。恰恰相反，它是這種混亂的兩性關係底反對者，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激烈的反對資產階級理論家，後者庸俗化地解釋共產主義社會，誹謗式地宣佈說，彷彿共產主義社會是實行公妻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這一誹謗還給誹謗者，他們指出公妻實際上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公私娼妓制便是公妻底具體表現；而這種現象在共產主義社會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當結婚錯了的時候，當夫妻底共同生活由於某些重大的原因而變成不能忍受和痛苦的時候，當丈夫和妻子不再相互信任而政治上互不相容或甚至互相敵視的時候，——只有遇到這樣的特殊場合時，才有藉助於離婚自由權的必要。這是與社會主義社會原則完全相適合的。在這種社會內，當權利平等的夫妻業已水火不相容的時候，要強制他們繼續維持婚居關係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場合，男女繼續共同生活對於兒女也是不利的，因為父母間的不和睦是對兒童的不良的教育方法。我們也不應該這樣解釋離婚自由，以為離婚自由是人們在社會主義社會利用來滿足其厭舊喜新的情慾目的的護符。對於這種利用離婚自由以達到淫慾自由的人們，社會主義國家和輿論常予以嚴厲的制裁。

賣淫的消滅和這裡所說的新的合理的一夫一妻制的實現，在蘇聯已可以看出榜樣，蘇聯能達到今天的地步，自然不是輕易的，就和社

會主義的建設一樣，「它是經過了艱苦的、痛苦的消滅和產生的過程」才達到今天的成績。例如賣淫，是隨伴着革命後二十年來的建設，經過堅持的鬪爭才被消滅了的。

另外在蘇聯革命初期，青年中曾發生了所謂「杯水主義」的性生活問題。在革命後內戰的幾年間，因為忙於戰鬪，男女的問題，在蘇聯是較少機會發生的。但內戰結束，新經濟政策時期開始以後，某些青年學生中間會發生了一種放蕩無紀律的無限制的離婚生活，他們否認愛情，以為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的表現，他們主張男女的性關係只是像口渴了喝一杯水一樣，只要能解一時的渴就够了。這種主張的實行，對於青年男女的工作上、生活上、健康上和精神上，都發生惡劣的影響。列寧對於這種行為，曾極力反對，他向蔡特金說：「對於性生活問題的青年們的瘋狂態度……這和我們共產主義者所理解的自由戀愛沒有甚麼共通的地方。不用說你定知道那有名的理論，說在共產主義社會，滿足性慾或戀愛的慾求，是如同喝乾一杯白水一樣的簡單而毫無甚麼。為了這種『杯水主義』的理論，我國的青年們簡直變成瘋狂了。這理論釀成了許多青年們或少女們的惡劣的運命。這種理論的信服者們，硬把這種理論斷言為馬克思主義的。有這樣的馬克思主義，那才真是希罕的事！」

列寧曾指出這「杯水主義」的主張的荒謬，他指出喝一杯水只是一個人的事，然而性的關係却是兩個人的事，同時也是社會的事，是對於革命的工作有影響的。這種混亂瘋狂的行為，是革命所不容許的，也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

這是蘇聯過去對於男女關係方面的壞傾向的鬪爭，自然，現在蘇聯的家族關係中，還存在着舊社會惡習的某些殘餘，蘇聯正在和它們進行鬪爭：

「一種可惡的舊社會的殘餘行為便是對母性和兒童的罪惡態度。蘇聯還存在着有這樣的『父親』，他們對於離婚後所產生的兒女（留養在母親那裡的兒女）不給予應該的兒女養育費。這類『父親』從一

個城市漂遊到別個城市，用種種方法隱瞞自己的行踪，只是爲着想逃避對自己兒女的最少限度的責任。」

「蘇維埃政府要嚴厲地科罰這類的『父親』或『母親』：這種行爲被視爲觸犯刑法，根據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法令，對這種犯人要處以二年的有期徒刑。」

「有些男人把妻子完全看作單純的主婦（家庭婦女），這也是不可容忍的現象，也顯然是舊社會底殘餘，應當與之作鬪爭的。許多男子在外面，在生產中，在社會事業中，都表現爲先進的積極分子，可是在家庭內對妻子却擺出丈夫的架子，他的女人幾乎把全部生命都犧牲在家務中了，可是他却視若無睹，這也是應當消除的現象。」

「此外，宗教迷信的殘餘，也還遺留在今日蘇聯的一部分家庭中——特別是農村家庭中。至於一些文化比較落後的民族中還偶爾有一些個別的事實——如多妻制，買賣婚姻，誘拐女子，禁止女子離開丈夫，女子頭罩面紗等等，也都是舊社會的惡劣殘餘。只有靠堅毅不屈的鬪爭，才能根絕所有這些從資本主義社會，甚至從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殘餘。」（「社會主義下的婚姻和家庭」）

馬克思主義對於家族問題的理論，是建立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的。家庭關係也是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所以，什麼樣的經濟基礎之上，就有什麼樣的家族制度，家族是建立在變化的發展的經濟基礎上，而不是在建立道德觀念上。

所以人類的家族制度，也是變化的，發展的，並且是跟着社會經濟形式的發展而發展，決沒有任何永久不變的家族形式。中國的舊宗法的家族形式，也是變化的，它是從更早更原始的家族形式發展而成，而現在則已經在解體的過程中。把中國的舊家族形式理想化，並企圖以它爲基礎，來解決一切中國目前的道德文化以及革命問題，那是錯誤的、違背時代的思想。

今天我們中國青年男女的兩性問題，必須依據今天中國抗戰的條

件來解決。我們現在最大的任務是在於爭取抗戰的勝利，一切行動要服務於抗戰的利益，婚姻戀愛的行動，也是一樣。一切進步的青年男女應在共同堅持抗戰，男女雙方自願，與不妨礙抗戰工作的三個原則上來解決戀愛問題。在戀愛妨礙抗戰工作時候，就應當避免戀愛。

每一個中華民族男女，都是抗戰的力量，如果因為戀愛問題而使這力量有所損失，那是不應該的。所以，不負責任的任何「杯水主義」的行動，都是每一個抗戰中的進步青年所要嚴戒的。抗戰使中國人民的生活大大改變，舊的家族關係起着急劇的變化，大批青年男女離開家庭參加前線抗戰及抗戰動員工作，廣大的民衆中的婦女兒童在抗戰中漸漸動員起來，在抗戰建國過程中，中國新的家族形式也在產生與發展着了。

以上就是科學的歷史觀對於家族的理解。

## 第七章 意識形態

### 一、心理與意識形態

在社會勞動過程中，人是自覺的個體，能或多或少了解自己對於自然和社會的關係，能或多或少認識物質的自身的存在的規律性，並表示自身的喜怒哀樂。這樣就形成了社會中各成員的心理狀態。各個人的心理狀態，因各人的個性特質以及處境不完全一樣，所以心理狀態也各自不同。但不管這些個性上的不同怎樣複雜，在同一社會內生活的人，因為所依以生存的條件或所處的物質環境互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所以全社會成員的各個人的心理，總有一些共通點，這就形成了所謂一種社會心理。社會心理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民族心理，例如中國人民，不管個性和階級有如何深刻的不同，因為共同生長在中國的土地上，在幾千年來共同的文化傳統的影響下，一旦被外敵侵略時，都能够發生一種共同的仇恨的心理（自然有程度上的各種不同）。這正是我們在抗戰中能够作精神動員的基礎。但是，社會心理也是物質生活的反映，物質生活條件中共同利害愈是迫切，則社會心理也愈是強烈，因此，日本帝國主義愈是加緊侵略，我們民族的反抗心理也愈是堅強。同時，正因為社會心理，物質的基礎，所以，在有階級的社會裡，雖然一方面有全社會一種共同的心理，而另一方面，却並不因此就能消除了各階級間的心理的差異，在中國全國共同的民族心理之下，還存在着各種不同的階級的心理。

階級心理是民族心理的形成的基礎。因為在階級社會裡，決沒有超乎各階級之上，而與階級的利害感覺毫無關係的抽象的民族心理。民族心理，是各階級對於自己民族的關心的總體。而各階級關心自己的民族運命，又是以自己的階級立場為依據的。各階級自己的階級利害與民族全體的利害是否能夠完全一致，這在各階級是互不相同的。這就使各階級對於民族的關心的程度有了差別，也就因為這樣，所以社會中某些階層的分子會成為缺乏民族觀念以至於背叛民族的人。中

國的無產階級所以能够最堅決，最澈底地爲民族革命而戰鬪，就因爲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與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利益是一致的。

階級心理與階級意識的分別是在於：階級心理比較是自發的，驟驟地存在於每一個階級成員中的心理狀態，階級心理是還比較不堅定的，還可能受到其他階級的影響。而階級意識則不是這樣，所謂有了階級意識，就是有了明白的、階級自覺的意思，階級意識愈強，則它的黨性愈強，它爲自己階級而鬪爭的意志愈堅定，愈不易爲其他階級所影響。

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識的分別也是這樣，民族心理還是一樣比較驟驟的對於民族的關心，而民族意識則是表現爲要堅決爲民族而戰鬪的意志。自發的心理和自覺的意識是階級或民族在爲自己的生存而戰鬪的過程中的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民族的精神動員，就在於要把自發的民族心理提高到民族意識的高度。

意識形態，是階級意識採取相對獨立的體系而表現出來的形態。所謂相對獨立的體系，就是說它本來是發生於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基礎上的，但從外表上看起來，它却好像是對物質生活獨立着的東西了。藝術、科學、法律、道德之類，就是各種的意識形態。不但外表上它們有獨立的形態，而且許多意識形態的代表者（藝術家、法律家之類）常常還真以爲它們是絕對獨立的、超然於一切物質利害之上的東西。這種幻想的產生，是因爲意識形態的代表者都是專門的精神勞動者，他們自己專門做意識形態上的琢磨工作，而不參加社會的物質的生產，這種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的分離，使意識形態的代表者忘記了他們的工作對象的物質根源，使他們以爲他們的工作是純粹意識領域的工作。而在實際上，每一種意識形態都有一定的階級基礎的，列寧說：「在被階級的矛盾所分裂了的社會裡，離開階級或超越階級的意識形態，是決不會有的。（「做什麼」）

意識形態很明白的表現某一階級的社會實際的情形。例如，在資產階級和封建制度鬪爭的時代，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主

要特點是：個人主義（這是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的）對於科學的注意（這是發展生產力所必需的）、反迷信、反宗教的思想，以及對於社會進步的信仰；在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已明顯地表現出它的極端反動的性質了，假使以前，資產階級把科學與宗教對立起來；那末，現在却正相反，它的思想代表，百般企圖把科學知識與宗教調和起來。

現在我們來看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無產階級，沒有生產手段的私有，無產階級的基本部分——產業無產階級，在工廠中習慣了紀律化的共同的工作，它的心理，自然不能不是反對個人主義的社會化的。經常的與機器的接觸，使它深刻地敬重科學的思想；工廠的勞動，訓練工人重視紀律和組織。自然，無產階級的最終目的，是解脫資本主義的剝削，建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共產主義的社會裡，友誼的生產的聯合，其中勞動不復帶着強迫的性質，勞動不再是資本家發財的源泉，而是人類創造力的自由的表現。

但是如果不能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之私有財產制，無產階級是不能得到自身解放的。無產階級的社會理想，也是全社會解放的理想。

無產階級從世界客觀存在事物的內在矛盾及其發生發展與不可避免的消滅之過程中，來認識與了解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定出改造世界の方針與方法。因此，無產階級的宇宙觀，是唯物辯證法的。無產階級宇宙觀之所以是唯物的，正是因為無產階級是一個不抹煞實際情形的階級，無產階級總是盡力想認識客觀的現實情形。因此，工人階級相信科學，而與唯心論和宗教作堅決的鬪爭。

最後，只有沒有生產手段私有、毫不袒護剝削制度的無產階級，才能造成革命的意識形態，去無情地堅決地為全人類解脫資本帝國主義剝削壓迫的解放事業而鬪爭。

在研究階級鬪爭的理論時，我們已經看到，階級之中，尚包含許多職業的及其他的集團，它們具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很明顯的，這

些階級下的集團，相互間均有某些不同的心理特點。如熟練工人與不熟練工人，即其一例。固然他們同具工人階級所共通的心理要點，但因為他們職業受到其他階級影響不同的關係，所以使他們中間也還有一些分別。我們已經說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努力想把熟練工人，和整個工人階級割裂開來。比較高些的工資，部分改善熟練工人的生活條件，並給他們以某些較為舒服的生活條件（好的房子、用具等）；結果，一部分貴族工人的代表，就居高臨下地藐視其他工人，自視為特殊的社會階層，放棄階級鬭爭，倡導「階級和平」，叛賣整個工人階級的事業。此外，我們已經說過，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當時還參入好些來自小資產階級的成份，他們時常把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帶到無產階級隊伍中來。無產階級內部這種貴族工人，以及來自小資產階級的分子，就容易受到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外來影響，成為工人階級中散播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影響的社會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產生了和各種右的「左」的機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在社會中有些什麼作用呢？它是自覺共同階級利益，促成相互團結之原素。意識形態的鬭爭「只是社會諸階級的鬭爭的上部構造」（列寧：「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假若我們觀察「自在的階級」，那末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中間還沒有形成明確的意識形態。因階級鬭爭的發展，階級的覺悟，亦逐漸往前發展。「自爲的階級」已具有顯明的共同的意識形態。壓迫階級的意識形態，具有兩種任務：（一）根據於那種表現共同利益的思想體系，以團結本階級。（二）使被壓迫階級服從自己的思想的影響。例如：君主專制政體，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特殊之點，是君主政權和貴族特權的宗教性質。僧侶特別蠱惑農民，說統治者是由上帝決定的。資產階級同樣努力將自己的意識形態麻醉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的報章，有系統的傳導階級合作的意識，批評馬列主義，說它是空想等等。在學校中，訓誨工人小孩，尊敬政府、法律、國會、憲法、教堂、僱主等等。

在革命中，無產階級的堅定的意識形態，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

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時，工人階級‘農民’知識分子之思想上的改造，是一個重大的任務。無產階級革命，形成了這樣的條件，使在其中，無產階級與廣大勞動民衆可以整個地‘廣大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之下，享受過去文化的豐富的遺產，而創造社會主義的文化。隨着階級的消亡，這個文化亦漸漸消失階級的性質，而逐漸轉為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的‘全人類的文化。

每個意識形態，都有一部分人專門來研究和發揮。因此，思想代表者，就成了一種職業的集團，它是勞動分工高度發展的結果。例如工人階級的思想代表者的任務，是在於清楚的代表本階級的整個運動的利益，把科學共產主義的思想，灌輸於無產階級廣大勞動人民之中，克服其他階級對於無產階級有害的影響，團結本階級發揚本階級的黨性，以與階級鬭爭每一階段的任務及生產（革命成功後）的需要相適合。這樣，意識形態是有黨性的，所謂黨性，就是高度發展了的階級自覺性。因此，經濟的結構，是意識形態的發展的物質基礎，它決定了意識形態的特點和其內容。可是同時意識形態的發展，在一定的經濟結構的基礎之上，却也具有自己歷史發展的內在的法則。例如：從笛卡爾（解析幾何的創造者）到牛頓與萊伯尼次（創造微積分）的數學的發展，是為生產的需要所形成的，但同時這上面也存在着一定的意識的論理順序，也受到以前的思想家的影響以及數學和科學之交互影響。換句話說，意識形態，一方面服從經濟發展的規律，就是說意識形態一般發展的方向，是由經濟構造來決定的，可是他方面每個意識形態的發展，却又遵循着一種它自身特有的規律，這種規律，在某種程度下，是依賴於人類思惟的法則的，而與過去的意識形態發生理論上的發展的關係。

新的階級意識形態的產生，一方面是反映這新的階級的需要，一方面又是對於舊的意識形態遺產的批判的接受，所謂批判的接受，就是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而排除有害的傳統。因為這樣，所以一個民族裡的新進階級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是民族的優秀的意識形態。

中國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其產生的根源，首先是由於中國有了無產階級的存在，並有偉大的民族的人民的解放事業。另一方面，這種意識形態，又是中國幾千年來文化思想發展的成果。中國的過去一切優秀的思想家，都曾有過某些共產主義的思想（雖然是空想的），中國的無產階級的思想，是批判地繼承和發揚了這些優秀的成果同時也除去了它的空想成份，使它成為科學的思想，所以，中國現在無產階級的思想，是階級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是優秀的中國民族的意識形態。

好些思想家，在執行本階級的任命時，當時並不自覺他們是保護一定的階級及派別的利益，是經過本階級顏色眼鏡來觀察世界；因為如此，所以他們以為自己的意識，完全不依賴於社會經濟的結構和其物質存在。還不止此，這些思想家還以為他的觀念，影響於全部的社會關係，因此，他便陷於這種幻想，以為觀念的發展，決定了存在的發展。在這些思想家的眼中，意識形態的相對的獨立，變成了絕對的獨立。某些法律家想像着，以為社會經濟的結構，依靠於法律之規範和法律原則之進化。某些哲學家想像着，以為他的觀念，對於社會生活，有決然的影響等等。這些思想家把世界顛倒過來，好像是照相時反射在照相機內的物影一樣。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不會陷於這種意識形態的幻想，因為它自覺地把觀念與階級利益聯繫起來，而此階級利益，正是全社會的真實利益。

在前節我們已經說明，社會意識形態、心理和階級利益之關係，這階級利益，本身又是由經濟結構來決定的。在原始社會中，社會心理，是統一的與整個的；這是後來的階級社會的時代所沒有見過的。很明顯的，未有階級的社會之心理，是直接地表現全社會的經濟需要，而不是表示特殊的階級利益。

因階級區分的發展，以前社會意識形態的統一性與整體性破壞了；在各種的形式中，它開始表現各種不同的階級集團與派別的利益。

二、各種  
意識形態  
的內容特  
點

階級利益之關係，這階級利益，本身又是由經濟結構來決定的。在原始社會中，社會心理，是統一的與整個的；這是後來的階級社會的時代所沒有見過的。很明顯的，未有階級的社會之心理，是直接地表現全社會的經濟需要，而不是表示特殊的階級利益。

我們必須指出，意識形態與經濟間之關係，是不能看得簡單化的。經濟的利益，決定意識形態的特點與內容。可是意識形態反映社會階級的經濟利益，是經過它的各種特有的形式來反映的，所以對於意識形態本身的特點，不能不加以研究：

### 甲、法與道德

經濟與法的關係，比較一切都容易研究；法律的任務，是在於用某種規範，來把現有的財產與階級統治的形式固定化起來。很明顯的，因財產關係的改變，法律的關係，司法原則，法律制度，總而言之，我們所稱為法的一切意識形態，都要變更。例如：等級的君主專制之法，主要的是基於特權的原則之上，土地的私有權和高級的國家位置，都是貴族（與僧侶）的特權。

資本主義財產形式的發展，資產階級國家之建立，形成了資產階級之法，他的主要原則，是形式上的平等，一切等級的廢除。形式平等之建立，是為着誰的利益呢？在資產階級法權中，工人與資本家的關係，是一種商品佔有者的關係，工人是特種商品——勞動力——之所有者，他把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表面的在法律上，資本家與工人好像是平等的，但在事實上，在資本家後面，站着資本的權力，以及保護他們利益的國家政權。而工人所能依據的，僅僅是本階級及其革命同盟軍的組織與覺悟力量。

工人階級在自己的專政時代，也不能放棄社會關係之根據法律的調節，不能放棄法權，因為，國家既然存在，法也不能消滅。但是與資產階級不同，無產階級並不掩飾法之階級性。

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之法權的基本原則，是在於保障工農勞動人民的利益，鞏固與加強社會主義國家，建成社會主義，並保證進向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蘇維埃法律的內容，是由生產力之社會主義化、蘇聯經濟的組織，工農的聯合等等特性來決定的。蘇聯的憲法（國家根本法）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隨着國家經濟、政治狀態的發展而作一定的更改。斯大林憲法，（一九三六年蘇聯蘇維埃大會所通過

的)就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蘇聯的根本法典，是社會主義勝利與工農民主的根本法律。

法律跟着社會階級的變化而變化，道德也是一樣。道德的內容，亦是被階級利益所決定的。過去一些理論家，認為道德觀念，是不依賴任何人的利益的，是根據於永恒規律和原則之上的。他們常說，道德就是正當的行為，就是應該有的行為。他們不知道這只是一句抽象的話，什麼是正當的行為的標準，這是因着時代而變的，因着階級而不同的，倫理學的歷史，明白地給我們指示出道德觀念與經濟利益有密切的關係。在現在，我們認為奴隸制度是不道德的東西，但在古代希臘和以前美國南部的奴主，却以為是應當的道德的制度。農奴制度在地主(當時教會也在內)看來，却以為是道德的。

道德與法的區別，是在於法是統治階級用來鞏固其統治之直接條例，此種條例，在保護國家上，有極重要的意義，而道德則主要是由社會的輿論來維持的。無產階級理論家不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理論家那樣，說道德是超階級的，無產階級的代表，自覺地努力闡明無產階級道德的階級實質。道德對於工人階級有很大的意義，因為它是對人對己的一種組織的聯繫的原素。因此，道德是無產階級社會的和其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資產階級的道德，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行為的規矩。而無產階級的道德，則是完全由無產階級以及人民，民族的解放事業的利益來決定的。在無產階級看來，有利於民族，人民與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的行動，就是道德的；妨害這種解放事業的行動，就是不道德的。中國的無產階級今天最堅決的實行中國民族的優秀的道德傳統，並加以發揚，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以及禮節廉恥諸德，中國無產階級，在今天民族革命的鬪爭中，有着最模範的具體表現，這就因為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鬪爭是在於最堅決地、澈底地謀中國民族人民的解放的緣故。

列寧說：「在我們看來，人類社會以外的道德，是不存在的；在我們看來，道德是服從於無產階級鬪爭之利益的。」接着，列寧又說

道：「當有人向我們說及道德的時候，我們說，在共產主義者看來，道德全是在於堅固的團結的紀律，以及自覺的反對剝削者的群衆鬪爭。我們不相信永恒的道德，並且揭破一切關於道德神話的欺騙。」（列寧：「論青年團的任務」）

這樣說來，新道德對於舊道德就毫無關係嗎？當然不是的。我們已經說過意識形態雖然基本上決定於經濟，但在意識形態本身仍有它自己的歷史發展關係，道德也正是如此（法律也是如此），新的道德，代表着新的進步階級的意識，它的內容也要比舊的道德更進步。「道德的目的，是要幫助人類升到更高的水平」（同前），無產階級的革命道德，就比資產階級的道德更能幫助人類升到更高的水平，也就是更高級的道德。就道德本身的發展來說，新的道德一定是把舊道德的壞的成份掃清，而把它的優良的成份發展，充實以新的更進步的內容。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諸德，以前原是中國民族的封建的傳統道德，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的鬪爭中加以發揚之後，它已不能再停留在舊的限界一內，對個人忠君之類的成份，已經清除出去，而成為對民族解事業盡大忠大孝了。這種新的民族道德，在無產階級的行動中，比在其他任何階級都有着更高的發揚。它決定於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和階級利益，同時它又幫助推動中國民族抗戰的力量的增長。

## 乙、藝術

在原始社會中，藝術與生產的關係，是非常顯明和簡單的。野蠻人的繪圖、音樂、跳舞，以及各種不同的表現，差不多完全是由他們的生產行動決定的。例如野蠻人的舞蹈，模仿狩獵、拾果以及原始耕種的各種過程；原始人們的繪圖，描寫狩獵、各種勞動過程、勞動工具、家畜等等；謠歌也是歌唱狩獵、戰鬪、家庭生活等等。在階級的社會中，情形就不同了。在勞動階級中，藝術（跳舞唱歌……）還是密切地同生產相聯。可是上層階級因自身很遠的脫離了生產，而且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及極高的藝術的技巧，所以上層階級的藝術，只

在最後基礎上是爲生產與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某一時代的真正藝術的創作，不僅表現了一定之階級立場，而且同時還具有偉大的美的價值。俄國普式庚——俄國貴族革命者的思想代表——的詩直到現在，還使人們嘆賞其美麗及技巧的成功，在貝多芬的音樂中，我們可以感觸到法國革命的巨浪，雖然當時革命的仇敵——國王、宮廷貴人、上層資產階級——，却也不能不爲之贊嘆不置。

藝術是什麼？藝術是人類認識自己的生活現實的一種方式，藝術本身就是現實的反映。列寧曾說託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就因爲託爾斯泰以他高妙的藝術手法，反映了俄國的現實，從他的作品裡，可以看出俄國各階層的鬪爭，和怎樣向着革命道路上走去的動向。偉大的藝術作品，都能够把他們的時代的各方面反映出來的。但是，科學哲學也是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也是現實的反映。它們和藝術有什麼不同呢？不同的是，科學哲學是以概念、法則等爲反映現實的媒介，經過這些媒介而展開爲理論的形式。而藝術的反映現實，却是依靠生動的形象。不論美術、文學、音樂、戲劇等等，都是用某種形象來反映現實的。好的藝術作品是什麼？就是最能够給我們以生動的真實感的作品，就是最能够把深刻明瞭的形象打入我們的心中去的作品。藝術之所以和科學不同，藝術之所以有藝術價值，就因爲它有着這種生動的形象，對於各時代的人，都可以引起真實感來的緣故，並不是有另外的甚麼神秘的藝術性的特殊作用。

藝術的反映現實，並不是簡單像鏡子一樣反映，而是在一定的階級地位和時代立場上的反映。爲甚麼？因爲藝術家決不是生活在天宮上的人。而是生活在一定的時代一定的階級中的人，他的藝術創造活動，也正是站在一定的時代一定的階級地位上的活動，他和時代階級中其他成員的不同，只在於他的分工的不同。因此，在反映現實的作品裡，同時也包含着階級願望、時代要求的反映。而藝術作品裡的現實，也是在一定的階級的視角上反映出來的現實。這樣，隨着作者所屬

的階級的不同，作品所能反映的現實就有着種種的不同，當一個階級是站在前進的革命立場上的時候，當他們不怕暴露現實、不怕面對真理的時候，代表這樣的階級的藝術家的作品就能夠反映更多的真實。相反地，當某一階級是在沒落反動的地位上，懼怕真理和懼怕現實時，這一個階級的藝術家的作品一定要歪曲現實的形象，甚至於只能產生毫無現實內容的作品。藝術史上各種藝術派別的發展和沒落的過程，都可以從這裡找到說明的根據。舉例來說，歐洲資產階級在革命初期的時候，它們中間產生了許多偉大的作家，而在帝國主義國家裡，就看見資產階級藝術家創作力的萎縮和內容的空虛。論藝術創作的技巧，後者不見得比前者低，相反地在帝國主義時代，藝術家在技巧上的磨練，做到了極專門化的程度，可是在後者中間却沒有而且不能產生偉大藝術價值的作品，這就因為後者不能或不願反映現在對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不利的豐富的現實的真實內容的緣故。舉中國的例子來說，兒女英雄傳的寫作技巧不見得比水滸傳差好多，然而前者是封建的統治階級立場上的作品，它把統治階級的生活不正確地理想化了，到後來是一個毫無氣力的大團圓的結果；而後者却是能够相當暴露封建政治的黑暗內幕的民衆的作品。所以不論依據一般讀者的判斷，或專門的文學批評家的判斷，都認為水滸傳比前者有更高的藝術價值。

時代的變化給與藝術的影響，也可以舉俄國文學爲例。假使在十九世紀上半期，在俄國文藝上，貴族居統治地位；那末在下半期，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現於舞台上了。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前，俄國文學，差不多不知有城市，在普式庚的著作上，沒有一個市民。最初的城市居民，出現於果戈里關於聖彼得堡的小說上。二十年後，他們的詩人陀士託也夫斯基，變成了城市居民的歌頌者。貴族產業的崩壞，在文字上得到再明顯沒有的反映。破落的貴族對於城市資產階級和鄉村富農的戲曲似的鬭爭，是農奴解放以後俄國文學家所最愛描寫的題材，沙蒂可夫，對這個鬭爭描寫得更清楚和精緻。僅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之後，文學才注意描寫農民，在這世紀的下半期，已有很多的作

家，描寫農奴解放以後的俄國鄉村的貧困和破產。

俄國的農民運動的一些情況，也反映於託爾斯泰的作品與宇宙觀中。列寧說道：「託爾斯泰是特出之人，他的見解的綜合，雖然整個看來，是有害的，可是它正是表示我們的革命，農民資產階級革命的特點。從這觀點看來，託爾斯泰見解中之矛盾，正是俄國革命中農民歷史行動所處的矛盾條件之實際鏡子」。

「一方面，數世紀農奴制度的壓迫，以及農奴解放後數十年的強制的破產，積累了巨大的怨恨、憤激和決心，想從根本上顛覆那些官式的教堂，大地主和大地主的國家，消滅一切舊的土地領有的形式與制度，清除土地，組織自由的、平權的小農之共同生活，以代替警察的階級的國家，——這些希望，在我們的革命中，非常明顯的貫串於我們農民的每一歷史行動上；無疑的，託爾斯泰著作的思想內容，與其說適合於抽象的『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當評價他的思想體系之時）毋寧說更加適合於這種農民的企求」。

「他方面，企求新的生活形式之農民，非常不自覺地、馴服地、蠢愚地對付這些問題，如這個公共生活，應當怎樣，怎樣鬭爭才能獲得自己的自由，在這鬭爭中應有怎樣的指導者，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農民革命的利益關係怎樣，為着消滅大地主土地領有起見，為什麼必須用暴力推翻沙皇的政權，……在我們的革命中較少一部分農民，實際地進行鬭爭，……大部分農民，則是涕泣、祈禱、推論、幻想，寫了請願書和派遣「請求人」，——全似託爾斯泰的精神。」（見「託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

高爾基是俄國的也是世界的最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在高爾基以前，俄國的作家，如民粹派的作家，差不多都沒有與農民區別開來。

當然，僅在十月勝利以後，俄國無產階級，才廣大地發展自己無產階級的文學。

和意識形態的其他一切領域一樣，藝術是以時代和階級立場為基礎，在一定的階級立場上反映每一時代的現實，但並不是說，僅僅這

樣就算是藝術的一切，藝術和其他一切意識形態領域一樣，它本身也有自己歷史發展的規律。前面已說過，藝術是以形象反映現實，這是一；其次，這種形象並不是隨意選擇沒有標準的，藝術的形象，在一切好的作品裡，都是典型的形象，即是說，它所刻繪的事件和人物，常是代表這一個時代一定階級的特徵，因此才能反映這時代階級的發展趨勢，才能够使同時代這一階級以及同情這一階級的人起極大的共鳴。在這一點上說來，藝術有和科學共同的地方，科學概括經驗把握一時代所能發見的客觀世界發展規律，藝術也是由概括而把握現實世界的典型。但典型和法則自然不同，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法則是以概念為媒介，表現事物的發展規律；而典型則是通過一定的個性，在具體人物的活動中表現着的。如果是描繪抽象的典型，而不注意任何個性的活動，這就叫做臉譜主義，這是會使藝術失去真實性的。

藝術因着時代階級的不同，不但在內容上、典型上有差異，而且在形式上也有種種不同的變化。西洋的藝術會有古典的、浪漫的、寫實的等等派別的形式。各國、各民族有它自己的民族形式，而一國內各階級的藝術也有不同的形式。舉中國的例子來說，中國舊藝術，一般地說，有它的民族特點，在形式上與西洋的藝術就不相同，中國的音樂、戲劇、繪畫、文學的表現手法，有它獨自的特徵，然而在同一的中國藝術中間，上層階級中間所欣賞的東西和一般民衆中流行的東西就不相同，例如上層階級的文學是向着詞句的雕鑿、韻律的嚴格規定、高深的典故的引用方面發展，而一般民衆中間則不斷的流行着口語文學的作品，民謡、小調，以至評話文學，都有這共同的特徵。

藝術形式發展的規律，一種新形式起來代替舊形式，是由兩方面出發的。一方面是現實的發展，新的階級出現，或新的時代任務的提出，舊的形式不適於反映新的現實和新的要求時，就要求舊形式的打破，和新形式的創造，這是主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新的形式不能夠完全憑空創造出來。它要成為比舊形式更高級的東西，那就要能够對舊形式給以批判，採取舊形式運用中的一切經驗，發展舊形式中

間的好的成果，同時，特別重要的是採用、發展與提高民衆的藝術形式。這樣才能够在新的現實基礎上，創造更進步更優秀的形式。舉例子來說，例如「五四」的新文學運動，一方面，因為它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啓蒙運動，中國舊的文言文學不適於表現這時期的自由解放的要求，文學上要求更能有多方面反映現實的能力，因此，就有了白話文學的運動。另一方面，白話文學的提倡，在文學本身上也不是毫無憑據，因為這時的提倡平民文學的要求使人同時發現中國過去自己已經有了很好的平民文學，特別是評話小說（如「紅樓夢」「水滸傳」等等）一時引起了很大的注意，自然，「五四」以前的新文學運動中還有西洋文學的很大的影響，然而直到現在，新文學運動所以沒有能够獲得更多的成績（但決不是說完全沒有成績），其原因，可以說對舊傳統的繼承發揚的不够（五四運動，對於中華民族許多的東西，採取一概否定的態度，是錯誤的）正是其中之一（當然只能說是原因之一，不是一切原因都限於此），而魯迅先生的作品所以能成就最高的地位，除了他的深刻敏銳的對現實的透視力以外，能够善於繼承中國民族的最好的傳統和加以發揚光大，也正是一個重要的要素。

舊形式與新內容是矛盾的，它不能很好適合新時代的內容和要求，這是它的缺點，然而這不是說新內容不能在一定程度內運用舊形式表現出來。舊形式常是一個國度幾千年或幾百年的傳統，所以它又是經過長期的琢磨洗鍊，所以它又是在一定的程度內，適合於這一民族的生活的形式，而且一定包含着許多優秀的成份。完全拋棄民族所遺留下來的舊形式時，那所創造的東西，一定對於自己的民族生活發生某些距離，更不會成為民衆所能廣泛接受的東西。大衆化的問題爭論得很久，而沒有多少結果，這是原因之一。

中國今天的現實迫切要求我們的藝術家進一步研究自己民族的舊的遺產。加緊的吸收與發展民衆的藝術形式，為了要更能恰當地反映抗戰中的民衆生活，為要使藝術能成為動員民衆的一種力量，能够號

召廣大的民衆起來抗戰，中國的藝術家需要從民衆藝術形式裡、舊形式裡去學習，去批判地吸收、發展好的成份，拋棄壞的成份。爲了今後創造更高的新的民族藝術，也需要這樣做。

### 丙・科學

科學是研究世界各種物質的發展規律的學問，按照研究對象的不同，科學有各種不同的分類。以自然現象的爲研究對象的是自然科學，以社會現象爲研究對象的爲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又因對象不同而有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等的分類。

一切自然科學，都是人在生產過程中所得經驗的概括和總和。社會的生產行動，對於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有決定的影響，也可以說，自然科學的發展，是由於社會生產的要求。幾何學（按希臘文原意，指土地的測量）發生於古代埃及，因爲，爲正確測量土地起見，必須有一定的規則。算術的發展，主要的依賴於商業，經商如沒有計算的科學，自然是極端困難的。代數學，亦是被中世紀有名商人——亞拉伯人——所研究出來的。天文學的發展，是與日曆的起源相聯的。在黃河、尼羅、地格里、猶夫拉地斯等流域上的農業，需要正確地預知河水漲落的時期，當然，這是必須日曆的，而這個日曆之規定，則必須經過長期的對於日月和其他天體的運動的研究。所以埃及的、巴比倫的僧侶，就成了最初的天文學家。在十四、十五、十六世紀時，因航海的迅速的發展（商業資本的需要），天文學也得到有力的發展的刺激。海中的航行，經過很長的距離，這上面沒有許多測量器具是不可能的。因此，往前發展的海外商業，須要許多測量的鏡器，這些器具對於高等數學，物理學、化學的發展，又給了很大的影響。化學的生產，一方面是從醫學，而另一方面則從礦業的生產和冶金術。

中國的農業經濟也很早有着正確量地和認識天時的必要，所以幾何學和天文學，也很早就出現了。

但我們以前說過，社會的生產，是有兩個方面：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所以，每一個時代的自然科學發展的要求，一方面是生產力發

展的要求，是人類爲要征服自然，從自然中取得更多的生活資料的要求。而另一方面，這種要求在階級社會裡又有一定的生產關係的限制，受到支配階級的利益的限制。所以，不論什麼自然科學上的大發明，它是否能够爲社會所採用、所承認、所發展，這就要看它是否適合支配階級的利益。在西洋，中古的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爲了保持它們的宗教迷信的統治地位，對於新的自然科學的發見會加以迫害，如地圓說地動說之類，被看做異端邪教，主張的人要被處死刑。一直到後來資本主義發展起來，新興階級的勢力抬頭以後，才被社會一般地承認爲真理。在瓦特以前，蒸氣機早就發明，然而都沒有引起產業革命，直到十八世紀末這革命才以瓦特的改良（蒸氣機的改良）而實現出來，這就因爲以前資產階級是未曾發展到需要這一革命的緣故。在帝國主義時代，這情形就表現得更明顯，一方面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獨佔資本支配着產業，新的自然科學的發見，都因此受到桎梏，限制，或即使有發見也常常被埋沒了。另一方面，自然科學的研究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發見了許多新的學理，如相對論、量子論之類，這些新的學理大大的動搖了舊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的宇宙觀，證明了世界物質的普遍的互相轉化和互相聯繫（如時間空間的聯繫，光波與電子的互相轉化），然而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家爲它的舊的階級意識（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反辯證法的反唯物論的，否認世界變化的形而上學的意識）所束縛，對於這些新的發見不能正確把握和理解，反而用種種唯心論和宗教來加以曲解，使自然科學不能在真正科學精神的基礎上發展，這就在帝國主義的腐朽的生產關係上發生了自然科學的危機。又如在中國，許多在外國留學，研究自然科學的專家，回國以後，不能把自己所學的拿出來應用，這就因爲中國受帝國主義的支配，壓迫，生產不能發展，近代的民族國家不能很好的建立起來的緣故。因此，要使中國的自然科學發展，科學家能施展他的才能，他首先要參加在抗戰的工作中，爭取民族的解放。

這樣，在階級社會裡的自然科學也就有了階級性，他的發展爲支

配階級的利益所左右。這自然不是說，自然科學本身毫無客觀真理，而是說在對立的階級社會裡，自然科學的客觀真理，不能超過這階級的歷史條件之限制。如果自然科學本身的發展超過了這限制，如帝國主義時代的自然科學（特別是理論的自然科學）一樣，那它就要受到舊的生產關係的束縛而發生病態的歪曲的表現，列寧說現代帝國主義國家的自然科學裡有「辯證法唯物論的病態的誕生」（「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就是指此而言，這就是說，自然科學本身已有了證明唯物辯證法的新發見，而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支配之下，却被歪曲地表現出來。祇有新的革命階級掌握政權時，而在中國，首先要民族獨立解放，要建立真正三民主義共和國時，才能使自然科學大踏步地往前發展，使它能够克服自身的危機和舊的限制而發見新的豐富的真理。

社會科學的階級性是比自然科學更為明顯，因為它研究人類社會的本身，直接就產生於階級鬭爭的行動中。

法興國家學說的研究，始於君主因城市資產階級之助與諸侯及教堂鬭爭的時候。因為這一鬭爭，便發生了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君主對於屬民的政權，建築在什麼基礎之上？宗教的權力和帝王的權力，究竟誰高？有些理論家，擁護國王的權力；也有些擁護諸侯的和教堂的權力。從他們的爭論中，便發生了關於國家法律的學說。在另一方面，工商業的發展，資產階級關係的發展，更需要有系統的法律條規的形成，使之更確切地表現工商業發展所必需的條件。

我們已經說明過，法並沒有創造任何新的關係，它只是鞏固已經存在的事實條件，現代的商業，沒有法律的調節，是不能很好發展的。

按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發展及新的、前所未有的資產階級關係之發展，新的科學——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規律的狹義政治經濟學——也就應時而起了。

資產階級與貴族的鬭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鬭爭，自然更引起

了對於社會科學的特殊興味。十七、十八世紀政治學哲學的發展，以及十九世紀歷史學和社會主義學說的發展，就是爲着這個原因。

因爲社會科學是研究那種與階級關係密切相聯的社會現象，所以在一切社會科學中，階級利益的影響，特別有力的表現出來。非黨的超階級的社會科學，是不會有的。

資產階級須要抹殺一切與他利益相矛盾的現象。資產階級須要對其他階級說：資本主義制度，雖有「些」缺點，但它是唯一可能的經濟制度，它只能被改良，而不能被變革。因此，資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對於它的一切黑暗方面，對於資產階級社會不可避免的滅亡的趨勢，閉起眼睛，故意不看。因此，現時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是假科學。它主要的不是發現真理，而是隱蔽真理。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家和經濟學家，最多只能記載些表面的事實，可是他不能而且不敢思考這些事實，把它們組成合理的體系，而預知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趨勢。

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則不然。關於這點，我們已經說過，無產階級決不需要遮掩事實，反之，它正要努力地完全地確切地認識現實情形。它不僅注意現在情形，它還努力的觀察將來的趨勢。

無產階級社會科學的任務，不是簡單的記載事實，它還是在於思考這些事實，找出那些聯繫許多不同現象的規律。無產階級的科學，是根據矛盾發展的規律、不可避免的社會制度變革的規律去觀察社會。

總括起來說，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頌揚滿含矛盾的資本主義社會；而無產階級社會科學則給它以科學的批判，並指明無產階級在社會改造中的歷史使命。

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是明白地提出自己的實踐的任務，是服從自己階級的改造世界的革命事業，是顯明地提出和堅決地把握自己的黨性的。

哲學也是科學，哲學是研究自然、社會、人類思想的一般法則的

科學。因為哲學是研究這世界一般法則的學問，所以它對於我們的實踐、鬥爭、研究，是給與一個總的方法論。所以哲學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

這樣的學問，與階級鬥爭的關係自然更是很密切的。資產階級的哲學，產生於資產階級利益的基礎上，資產階級的實踐利益，是在於要把資本主義社會，看做是永久的社會，所以資產階級的哲學，就是在他們革命的時候，也只能是機械的或形而上學的唯物論。這就是說，他們能站在唯物論立場上，也就是一定客觀物質真理的立場上，而同時又要把他們所發見的物質真理誇大為永久不變的最後真理，把物質看成形而上學的（不變的），不會再發展的東西。當資產階級離開革命（或者和封建勢力妥協，或者已經獲得政權以後）的時候，他們的哲學也就變為唯心論，主張精神以至於「神」是世界的根源，丟開物質客觀真理，而和宗教聯成一氣了。

資產階級究竟是剝削階級，就是在它革命的時候，也帶着一定的保守性質。所以它不能在哲學上發見真正完全的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祇有無產階級是歷史上最進步最沒有一點保守成份的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在哲學上才能發見最完全澈底的世界發展規律，也就是發見真正最完全的科學的哲學，即辯證法唯物論。

哲學是階級的科學，也是黨性的科學。從來的哲學史，就是唯物論與唯心論兩個哲學大派的鬥爭的歷史，也就是代表進步階級世界觀和退步階級世界觀的鬥爭史。辯證法唯物論是最進步最澈底的唯物論，它是歷史上最進步最澈底革命的階級的世界觀，它是無產階級高度發展的階級自覺的世界觀。它是一刻也不能與無產階級的實踐任務分離，它的「主要問題是在於改變世界」。離開了實踐任務來談辯證法唯物論，一定成為學究的空談，而不是真正的辯證法唯物論，這就是辯證法唯物論的黨性。

每一時代每一階級的哲學，是在兩種基礎上產生的：第一，是某一階級的實踐鬥爭（革命的或離開革命的），這是最主要的。第二，

是這時代的自然科學的成果。資產階級在革命的時期，利用了自然科學上物質學的（力學爲主）發見，建立起機械唯物論，反對迷信獨斷，但當資產階級走向反對方面去時，它就不能吸收和把握自然科學上的新發見，而只好把它歪曲，使它和宗教迷信聯繫起來，把它解釋成爲唯心論的東西了。前面說的自然科學的危機，這也是一方面的表現。祇有無產階級，才能吸收自然科學發見的最高成果，給與正確的客觀的理解，以豐富辯證法唯物論的內容。

這樣，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哲學，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方法基礎，是和馬克思主義或科學的共產主義分不開的。這一個哲學是唯物論的，也就是在一切實踐鬥爭上、研究上要以客觀的物質真理爲依據，絕不粉飾現實，掩蔽真理；這一個哲學又是辯證法的，也就是更從澈底的發展觀點上去看事情，絕不固執成見，壓抑新生，所以這是最革命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現在有種無恥的賣人頭的分子欺騙青年說：辯證法唯物論不必要和馬克思主義或科學的共產主義結合，「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沒有必然的關係」。並且舉古代希臘哲學和中國古代哲學爲例子。他故意抹煞了這一點：古代哲學中的辯證法唯物論，只是「自然發生的辯證法唯物論」，它雖然也是有辯證法唯物論的輪廓，但是沒有高度發展的科學做基礎，所以不是完全的。完全的辯證法唯物論，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基礎上吸收了近代自然科學的最高成果而建立起來的，是與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有必然關係的。它是與無產階級的黨性的科學，「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世界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

### 甲、

- .....  
三、宗教  
的起源與  
發展  
.....
- 關於原始人們之宗教概念，我們現在差不多沒  
有什麼可靠的材料。他們不能寫，所以書面的記載  
，是不會有的。無疑的，在研究原始文化上，他們  
過去居住洞穴裡之繪圖，各種什物、裝飾品等等，

是具有極大價值的材料。但是，為追溯原始宗教的歷史起見，這些材料，還是不够的。故在研究原始宗教時，必須注意現在最落後民族的情形，例如澳大利亞的野蠻人，他們實可成為我們極遠祖先的活的遺蹟。

澳大利亞人的唯一公共生活的形式，就是原始的部落，四十或六十人的部落，他們以打獵拾果為生。因生存條件的困難，部落中自然老死或病亡之事是非常少的，大部的死亡，都是由其他外部的原因。例如死在戰鬥中，受傷於狩獵中等等。因自己的知識有限，所以野蠻人一般的不能了解自然的死亡，更不相信每人遲早必須死亡的事實。強制的死亡，就不同了，野蠻人每天在狩獵中，差不多均可看到這種死亡，同時他們所看到的，常是同一的景象：被刀和斧所傷的動物，流出了自己的血，漸次因血流過多而不能行動，而停止呼吸，死了。從此得出結論：以為身體的血流了以後，推動身體的生命的力，或靈魂，亦脫離了身體。

某種力量支配身體行動，這種印象的發生，並不是突然的，而是長期的應用勞動工具的結果。原始的人，把自己活的、動的、積極的力量與死的、消極的工具分別開來，以後他更以比較方法，把這種區別，一切移用於生物或甚至無機物的自然界中。但不要以為，野蠻人無畏地在動物的屍旁，而平靜地哲學地思惟這種不了解的現象的理由。事實却要複雜得多。一般的野蠻人，就不能像我們現在所了解的那麼「思惟」着。但是他能够集合各種印象，而成一個統一體。野蠻人逐漸地把他們的印象，如石器的打擊，動物的跌倒，血的沁流，呼吸的斷絕，麻痺，人在工作時手中勞動工具的「行動」，工作過程停止以後牠的「不行動」等等，綜合起來，於是就產生原始的「萬物有靈論」(AUimiSm)這種印象的綜合，也包含情緒的感覺——死亡的恐懼，對於屍體的駭怕，對於自然力的畏懼，宴飲的莊嚴，狩獵勝利的慶祝等等。至於其他沒有生產基礎的印象，恩格斯這樣說道：「錯誤的自然的表現，對於有史以前時期的低度的經濟發展，不但是種補充，而

且甚至是種原因。雖然經濟的需要，是往前發展的自然認識的主要彈力，而且隨時間的前進，它更成爲這樣的一種彈力，可是如果想爲原始人的一切愚蠢意見，尋找經濟的原因，那末這將是一種術學之術了」。據原始人的意見，脫離死人的靈魂，繼續的單獨的存在着。夢中所見，似乎證實了這種現象。野蠻人在其心理上講來，是「幼稚的實在論者」，一切他所看見的所聽到的，對於他都是實際的事物。假使一個澳大利亞人在夢中看到自己打獵或飲宴，那末他將誠懇地相信，他的靈魂真的是在打獵或飲宴。因爲，不然他就不能「說明」做夢。野蠻人既然以爲精神是人的主宰者，所以他對於精神的關係，便像對於人的關係一樣。部落的成員看到同志或親族，在患難之中，他們便努力的互相幫助。所以無足爲奇地當他們需要幫助之時，他們就向已死同志的靈魂，請求幫助。反過來，野蠻人也以爲需要照顧死亡親屬的靈魂。

在各處的澳大利亞人中間，普遍傳播這樣的習俗，就是在人死幾星期內，應該攜着各種食物到死者的墳墓上去，否則他們以爲死者的靈魂將會發怒而復仇。

由此便發生了靈魂的祭祀。這種祭祀往前的發展，是與交換的發展相連的。但須得說明，原始的交換，是與戰爭及搶掠相聯的。它採用極複雜極麻煩的禮式，使相互仇視的部落，可以接近起來，參加交換的行爲。很顯明的，在這樣條件之下，如無很有經驗的，知道一切禮式的，很難適合該部落希望的中間人，交換是不可能的。因交換的發展，野蠻人在對於靈魂的關係上，也開始詳細地模仿交換的行爲。例如，很多的澳大利亞部落，認爲簡單的召喚死者靈魂供獻食物是不够的。爲使祭祀有靈，就需要選擇相當的地方完成一定的禮節，並且敍述某種特殊的古代成語。每當困難的時候，澳大利亞人就向特殊的中間人，或術士求助。因爲術士知道各種古代的神秘的成語，他具有死體的某些部分——頭髮指骨等等，他知道需用什麼禮節與形式，去接近靈魂，所以據野蠻人意見，術士可以向靈魂請求某種所要的結果。

•這些術士，便是後來教士等級的發端。

原始部落在自己發展的過程中，轉成氏族，同時神靈的崇拜，漸漸的轉成圖騰（氏族中人，崇拜某種動物，作為本氏族的象徵。此種動物，稱為圖騰）與祖先的崇拜。氏族是兩百到三百人組成的（有時或多些），均有親屬的關係，通常，這些氏族，以某所崇拜之動物或植物，作為氏族的名字。自拜物的集團組織以後，神秘的遠代祖先的靈魂，就獲得了特殊的意義，野蠻人以為這種祖先，具有超人的能力，而且其英雄行為，是與他們所崇拜的圖騰具同樣的形式。因此在低度發展的人民中，他們氏族之神，常有巨大的水陸動物，但是這種動物的行動，和人一樣，牠們有時甚至採用人的模樣。例如在苦爾尼（澳大利亞野蠻人）的傳說中，可以聽到，人形鳥、人形蛇、人形四足獸等等，常常演着主要的角色，鳥與蛇，是苦爾尼族所崇拜之圖騰。很明顯的，他們以為自己的遠祖是人，可是他們却使遠祖採取了圖騰的形式。

除氏族集團以外，在有些澳大利亞人中間，還有所謂主要的圖騰，它把幾個圖騰的集團，聯合成一個友誼的聯盟。當這樣的聯盟，轉成實際的嚴密的組織之時，就發生了對於共同祖先聯盟的信仰。

氏族間長期和平共居之所以成為可能而且成為必需，是因為交換的影響，這種交換，對於野蠻人的生活，逐漸得到更大的意義，可是在經常戰爭與掠奪的局面之下，他不能發展起來。自然，各氏族既有和平的協定，他們也就進行共同遊獵和軍事的遠征；因共同行動的人數增長及組織的複雜化，所以遊獵、戰鬪的組織者指導者之意義也就提高了。他的助手，氏族組織者或大家庭的組織者，只照料氏族內部事宜，管理不多的人，執行上面指導者的命令，所以只盡次要的作用了。當然，最高指導者的意義，一定要轉移到他的精神上。首領死後，尤其是在他指導下得到了軍事上勝利的首領死後，氏族就把他奉為最有力的神靈，而在重要的時候，求助於他。因此，逐漸發生了一種表象，以為死的首領是該氏族的共同祖先。

生產發展的需要，反對敵人侵略的防護，以及婚姻關係的發展，更使種族間和平的共居，不得不轉成密切的友誼聯合。久所尊敬的已死首領的精神，高出一切氏族的祖先，而最終地成為共同的祖先。同時，又發展關於友誼聯合中血統關係的觀念。隨着交換的發展，原始的孤立的共產部落，逐漸崩毀，而與其他部落相結合，並使首領與指導者的權威，日漸加強，因此古代神靈的崇拜，漸漸轉到祖先——首領的崇拜。

當友誼聯合中組織成部落之後，我們看到對於部落祖先與首領靈魂的禮拜。因家庭（團結幾十個人於一個經濟內）的發展，就發現了家庭或房屋神靈的禮拜。家長（開始是母親，後來是父親）的權威，也同樣的神靈化而具宗教的意義。

殯葬的習俗與禮節，於宗教信仰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野蠻人以為在埋葬已死祖先的屍體之地，存在着他的精神。居住於森林中的部落，尋常把死人藏於樹間。因此他們就以為「鬼靈之國」是在森林之中。在山地上，死屍或是擲在深坑裡，或是藏於山洞中，或者有時候，擺在高山上，供飢餓的鳥獸嚼食其腐屍。因埋葬方法的不同，那「鬼靈之國」或是高在山上，或是低處地下。所以「鬼靈之國」，在各個野蠻人中，表現着各種不同的樣子。有些部落，以為「鬼神之國」，是極好的花園，其中飲宴作樂，備極舒適。別一些部落，則相反的，以為鬼神之國，處於悲慘的狀況，鬼神，受盡各種的苦難。

因戰爭與移民的結果，各個部落，時常相互的混淆起來，而形成一個大部落。為着融合各部落的鬼神觀念起見（它們時常是相互矛盾的），於是便造出種種神話來，在社會開始分化之時，更得了特殊的意義。鬼神世界，分為兩部分：好的部分，是給領袖、僧侶、出力戰士的，這部分轉為花園，位於高山之巔；下等的，則置於深坑裡，因此就發生天堂與地獄的原始印象。例如，在波里內西的村落中（這部落是具有堅固的等級組織），天堂特別是為貴族而設的。領袖、僧侶、貴族死後，進入高山巔上的「芳香的空中之國」去，普通人的靈

魂，則進入寂寞的深處地下的坑中。

地獄天堂的觀念的發生，非常明顯地指示出宗教觀念對於社會關係的依賴。真的，當人間的社會分化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時，在鬼神世界內，也發現了不平等：一種是為貴人，一種是簡單的平民。同樣的，我們還看到，社會關係的複雜與擴大，社會組織的發展，更使各部落產生共同的首領與祖先，共同禮拜的神靈。

在這一社會發展的階段上，一切從祖先繼承下來的道德、習慣、技術規則，就由個別神靈的戒條，轉成全部落的統一神靈的戒條。

因拜物教的發展，某種飲食的禁止，就獲得新的意義，這種禁止，就稱為「太浦」（TABOO，以後就指一般的宗教禁令而言）太浦的習俗，在原始的人民中，流傳得很廣。在圖騰未發現以前，它就早已發現了。它的發生，是因為幾種食品的缺乏，所以它們的消費不能不有種限制。因此很自然的，就發生下述的禁令：不許食有害之物，不許採集未成熟的果實與草木，不許在某時期內打獵。隨着拜物教的發展，數世紀困苦經驗所形成的這些禁令，就被宣佈為所拜之神——氏族或部落的神化祖先——的遺囑。以後，因神化祖先與所拜生物（圖騰）的混合，這些生物，也就成為「太浦」，這種動物，除特別節日之外，是禁止屠宰的。此外，與圖騰有關係的一切東西，也都成為「太浦」了。所以野蠻人總想把任何「太浦」與圖騰神的企望與需要聯繫起來。

隨着氏族與部落的鬼神信仰的發展，祭祀的形式與性質也就改變了。因為生產的發展，野蠻人能對自己的神供給更多的祭品。大家都知道，每個人對神的祭品，只能是自己所吃的東西。農民獻給神以各種農產品，牧畜者獻給神或大或小的牲畜，遊獵者供獻所獲的動物，漁夫供給魚類。自然，神的地位愈高，則所供之物愈多。祭祀的形式，因此亦更複雜了。對待部落之大神，自然不能像對待氏族祖先那樣的簡單。開始時，祭物置於一定的地方，大部就是在那埋葬的地方，或是在神的最初後裔誕生的地方。以後，祭物就被供獻於神化祖先

的偶像之前，而且給神像塗上動物的血（他們以爲血包含着靈魂）。爲使神靈得到更美味的食物起見，野蠻人燒了祭物的某種部分（主要的是血和心）。爲使神靈嗅到香的氣味起見，野蠻人更焚燒某種香味之物（這種儀節，直到現在，還保守於教堂廟宇之中）。

原始人們的宗教觀念，極大部分是由獲得生產品的方法及其社會生活來決定的。某一部落，或是遊獵，或是業漁，或是畜牧，或是耕種，他們的宗教信仰與禮節，也就因此而異，打魚部落的圖騰神之主要任務，是幫助打魚。顯然的，它所得到的祭物是魚，圖騰的本身，也就是魚。對於保護狩獵之神，祭物就是獸肉。同樣的，經濟的性質，決定神的地址與祭祀的地點。獵人以爲神居於林中，所以他們祭神之地，也就在林中。漁民以爲神居於海上、江上或湖上，山野牧人，以爲神居於群山之巔。如果漁民之村，因爲某種原因移居內地，那末魚神就必然轉成獵神，因此祭物與禮拜的性質，也不得不改變。因之就發生神由一種動物變成別種動物的神話。

畜牧與耕種的發展，使人開始更加感覺到自己對於自然力量的依賴，對於日光、雨水、河流等等的依賴。神化祖先的禮拜，逐漸爲自然的禮拜所代替。遊牧部落的祖先神，轉成雷神或雨神，耕種部落之神，轉成太陽神或河神（因收穫之豐歉，依賴於河水之漲落）。在印度，以前曾以印達拉（太陽及雷之神）爲主要之神；在埃及曾以奧徐里斯（尼羅河之神）爲主要之神；在古代巴比倫，則以貝爾（太陽之神）爲主要之神。

農業的發展，更加促成許多與太陽運動、氣候變遷及草木生死有關的神話之產生。古代人以爲太陽在冬天時爲其敵對力量所敗，失去自己力量，但一到春夏，則它又逐漸恢復自己力量。秋時草木凋零而死，至春天則又復活起來。耕種人民的生活上之最大事變——播種與收穫——是與表面上天上太陽的運動相聯的。所以太陽的研究，對於古代社會的經濟，具有非常大的意義，它是僧侶的主要任務之一。根據某些記號，僧侶就知道播種或收穫的時期，快要近了，因之，祭祀

禮拜太陽神或植物神的時期也就到了。而且農產品的耕種收穫的全部過程，不能不引起這個思想：即植物之神，受苦犧牲，以其死亡，給養民衆。可是在收穫以後，又播新種，這時他們就以爲植物之神復活了。他因此，就以種種禮節，祭祀神道，使植物可以早熟豐收。這樣，就產生了古代最流行的太陽神與受苦的植物神之禮拜。

這種禮拜，對於以後基督教的產生發生極大的影響。

## 乙、

猶太的宗教，在其歷史的發展上，也經過同樣的階段。猶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樣，起初也禮拜已死祖先的靈魂，這種禮拜，以後爲圖騰的禮拜所代替。

氏族與部落的聯合，產生部落的共同祖先神之禮拜。猶太的雅谷神，曾是希伯來部落的祖先神，及至猶太部落逐漸合併爲統一國家之後，雅谷就成爲他們的族之神，伊士拉依爾（ ISLoer ）除禮拜雅谷以外，猶太人還禮拜各猶太氏族集團共同神。這是非常素樸的偶像的禮拜，因爲猶太人和許多其他地方人一樣，以爲祖先神是存在於樹木、石頭及木質偶像之中。猶太人之所以禮拜石頭的及木頭的偶像，正因爲這些偶像表現氏族的祖先神。財產上的不平等，逐漸破壞原始的氏族社會，同時祖先神的禮拜，亦漸失其意義。在紀元前八世紀，猶太國內已產生了極大的無土地農民及奴隸的階層，這些奴隸，因無力付租或償債，偕其妻女，爲人所奴役，無土地之農民，與其氏族完全斷絕了關係，失去要求氏族幫助之權，因此也不復參加氏族祖先之禮拜。因之，祖先神的禮拜，就成爲富有者的禮拜，氏族之長，特別與此有關。他們既具審判之權，於是就利用這種權力，來壓榨貧民，而爲自己謀利。反之，對於失去氏族關係的貧民，雅谷的禮拜，即猶太氏族神的禮拜，獲得了更重大的意義。

雅谷的僧侶，自然就利用人民的信仰，來減弱族長的力量，消滅氏族神的禮拜，而提高自己的作用。雅谷逐漸成爲貧民之神，他的傳道者，在其熱烈的演辭中，攻擊了富戶、貴人及不公正的法庭等等，

要求恢復到舊制度去，因為在舊制度之下，沒有這樣顯然的財產上的不平等，也沒有這樣的對於勞苦民衆的壓迫。

阿西利亞對於伊士拉依爾國的征服（紀元前七二二年），巴比倫人對於猶太國的征服（紀元前五九七年），使氏族制度完全消滅了。氏族的成員，能够負鎗的，一部分被殺，一部分被俘。被巴比倫俘虜去的，只有很少數的以前氏族的剩餘，重回猶太，他們很快的也就同化於其餘的貧民之中。僧侶操着主要作用的那種國家，代氏族制度而起。氏族神的禮拜，最終地爲統一的共同神雅谷所代替，雅谷成爲古代猶太人的政治生活與文化生活的中心。在巴比倫征服猶太之時，僧侶爲保持猶太人的民族統一起見，便使雅谷採取了唯一真正之神，宇宙創造者，及高等猶太民族保護者等等的性質。自然，在僧侶看來，巴比倫之倒，是因爲受了天神的懲罰，神使猶太人可以回到故土去。

當羅馬消滅許多國家的政治獨立而建立世界帝國之時，統一真正之神的觀念，獲得了特殊的生動力量。羅馬帝國之戰績，破壞了個別種族的特點。以前的等級的區別（除奴隸制以外）都取消了，地方的習俗與條例，爲統一的羅馬法所代替了，法庭根據羅馬法來作裁判與決議。

對於被征服省分的殘暴的剝削以及廉價的勞動，逐漸破壞小的獨立手工業者及自由農民。同時，根據於剝削奴隸之上的技術的落後，結果形成羅馬帝國的生產活動的退縮，終至造成經濟的、政治的、道德的破產。在往前崩毀的奴隸社會中，並無一個階級，能够提出一種可以實現的理想。富有的階級，早已與生產脫離任何的關係，他們唯一的生活意義，只在於飲宴作樂，發明新的娛樂方法。同時，無產者也是些破產的農民與小手工業者，他們同樣脫離生產，而賴國家及富人的佈施爲生。羅馬的無產者（與近代的無產階級是不同的），雖然痛恨富人階級，可是在思想上，他們也和富人一樣，輕視勞動，專思作樂。奴隸差不多陷於絕望的地步。奴隸反抗鬪爭的慘敗，指示他們沒有得到解放的可能。自然，有些奴隸，是田莊房屋的管理人、教師

或精巧的手工業者（製造各種稀有的奢侈品），某些奴隸，他們的生活條件雖好。可是他們的意識形態，也只是在於迎合奴主的意志。最後，廣大的破產的手工業者，也和奴隸一樣，無所希望，只希望奇蹟怪事。羅馬帝國的極少數人民，什麼都不相信，他們想以娛樂，來填滿生命的空虛與煩悶；大部分人民，只等候着天上的奇蹟，及責罰富人挽救貧民的救世主之出現。奴隸與破產手工業者，是帶有國際性的一種群衆，他們的信仰，因之也就採取了，超越種族的性質。

對於挽救貧民的彌撒之信仰，在猶太人中，是非常普遍的。可是猶太的彌撒，還帶有一種種族的色彩；在猶太之外，它就變成國際的基督了。

基督教，是這樣適合當時社會一般民衆（主要是奴隸）的需要，使他在幾世紀內變成了正式的意識形態了。身贖人間罪惡，死而復活的基督之形像，是基督教從東方農業宗教上模仿來的。可是基督教却給這種形式注入了完全不同的社會的內容。

基督教的主要內容，是解脫困苦的塵世生活，而企求天上極樂國的永恒的快樂，這種意識形態，正能够安慰困頓顛連的民衆。基督教既成爲偉大的社會力量之後，他就不得不影響於統治階級與國家政權，以後它就不可免地要從宣傳解放貧民之宗教，轉成壓制貧民的工具。最初的基督教公社，發生於奴隸與手工業者之中，他們的思想，極明顯的表示出奴隸、貧民對於富戶與貴人的仇恨。只在第三世紀中，富人才逐漸混入基督教的公社。經濟的困難與貧民的增加，需要更多的物質上的援助。他方面，富人也不恤多作佈施，以企求將來天國上的快樂。要求捐助的急迫情形，使基督教公社，不能不爲富人，大開其門。富人的混入，自然不能不極大地動搖基督教公社的宇宙觀。他們後來也就承認富人爲「天國」的平權的會員。基督教公社性質的變更，又引起了內部組織的變更：在教會之內，原來的平等逐漸消滅，新的教會官僚——統治階級的工具——因而產生。基督教的墮落的過程，就是這樣的完成了。基督教本來是奴隸及破產貧民（他們沒有能

力提出改造當時社會的具體方法)的意識形態，以後却成了統治階級用來壓迫剝削，及麻醉被統治階級的重要工具了。

### 丙、

上述的例子，明白的指示出，宗教的發展，也和任何其他意識形態的發展一樣，遵循着一定的法則，而且依賴着社會經濟的變更與發展。靈魂信仰之發生，是因為野蠻人需要解釋他們所不明瞭的生命現象。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獲得生產品方法的複雜化，社會的關係，與社會的組織，也同樣的複雜起來。圖騰聯合，及部落等等，隨以形成，一部分人成為上層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社會分化，由此開始。靈魂的禮拜，於是轉成祖先神、氏族神、部落神，以至種族神的禮拜。當生產力更往前發展，人民投身農業之時，人就開始明白的覺到自己對於自然力的依賴；因舊的氏族組織的崩毀，祖先神的禮拜，也就轉成了自然力量的禮拜。隨着種族的發展，種族神也發展起來，多神教漸為一神教所代替。最後，羅馬帝國的特殊經濟與政治的條件，產生了國際性的基督教。

所以，在宗教觀念的發展之各階段上，人只是禮拜着自己——自己的社會關係、及由此而生的自己的感覺、幻象、夢想及道德原則等等。所以宗教也和其他一切意識形態一樣，歸根到底，是由經濟關係來決定的。可是，我們不能把經濟關係和宗教間的聯繫，弄得太過簡單化。

關於這點，恩格斯這樣說道：「更上一層的，即更加離開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採取了哲學與宗教的形式。在這裡，觀念和物質存在條件間的聯繫，更是複雜，更為中間之環所遮掩。可是無論如何，這種聯繫，還是存在着的。」（「費爾巴哈論」）

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宗教觀念，遵循自己所固有的內在規律而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一定歷史時代中宗教的基本內容，可是這個內容所表現的形式，以及某些詳細的表徵，則依靠於種種習俗、傳統、特殊歷史環境，及社會心裡的複雜結合等等。

宗教的信仰，直到現在，還有極大的力量。不但數千百萬無知的民衆，而且甚至資產階級文化的代表（學者、作家、藝術家等等），也都沉湎於古代野蠻人所共同造成的宗教觀念之中。無論近代歐洲人與蠻荒的澳洲人，具有怎樣大的區別，可是他們的宗教觀念，是具有極多的共通之點的。穿上新裝的原始萬物有靈論，直到現在，還統治着人。這是什麼原因呢？

自然，我們並不否認某種心理作用（死的畏懼，永生不死的渴望等等）的影響，我們也並不否認社會思想工具的巨大作用。但是這些還不是宗教力量的根基。固然，社會思想上的壓迫，對於宗教信仰，具有非常大的影響。現在資產階級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宣傳宗教，來麻醉人民。它甚至禁止客觀科學真理的宣揚，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美國，許多州的政府，竟禁止達爾文進化論在學校中教授。歐洲各國對於教皇的協定，對於宗教團體的扶助，巨大宗教的機關，巨數的教士，各種宗教的設備，引誘群衆的巧妙方法（各種娛樂機關、慈善機關、教育機關等）——所有這些，自然幫助保持宗教的權力，維持人民的信仰。

可是，宗教存在的基礎，還是在於廣大民衆的困頓與受壓迫的情形。物質狀況的壓制，生活的不安，及身受的剝削與壓迫，使貧民不敢相信自己的力量，感覺自己的渺小與柔弱。這種物質狀況，自然不能不形成宗教觀念的基礎，酗酒與教堂，同樣的會使人暫時忘却生活的痛苦；人間的地獄，使人熱望上蒼的天堂。這就是困頓於自然力量之下的野蠻人和困頓於資本主義壓迫之下的現代人中間底共同點。

列寧說道：「勞動群衆的社會狀況的悲苦，他們在資本主義盲目力量之下好似完全無援的狀態——資本主義每天每小時所給與普通工人的悲慘的痛苦，比較最可驚的災禍如戰爭及地震等所給與的，還要多千倍——這就是宗教在近代的深刻的基礎。對於資本的盲目力量之恐懼——這種力量之所以是盲目的，正因為它不能為民衆所預見，這種力量，在無產者與小資產者生活歷程的每一步上都威脅着要給他

們而且正給他們以「突然的」「出於意外的」「偶然的」破產、毀滅，轉成乞丐、貧民、娼妓，或飢餓而死等等災難——這種恐懼之心，就是近代宗教的根基，一個唯物論者，如果不願為預科生的唯物論者的話，那末他首先應該顧到這點。」

和其他意識形態一樣，宗教反過來又影響於產生自己的基礎。在階級鬥爭之中，宗教是勞動群衆獲得解放的障礙之一。少數的壓迫階級之特權，還受到上帝威權與教會的擁護。所以，階級鬥爭，是與反宗教鬥爭密切地相聯的。反宗教鬥爭，是無產階級的任務之一，同時無產階級對於階級敵人的鬥爭，正是造成反宗教鬥爭的順利的條件。

列寧說道：「當資本主義苦役所壓迫的、依賴於資本主義盲目破壞力量的群衆，自己尚不知統一地、有組織地、有計劃地、自覺地反對宗教的根基，反對資本統治的各種形式之時，當這時候，任何訓誨的書籍，都不能把宗教從這些群衆中驅逐出去。」

在無產階級革命獲得勝利之後（如在蘇聯），宗教還是不能立刻消滅的，它在極長時期內，還要繼續存在：第一，因為過去的意識形態，依舊還要在一定的時期內發生它的影響（不但影響農民，而且影響於一部分認識較差的工人）；第二，在一定的過渡時代，商品流通的某些部分的自發狀態，小農經濟地位的某些動搖狀態，對於自然力量的依賴（因技術落後），以及文化發展的不足，自然使宗教有繼續存在的物質基礎。最後，在過渡時代，還存在着某種資產階級的成份（鄉村的富農，城市的私商等等），他們保持宗教信仰，並藉宗教為掩護，來和蘇維埃政權鬥爭，及剝削貧農。祇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如在現在），澈底消滅這些原因之後，宗教才能逐漸歸於消滅。

因此，在無產階級政權之下反宗教的鬥爭，是和進攻資本主義成份的鬥爭及社會主義的建設，密切相聯的。祇在木犁為拖拉機所代替，某些自發的商品流轉為有組織的合作社與國家的商業所代替，個人經濟為集體經濟所代替之時，祇在這時，宗教的根蒂，方才可以剷除。反宗教鬥爭的勝利，極大地依靠於經濟及文化的建設。在無產階級

政權之下，文化革命是打破宗教影響的一種極有力的工具。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文化革命，是克服宗教的基本力量。祇在人成為自己社會結合的主人翁，因之也就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及真正的主人翁之時，人方能最終地解脫任何宗教的觀念與幻想。

## 第八章 幾個結論

### 一、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的學說

唯物史觀的理論，整個說來是辯證法唯物論在社會歷史發展上的具體應用的結果，是社會發展的唯物辯證法的內容的闡明。在哲學中存在了兩種派別：唯物論和唯心論。唯物論能使我們對於宇宙獲得正確的科學的了解；而唯心論則顛倒宇宙的了解，以至到達於荒謬的幻想。唯物史觀首先要承認，唯物論辯證法是正確的科學的宇宙觀，它首先確定，要達到對於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科學的了解，應該是唯物的，辯證法的。在辯證法唯物論以外，是沒有正確的科學的宇宙觀的。

辯證法唯物論的基本要點是什麼？第一是唯物論的觀點，認為物質是客觀的存在，意識是物質的反映。「意識不是別的，只是改造與轉移於人類頭腦中的物質而已」。（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序文）第二是運動聯繫的觀點，物質不是靜止的，不是孤立的。「宇宙不是由已成的成熟的物體所組成，而是各種過程的綜合；在這綜合之中，看來似乎不變的物體，以及頭腦對於它們的反映——概念，乃是處於不斷的變更之中，是往前發生着消滅着」。（恩格斯「費爾巴哈論」）第三是質量互變的觀點，物質的運動是由量的變化轉為質的變化，由漸變到飛躍，質的變化與飛躍，又影響於量的變化。第四是對立統一的觀點，即是從矛盾方面來看事物，事物變化發展的原動力，是在於內部的矛盾的鬭爭。

在這四個要點中，對立統一的觀點，又是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核心或本質。在全部唯物史觀的理論中，我們就具體研究了這些對立統一的範疇：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階級與階級鬭爭，國家政權，民族與民族鬭爭，家族，意識形態等等。現在，我們再就整個社會發展的過程，文化發展的過程，來作一個總的概觀。

二、社會  
與文化的  
起源

現在說到第一個要點。恩格斯在馬克思墓上的演說中，分析馬克思所創立的唯物史觀學說的意義道：「馬克思發見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法則——這種簡單的，但直到現在被種種觀念層障所遮掩的事實，即人必須吃、飲、居住、穿衣，然後才能够從事於研究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的事實，亦即直接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民或時代的經濟發展的程度，形成了基礎，在這基礎之上，產生政府組織、法律觀念、藝術，至甚人的宗教觀念，所有這些，大部分是要由上述基礎來說明的，而不是從來所做的那樣，相反的來說明。」在這幾句話裡，包含着唯物史觀的實質。唯心論者與神學家，認爲人是宇宙以外的一種本體，他們把人與宇宙對立起來，他們以爲祇有人被天賦有特殊的力量——精神、智慧等。唯物史觀的學說，以科學觀點，說明人的實際狀況，人所創造的文化之實質。唯物史觀的學說，並不否認人與其他動物的差別，也並不否認人的生活條件與其他動物生活條件有深刻的不同，而且也承認沒有任何動物，能够像人那樣，使自然力量服從自己。但是唯物史觀學說不是用那種超自然的力量，那種特殊的天性去解釋這些。唯物史觀認爲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各種不同的動物中之一種。唯物史觀的任務，就在於科學地根據真實事實，說明人怎樣高出其他動物，而把握自然力量。這方面，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有偉大的英國思想家博物學家達爾文，闡明動植物界發展的過程。達爾文在「物種原始」一書中指出，一切存在於地球的動植物界的物種，是以變動的方法發展的方法從共同的根源上發生下來的，同樣的人也是從動物界的物種形式中，發展下來的。

爲證實動物界內的變動和發展之思想起見，達爾文一方面作了許多用人工方法變更物種的實驗，另一方面他同英國的畜牧業者經常的通信，這些畜牧業者爲改良畜種起見，進行人工的選擇，舉行異種的互交。達爾文所作的實驗以及他從畜牧業者所得的材料，證實了他的

預測，證實，用人工選擇良種的方法，異種相交的方法，經過幾代以後，能得特殊的物種，牠們相互間的差異，比較牠與別個相近物種的差異還要大。由此，達爾文便得出結論，以爲這樣的選擇過程，亦進行於自然界中，其分別，只是在於此地是人工的過程，而那裡是自然的過程罷了。但是畜牧業者和學者之有計劃的行動，自覺的意志，在自然的過程上，由什麼東西來代替呢？達爾文的回答是：生存競爭。一切植物界和動物界的機體，是爲生存而鬪爭。在這種鬪爭之中，更能適合周圍環境的機體，得到了生存。例如，假使蒲公英不必作生存的鬪爭，不必在自己發展中征服各種不同的困難，那麼經過十代以後，它將密佈全地球了。一點水內，包含着數千萬微生蟲，二十分鐘內，牠們的數量要增殖一倍。但在實際上，這樣迅速與廣大的蔓延與增殖，却不會發生。這就因爲生存競爭的結果，使巨數機體，陷於死亡。因此，生存的競爭，只使適者生存。在生存競爭過程中機體上所產生的變更，機體所得的新的質地，以後更形鞏固起來，並且遺傳下去，這樣，動植物界就經過自然淘汰的過程，而往前發展，正因爲有這種自然淘汰，所以便發現了各種新的特種。人也是經過同樣的自然淘汰的過程，從一種接近現時猴類的特種動物中發展下來的。

當達爾文發表他的「物種原始論」時，科學上還沒有很多的證實這種學說的材料。但是現在，古生物學的發見（根據開掘出來的原始人類的遺骨等等），和比較解剖學的材料（研究各種動物的機體結構之異同點），完全證實了這個學說。

一八五六年，在杜賽爾道夫（德國普魯士萊茵省）的紐達爾太石洞中，發現了人的骨骼的殘餘，這骨骼很與猴類的頭蓋骨相似。據有些學者的推測，這個骨骼是屬於現代人類的祖先的。一八八九年，在比利時離納繆爾不遠的斯巴洞穴裡，發現了兩具骨骼，其頭蓋骨很和紐達爾太地方所發現的頭蓋骨相似。一八九一年在爪哇也發現了一具骨的殘餘，它雖與紐達爾太地方所尋出來的有些不同，但很近於猴與人的骨骼。具有這類骨骼的動物，就稱爲「猴——人」。一九〇一一

一九〇二年，在克洛安特（現在捷克斯拉夫）又發現了好些頭蓋骨，很與紐達爾太所發現的相似。最末，一九〇七年在德國海得山附近又發現了顎骨，很近於大猩猩的顎骨，但其牙齒則似人齒的排列。我們僅指出主要開掘的結果，以後還有不斷的新發見。但這些材料已足夠證明，人類的祖先是猴似的物種。

因這些掘取的結果及達爾文的人類原始的學說，在學者中間就爆發了激烈的爭論。有些學者，無論如何要使「科學的發展」，不與聖經上上帝造人的傳說相矛盾，他們努力的探求反達爾文學說的論據。例如，他們指出，人是二手動物，猴是四手動物，猴的大腦後部不厚，腦裡的波紋不多，腦袋的重量比人的少，等等。但是這些論據，很容易的被那些尊重真理的學者所打破了。他們反駁說，不僅猴的腳有攫物的能力，就是人的腳亦未始沒有：這種特性，在日本人和安南人中，均可遇到，此外，小孩的腳掌，也具這種猴掌似的柔軟性。以後，又證明吉本猿的一種，也有人那樣厚的後腦部。關於腦髓波紋的數量，那末也證明出，人形的猴，在這點上對於人比較對於其他猴類，更為接近。最後，人的腦袋的平均重量，等於一千格蘭姆，而猴的腦袋不過六百，可是有些特別的人，腦袋的重量，竟達二千格蘭姆；這種人與普通人的腦袋重量之差別，有時甚至比人與猴的腦袋重量之差別還大。

這樣，現時完全肯定人是動物中之一種，和其他一切物種一樣，發展於生存競爭的過程之中。現在我們便遇到這樣的問題：為何人能够駕於其他動物界之上，能够在一定限度內統御自然？

對於上述這個問題，現時科學作了下列的主要結論：

一、人和其他有機體一樣，適應他的周圍的環境。生長於濃陰森林中的松樹，朝向太陽，骨直地向上引伸自己的樹幹，縮緊自己的樹枝；生於沙漠中的植物，減縮了自己的生長，發生很小的枝葉，因使其所需的水分減少；海豹本是陸地上的動物，牠為使自己能够在水中生活起見，就獲得了特殊的機能；潛水人的肺部，這樣發展，使他能

比常人更久地處於水中；農民，對於風、濕、炎熱，比之城市居民，更能耐受。這些都指示出對於周圍環境的適應。當環境不變之時，有機體向環境適應，而變更自身生理的特性。

二、人和有幾種動物一樣，更是積極地適應環境。蟻築蟻巢，蜂作蜂窩，燕營燕窩，海獺築堤，人穿衣服住房子來防禦寒暑，渡水用船或海洋巨輪，在陸上用火車、汽車，在空中用飛機、飛艇，在黑暗中用燈火或電力，這些都是積極的對於環境的適應。有機體改變他的周圍的環境，使之適合於自己。

三、人在生存競爭中，也如其他幾種高級動物一樣，應用工具。象用小枝扇去蚊蟲；猴用石塊投落桃子或用果實迎擊敵人；原始人在競爭中應用石子和木棍，這些都指示出他們除天然的官能以外，還應用自然中的現成的工具。

四、消極適應的特性，為一切有機體所固有；具有積極適應的特性的，不僅是人，而且還有許多其他動物；應用工具，也不僅僅是人，其他幾種高度發展的動物亦然。很明顯的，人類所以駕於其他動物之上的理由，不是在這些上面。但是人具有一種一切其他動物所沒有的特別能力，就是，祇有人能製造工具。所以，現代科學，稱為人「製造工具的動物」。

五、祇有人才能製造工具，這是什麼原因呢？很明顯的，為製造工具起見，人應具有特別發展的敏活的手。我們的祖先，是攀援的動物，因此他們的手，已與足不同，能够行使幾種不同的職能。但是，僅僅以手的特殊發展，來說明人的製造工具的能力，是不可能的。有幾種現存的猴，也用上肢在樹上築造樓巢。在解剖上，猴的手很似人的手，但是猴的手永不能製造什麼工具，因此主要之點，不僅在於手的構造，而且還在於別的地方。在這上面具有決定使用的事實，是在於人怎樣應用自己的手。人在勞動過程中，應用自己的手，就是說應用手來勞動。但什麼是勞動呢？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對勞動作了這樣的定義：「勞動是

完成於人與自然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用自己的行動去決定、調節並監督自己與自然間之物質交換。他本身以自然力量的資格，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爲着自然物質的採取適合於自己的生活的一定形式起見，他便應用他身體所有的自然力手、足、指、頭於運動之中。他以這個運動的方法，影響並改變外界的自然，同時他亦改變自己的本性，他發展自己本性中所潛在的能力，使這些力量的動作，服從於自己的權威之下。此地我們不來研究動物似的本能的勞動形式……我們把勞動當作人所特有的能幹之形式。蜘蛛完成織工似的工作，蜜蜂建築自己的蜂巢，其巧妙甚至勝過某些建築師。可是最不好的建築匠與最好的蜜蜂的區別，是在於建築匠在動手建築之前，已把計劃放在腦裡，在勞動過程完結時，所得到的結果，便是在這過程以前工作者腦裡所具計劃的實現。他不僅改變自然所給與的形式，同時他還在自然所給與的形式之中，實現自己自覺的目的，這個目的，決定他的行動的性質和方法，他並使自己意志服從這個目的。」在這定義中，必須注意下列諸點。據馬克思主張，勞動是完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過程。但是馬克思不是在這點上，看到人的勞動過程底特點。他把動物似的、本能的勞動形式（動物也影響自然的呵）和「爲人特有的能幹」之勞動形式區分開來。在這個勞動中，人實現「自己的自覺的目的。」人的勞動，是有目的的有計劃的勞動。因此目的性，有計劃性，正是人的勞動之主要標幟。現在從生理心理學中，引用幾個例子，來說明這個意思。在獺獸築堤之時，我們看到牠的行動，似乎是有意識的。有一學者對於獺獸作了下列的試驗：小的海獺，當生出後，就使之脫離自己的母親，而以人奶養之。牠被關於籠內，因此，牠便離開自然環境，離開同類而孤立，在籠內的地上，放些小枝、鮮苔、土屑。當牠到達牠的生活中的一定時期，牠就開始築堤，在籠中。這堤雖然對牠毫無用處，可是牠還是照樣的做。如果一個講師，在一定的鐘點到教室內去講演，教室裡一個學生都沒有，可是他還是在空的教室內講演着，僅僅因爲他習慣了在這點鐘內作講演；如果一個講師這樣做

，你們將說什麼話呢？他的行動，自然是無意義的。獵獸的行動，就是這樣無意義的行動。這種獵獸的行動，在自然的環境中，還有些意思，但是人爲的境遇內，則完全喪失了牠的意義了。另外一個學者，對土蜂作了一個試驗。土蜂在巢上建築臘頂，當牠建到某一定的地位時，那學者即在牠的頂上破壞了一塊，假使土蜂的行動是有意識的，那末牠應當在繼續建築頂蓋以前，先恢復破壞了的一部分，但牠不然，牠還是在空的地方繼續建築牠的頂蓋，直到頂的重心傾斜，頂蓋倒下的時候。

因此，人的勞動的特點，是在於他的目的性與有計劃性。恩格斯說：「假使動物對於周圍的環境發生堅強的影響，那末這種影響，在牠本身方面，是並沒有什麼意識的。在這些動物看來，這好像是偶然的。但是人離動物愈遠，則其影響自然的過程，愈採取預期的、有計劃的，到達一定預定目的的行動之性質。」

當我們說到人類勞動之目的性的時候，我們所用「目的性」一字的意義，和用在自然界有機體的目的性的字義有些不同。我們說到有機體適應環境的目的性，是把它看作因果必然性的一種表現，這就是說，自然淘汰的因果規律在有機體中作用的結果，使它的機體適於生存的目的。為什麼虎的爪牙恰適合於捕捉其他動物的目的呢？就因為現在的虎是幾千萬年自然淘汰的產物的緣故，這樣的目的性，是指內在的，爲現象本身所固有的（和因果必然性一樣）目的性。現在我們所說人的行動之目的性，是指目的的預定，行動的有計劃性。內在的目的性，就是本能的、動物似的勞動形式，也是具有的。可是目的性如指行動目的與計劃之預定而言，則只能爲人類勞動形式所具有。試更明白地加以說明。合乎目的地去行動——這就是說在行動之時，具有某種目的，而預見自己行動所要求的必需的結果。可是如果要從一種現象上來預見別種現象，那末就應該知道這一現象內部的矛盾，以及這一現象與別種現象中間的必然的關係，這點就非有極高的腦力的發展不可。

什麼是意識？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論」中這樣的回答道：「我對於我周圍環境的關係，就是我的意識。關係的存在，就是對我而言；動物並不與他物發生關係，在動物看來，牠與他物的關係，並不是一種關係。所以，意識一開始就是歷史的產物，而且當人們存在之時，總是歷史的產物。」列寧也給意識規定同樣的意義：「在人之前，存在着自然現象之網。本能的人，野蠻人，並不把自己和自然界分開來。有意識的人，就把自己和自然界分開來了……」（「黑格爾『論理學』筆記」）因之，意識就是把自己和周圍分開的能力；規定自己對於周圍環境關係的能力。上面已經說過，意識的表現，需要有極高的腦力的發展。可是什麼東西能够促進人類腦力的發展呢？恩格斯對於這一問題這樣的回答道：「隨着手肢及勞動的發展，初步的對於自然的統治，不斷地接着新的步驟擴大人的眼界。在自然界的物象中，他不斷的發現新的以前所不知道的本質。他一方面，勞動的發展，必然的促進社會分子的更親密的團結，因着這種發展，扶助及合作的場合亦愈多，每個社會分子亦更明瞭地看到共同行動的利益。一言一蔽之，正在形成中的人，進到這樣的步驟，使他們具有相互交換言語的需要。這種需要，就造成官能；猴子不發達的咽喉，緩慢地不斷地日益加甚的音調轉變的方法，進行改造，而口的器官，則逐漸學會發表——相繼的音節。」「起始是勞動，再以後，並且與之相並的，有分別音節的言語，這二項是最主要的刺激，在這種刺激的影響之下，猴的頭腦逐漸轉為人的頭腦，人的頭腦雖然在基本結構上與猴的頭腦很是相似，可是在巨大與完美程度上，都超出猴的頭腦。頭腦的鄰近的器官——感覺的器官，亦並行地隨頭腦發展而發展……頭腦，頭腦所屬的感覺，逐漸明顯的意識，抽象化及思考的能力，所有這些東西的發展，對於勞動及言語的反影響，更使勞動與言語二者，得到新的進一步的發展的刺激。從人最後脫離猿類的時候起，這一發展的過程，從來不會停止過，可是在各個民族各個時代，這種過程在其程度與方向上講是不同的，在有些地方，這過程甚至為後退的運動所阻礙。

，可是總起來說，這一過程，總是有力地往前直進，自從真正的人產生以後，社會亦跟着產生，這個新的因素社會，一方面推進這一過程，他方面更使這一過程，進入一定的方向。」

「或許經過了幾十萬年——這在地球歷史上，好像只是整個生命中的一秒鐘——方才從攀登樹木的猿群中，產生出人類的社會。可是社會終究出現了。人類社會與猿群不同的顯著標誌，在什麼地方呢？在於勞動」（以上俱見「由猴進化到人的過程中的勞動的作用」一書）。恩格斯在一八七六年所作的確切的解說在現時已為科學的發見所完全證實，現在科學已經毫無疑義地確定了造成言語的社會條件，以及邏輯思惟的來源與言語的聯繫。根據近代語言學的發見，言語是從極少語根發展出來的，這些語根，開始是指某種行動。原始的人，在勞動之時，自然而然地喊出某種音節，語根就產生於這種勞動過程上所發出的音節，所以言語的語根，首先帶着與勞動動作相關係的意義，就是說，指示一種行動。這種原始言語的發展，不得不反映原始人的全部基本利益。至於原始語言的性質如何，那末我們儘可以根據現代落後民族的語言來判斷。這上面的事實，無疑地證實，言語在其起源上在其發展上，總於依靠於社會環境的條件的。舉例來說：野蠻人語言的內容，雖然非常的貧乏，可是關於那些與該部落勞動行為相聯的事務，則具有極豐富的字匯。譬如，澳大利亞一種以牧畜為生的民族，有十數個不同的字來形容各種灰褐的顏色，這是他們在分別牲畜時所需要的，北美以漁為生的紅種人部落，常棲息於水上，他們有許多字來指點各種方向不同的風。寒帶的愛斯基摩人，有許多不同的字，來指點「地上的雪」、「下降的雪」、「雪堆」等等。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言語依賴社會條件的事實，更可以由嬰兒語言發展的過程來證明。上述恩格斯的意見，更可以由近代關於思惟來源與發展的科學來證明。它證明，思惟發展的道路，是從具體事務的思惟，進到論理的抽象的思惟，而且論理思惟的發展，是和言語的發展，密切相聯的。野蠻人，只有萌芽形式的言語，因之也只有萌芽形式的思惟，

抽象思惟（它的發展，是和言語的發展密切相聯的）的能力，更是低下。在未開化的民族裡，差不多不能計數。在離開某種物件之時，他們就不能有這一物件的質的概念。譬如北美紅人的一個考察者，這樣的說道：「當他們獵取野馬回來時。沒有人問他們獵取了幾多野馬，而僅僅問，所獵得的野馬之群，佔據多少地方。」「紅人並不說一般的良善，雖然能夠說某一個人的良善。」可是，野蠻人的具體事物的思惟力，却是非常的發展。在兒童思惟發展的過程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形，這上面思惟的發展，也是從具體到抽象，思惟的發展，也是和語言的發展，密切地相聯的。

人的意識的發展，抽象思惟能力的發展，是人類有目的底行動的必需先決條件，可是這種發展，是由語言的發展來決定的。有系統的言語的產生，本身是在社會的過程中形成的，而社會的出現，則又是由勞動的發展來決定的。歸根到底，我們終於到達這樣的結論：勞動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基礎。開始時，「本能的動物似的勞動形式」，促進社會的發展語言的發展，而且還促進頭腦的發展。以後，「頭腦所屬的感覺，逐漸明顯的意識，抽象化及思考的能力，所有這些的發展對於勞動及言語的反影響」，更產生新的勞動形式，這種勞動形式，是「人所獨有的成績」，這種勞動形式，祇在人「製造工具時，方才開始」。所以，人就被稱為「製造工具」的動物。人的勞動形式，是一種具有目的的、定好計劃的行動。如果應用工具的能力，其他動物也有，那麼製造工具的能力，却是為人所獨有的，因為工具的製造，要有預見的能力，要能够有計劃地、有目的地行動。人類勞動形式的出現，與人類製造工具能力的出現，是相互緊密地聯繫着而不能絲毫分離的。

人類全部文化基礎是什麼？對於這一問題，我們已經得到了答覆。人類文化基礎，是勞動。「勞動是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它是這樣的重要，使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應該說：勞動造成了人的本身」。（恩格斯）這上面還應該補充說：人造成了社會的勞動。馬克

思在「哥達綱領批評」上這樣的說道：「勞動只在成爲社會的勞動時，即成爲那種完成於社會中並經社會而完成的勞動時，勞動才是財富及文化的源泉。這一原則，是無可辯難的，因爲個人的勞動（假定他的物質條件是具備的）雖亦能產生使用價值，但他總是絕對不能產生財富與文化。」由此我們看到總的社會及文化起源的基礎，是在於人與自然鬪爭的物質的過程，是在於勞動的物質的過程。經過勞動的物質的過程，才建立起人類社會、人類文化與自然的聯繫。勞動的物質的過程，是「半人半猿」的動物（所謂「自然人」）發展到「社會人」的主要基礎，也是社會發展與文化發展的基礎。

現在轉到第二個要點：關於多種社會現象在其發展過程中的關係，以及這種發展的動力，就是關於社會與文化發展的學說。在關於社會與文化發展的學說中，我們要遇到下列三種主要問題。我們須說明：（一）社會生活中各種不同的原素間之關係，及文化的各方面間的關係，這就要進到所謂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二）決定社會歷史進程的矛盾鬪爭之解決方法與實際，這使我們進到一般的革命的理論，特別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之學說；（三）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歷史必然性的作用與所謂創造者的作用之間的關係，這就是關於個人在歷史過程中之作用及其對歷史過程之影響的學說。這些問題，差不多在上面各章中都多少的遇到過了。例如，關於社會生活中各種原素間之關係，文化的各方面間的關係，即是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這在論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論國家，論民族，論家族，論意識形態的各章中，都已經說過些了。再次如關於矛盾解決過程的學說——即關於革命的學說，這在論階級鬪爭，論民族鬪爭，論國家政權的幾章中也已說明了一些。所以現在我們只要把關於社會發展的理論，和說明文化起源的「勞動論」連結起來，作一個總結。

### 甲、論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

上面所說關於最初文化現象的見解，也可適用於比較發展的文化的形式。上面，我們作出這個結論，即社會的勞動是文化起源的基礎。馬克思將勞動過程，分為下列幾點：「（一）有目的性的行動，或是勞動的本身，（二）勞動所加工的對象；（三）勞動時所利用的工具。」（「資本論」第一部第五章）試加以說明。為生產生產品起見，人就必須把自己的勞動力用於取自然的物質，而因勞動工具之助，對這個物質發生影響。這樣，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是生產生產品時所必需的資料——即生產手段。但是生產手段，不經人的勞動力去使用是不能產生任何生產品的，因此，生產手段和人的勞動力相結合，就是生產生產品的力量，即生產力。這樣，從勞動及其原素的概念，我們就進到了生產力的概念。我們既知道，勞動是文化起源的基礎。所以，自然而然地便得出結論，即生產力的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基礎。我們更知道，在生產中勞動工具與其使用（被人的勞動力使用）即技術，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種種原料製造的可能，均深刻地依賴於技術的狀態。因此，馬克思指出研究技術學歷史的巨大意義：「技術學闡明人對自然的能動關係及人的生活上的生產之直接過程，因此也就是闡明人類的社會生活的情況，以及由此而生的精神現象的直接生產過程。」（「資本論」第一卷第三十章）同樣的，在資本論第五章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勞動工具的遺跡，對於已崩壞的社會形式的研究，正好像遺骨構造對於已滅亡的動物組織的研究一樣，具有同等的重要。經濟時代的區分，不是在於所生產的是什麼？而是在於怎樣用什麼勞動手段去生產。勞動手段，不僅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度量器，而且還是勞動所由完成的社會關係的指示者。」這就是說，生產者互相間社會關係的性質，依賴於生產力發展的程度。此地我們就遇到生產關係的概念。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是：生產關係在社會現象的一般的系統中，佔着怎樣的地位。試回溯生產關係學說之要點。生產關係，是人在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關係。「祇在這些社會聯繫與關係之內，經過這些聯繫與關係，才發生生產所必需的人對自然

的影響。」（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我們知道，這種「生產所必需的人對自然的影響」就是勞動過程。我們知道，在階級社會裡，生產關係經過一定的發展，就成為階級關係，除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及新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外，社會總是分成各種不同的階級：不勞而食的階級，勞動的階級，一方面居剝削與壓迫的地位，他方面居被剝削與被壓迫的地位。可是，不論怎樣，社會的發展，總是依靠在勞動民衆之上的，所以，「社會發展的歷史首先是生產的發展歷史……同時，就是物質財富的生產者本身的歷史，勞動者的歷史。」（「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

因此，不僅生產力，而且生產關係，均使我們進入勞動的概念。而「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就形成社會經濟結構，這些真實的基礎，在這基礎之上，生產了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築，而一定的社會觀念的形式，則是和它們相適應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它的存在，而是相反的，社會存在，決定它的意識。」（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文）簡單的這幾項，已確切的指示了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之要點。社會生產力及其所決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文化的基礎。

當我們觀察我們周圍的社會生活時，我們認識，物質生產在社會生活中佔最重要的地位，但同時我們不能不看見，人與人之間，除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以外，還存在着許多非生產關係的東西。我們每人都知道，此外還存在着國家和其官吏、軍隊、學校、法庭與監獄等等，還存在着法律的和道德的規律，換句話說，即行動的法規，還存在着研究科學的機關，還存在着圖書館、博物館、戲院、寺院，——總而言之，就是存在着社會的政治組織、科學、哲學、藝術、宗教等等。如果我們不顧上述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存在，那末，我們能否說明社會生活的實質，找出社會發展的法則呢？當然不能。自然，我們並不否認社會生活的複雜性。我們認為生產力、生產關係是社會生活的基礎，這只是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歸根到底，是決定社會發展過程

的因素，而國家、法律、科學等等，則是被決定的現象。因此，我們稱這部分的社會現象為「上層建築」。

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問題，還須有下列的說明。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國家、法律、科學、藝術不復是消極的社會現象，而成爲積極的現象，它們不但相互發生影響，而且還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發展，發生影響。這種影響我們就名之為上層建築對於基礎之「反影響」。當然，由其發源及結果上去看，這種反影響，是決不能與基礎的影響相等的。這上面應該特別指出，基礎對於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但是我們應當認識這種反影響，因為它是顯著的事實。「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說得好：

「不應該從馬克思的話中得出結論來說，社會思想、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對社會生活沒有意義，說它們不給社會存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發展以反影響。目前我們僅僅講到社會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的起源，講到他們的發生，講到社會精神生活是他們物質生活條件的反映。至於社會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的意義，至於他們在歷史上的作用，那末，唯物史觀不僅不否認，而且相反的着重指明它們在社會生活中、在社會歷史中的重大的作用與意義。」

「有各種不同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有老的、過時了的、替衰亡下去的社會力量服務的思想和理論。它們的意義就在阻礙社會的發展，阻碍它的前進。有新的、先進的、適合社會先進力量利益的思想和理論。它們的意義就在於幫助社會的發展，幫助它的前進，而且如果它愈確切的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那末它的意義來得愈加重大。」

「新的社會思想與理論祇有在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已提出了新任務之後才會產生。但是，在它們產生之後，它們便成了極重大的力量，能够幫助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所提出的新任務，能够幫助社會的前進。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新的政治觀點，新的政治制度的最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改造的意義就在這裡。新的社會思想與理論的產生，本身就因為社會必須它們，因為沒有它們的組織、動員、改造的工

作，不可能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成熟起來的任務。生產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發展所提出的新任務之基礎上的新的社會思想與理論，開闢自己的道路，深入民衆，動員民衆，組織他們起來反對社會中的沒落力量，這樣便幫助了推翻阻碍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沒落的社會力量。

「這樣，生產於由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社會存在的發展所成熟起來的任務之基礎上的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以後自己反影響於社會存在，社會物質生活。創造了澈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成熟了的任務並使繼續發展成為可能。」

當然，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影響是隨着歷史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與變化的。它在各個社會形態中，是不同的（例如，工人階級國家對於國內經濟的强大領導作用，是任何其他社會的國家所無可比擬的），就是在同一社會形態的各個階段中，它也有某些不同的表現。所以，對於這種反影響的情形，必須按照各個社會的特點，具體的、歷史的研究，決不能機械的公式的等量齊觀。

關於基礎對於上層建築的直接影響問題，我們不必多加討論了，因為政治形式、法律制度、科學、宗教、藝術等，基本上是由生產力的狀態和生產關係的形式來決定的，這些事實在國家和意識形態諸章中，已經詳細地說明過了。我們現在要引證幾個例子，來說明上層建築對於基礎的反影響，以便確切的了解這個問題，而避免對於基礎與上層建築學說的曲解。關於這點，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九月十二日致伯洛克的信中，這樣說道：「根據唯物史觀，在歷史過程中，實際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歸根到底，是決定的原素。我和馬克思，再沒有確說其他的意見。如果誰要是曲解這種意見，以為經濟的要素是唯一的決定要素，那末這個肯定，已成為抽象的、無意義的空話了。經濟的情形是基礎，可是影響於歷史鬭爭過程，而且在很多時候決定鬭爭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之各種要素：即階級鬭爭之政治形式及其結果——勝利的階級，在得勝之後所定的憲法等等——法律制度，甚至這些現實鬭爭在參加人的腦中的反映——政治的，司法的反映，——哲

學的理論，宗教的觀念，及其更進一步的教理體系的發展。」

我們知道，國家是上層建築，國家的形式，依賴社會經濟結構的形式。但同時，國家在採取某種經濟政策，訂立各種稅制，建立某種經濟設施之時，自然影響於經濟發展的過程。我們知道：為改造社會的經濟基礎起見，無產階級之政權，是絕對必須的。我們又知道，科學、宗教是種上層建築，科學思惟的責任，歸根到底，依靠於該時代經濟的需要；宗教與迷信的觀念，在技術發展愈低的社會中，在經濟的奴役愈有力的社會中，愈為深刻。可是，我們難道能够否認，許多技術上的進步，依靠於科學的發展，反之，宗教迷信的統治，阻碍了技術的發展嗎？就是在現代，農村經濟中的各種技術的改良，以及公共衛生上的改進，也還引起某些迷信者的反抗，他們願意求神拜佛，而不願用人造肥料與科學耕種方法；願意請巫求仙，而不願求助醫藥。假使不然，那末反宗教的宣傳，又有甚麼意義呢？人們不是就應該安靜地等待着技術的發展，經濟關係的變革，自動地來消滅宗教嗎？這自然是非常錯誤的。在另一方面，現代的技術，電氣技術、無線電技術以及化學技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內依賴於物理學和化學的成功。現代農學和醫學的進步，也是很密切地和生物學、化學、物理學上之最新發明相聯的。而社會科學呢？我們所處之時代，難道不是明白地證明，社會科學對於社會發展的偉大意義？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工人階級提出自己獨立的任務，而開始進入歷史的政治舞台；自四十年代始，真正的社會科學——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即開始發展，它的始創者即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它的偉大發展者是列寧斯大林。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隨着工人階級與工人運動的發展，而往前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成了工人運動與革命鬥爭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原素。革命的無產階級，一定要有自己科學的理論的基礎。「沒有革命的理論，即不能有革命的運動」。（列寧：「做甚麼」）忽視革命理論的意義與影響，是完全錯誤的。

在結論中，再須鄭重地說明，我們雖承認上層建築對基礎的反作

用，但我們決不以爲基礎對於上層建築的作用和上層建築對於基礎的反作用，是一樣的。這兩種作用，無論從其來源上看，或是從其結果上看，都不是一樣的。假使我們認爲觀念的影響，對於經濟具有優越的意義，那末我們便跑到唯心論的歷史觀上去了。假使我們認爲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相互的影響，是均等的，那末我們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我們只是跑到了二元論的路上了，就是說，跑到同是唯心論的非科學的思惟上去了。可是，如果我們否認一般的上層建築對於基礎發生影響的可能，那末我們只是機械的唯物論者，而不是辯證論者，因為，我們忘記了。第一、宇宙的現象，是在彼此的相互關係中發展着；第二、因與果不是二個「不變的分開的極端」，不是二個絕對的對立。某一現象，可以是甲現象的結果，乙現象的原因。從此便可得出重要的結論：第一、我們如不承認上層建築是由社會經濟基礎來決定，那末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第二、如果不承認上層對於基礎的一定的反影響，如果不了解這個簡單的事實，即「當歷史的變故，最後爲經濟的事實提出於人間之時，這一歷史變故，就對它的周圍環境，而且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作用」，（一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恩格斯致梅林書）那末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問題，也是不能解決的。

資產階級的科學，有所謂「因素論」，就是肯定社會生活過程中各種因素的學說。這種學說指示出它沒有了解社會生活各方面間的辯證法的關係。這種理論，把政治的、種族的、心理的因素，與濟經發展的因素，兼舉並重。很明顯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因素論的擁護者——非難歷史唯物論的學說，以爲這是「偏於單方面的」。是否這樣呢？當然不是。我們以辯證法觀點，觀察社會，就是把社會看做一個統一體，在它的各部分之間存在着密切的聯繫。我們並不否認社會生活中種種現象的不同性質，我們並不否認它們中間的交互作用，可是我們知道這個交互作用，是有一方面爲基礎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哲學的等等發展，是均基於經濟發展之

上的。但是它們均相互發生影響，並影響於經濟基礎。事情並不是那個樣子，說只有經濟情形，是唯一的積極原因，而其餘則都是消極的因素。事情並不是這個樣子。這上面是有建築於經濟必然性之上的交互作用，此種經濟必然性，是在最後貫徹着的」。（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恩格斯致上達爾根堡書）所謂因素論，是反唯物辯證法的，因為它割裂社會的整個性，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之間，建立形而上學的界限。

## 乙、社會的變革

所以，文化發展的基礎，和文化產生的基礎一樣，同是「物質生活的生產」的過程。可是這種發展，是怎樣發生的呢？社會形態、政治制度、社會心理、意識形態等等的變更，是怎樣完成的呢？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知道，社會歷史過程的基本動力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在階級社會裡，這矛盾表現為階級鬭爭。階級鬭爭，推動了階級社會形態的發展，國家的發展，民族的發展，家族的發展，以及所謂精神文化的發展。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已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序文中，簡要地說明了：「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在發展到某一階段時，便與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如用法律術語來說，便是和現存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社會物質生產力，以前會是在這種關係之下發展着的）。這些關係（指生產關係），從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障礙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期到來了。」由此我們便轉到一般的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一般說來，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在關於階級鬭爭、關於國家、關於民族的各章中，已經介紹過了。在這裡我們要對於一種誤解加以說明，有人以為馬克思主張階級鬭爭是一切社會發展的唯一原因，這是不對的，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而在階級社會內，則這種矛盾就表現為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之上。馬克思從來沒有把階級矛盾看做歷史發展的唯一原因。現在，我們以整個社會發展的理論之觀點，以這些現象上辯證法唯物論方法的應用與檢驗

之觀點，來考察這些問題。

一切存在，都是變動着的，發展着的，而且這種發展，是在對立的鬭爭中進行着的。每一個以後的發展階段，是前一個的否定，發展過程中之決定點，是突變。這是辯證法的發展法則。一切社會現象，是變動着的，發展着的，同時每個社會形式的自身，都包含着否定自己的原素，排斥自己的原素，從這個原素中，發展出新的社會形態，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最主要的決定點，在階級社會裡，是革命。所以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這是社會發展過程的辯證法的了解。這上面的決定點——即革命——的根源和基礎，應當從社會物質基礎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中去尋找。社會革命的基礎，是階級社會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互間所發生的衝突與矛盾。就階級社會來說，生產關係就是階級的生產關係，在階級生產關係裡，成為歷史過程主要內容的階級鬭爭，因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衝突，而往前尖銳化，而進到革命的爆發。生產力的發展，遇到了當時階級關係的制度的阻碍，遇到了當時生產手段上的階級私有制度的阻碍。生產力與階級生產關係，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生產力的往前發展，要求新的生產關係的建立。腐朽的生產關係，一定要被破壞，於是發生了社會革命。壓迫階級，要延緩或阻止生產力的發展，所以雖然它用盡一切方法，想保持自己的統治，但這終是不可能的。被壓迫階級受盡這樣的痛苦，這樣殘酷的剝削，使他們不能不用群衆革命的方法，與統治階級作堅決的鬭爭。「祇在『下層』不願照舊生活下去，『上層』不能照舊統治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勝利。」（「左派幼稚病」）

在階級鬭爭過程中，被壓迫階級，有時也能得到自己境遇的某些改善，得到改良。可是任何改良，都不能真正解放被壓迫階級。祇有革命，才能完全改造社會。為完成這種社會的改造起見，被壓迫階級，必須奪取政權。一切的社會革命，同時是政治革命。「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裡到別一個階級手裡的轉移，是革命的第一的主要的基本的標誌」。（列寧：「時機的估計」）沒有武力的鬭爭，沒有廣大

群衆參加的武裝鬪爭，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但是為進行堅決鬪爭奪取政權起見，革命的階級，應當自覺革命的必要，應有自己的政黨，應使本階級及廣大民衆的心理與意識革命化。革命的階級，應認識鬪爭的手段與目的，去奪取政權，在奪取政權之後，澈底地改造生產關係，大踏步的推進以前受阻碍的生產力的發展。在這革命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又遇到上述上層建築對於基礎的反影響之事實。革命常常開始於根據生產條件一定變化之上的社會心理意識形態的改變（如革命思想的傳播），再至國家政權的變革，終於往前推進生產力的發展。但是此地必須說明，社會心理與意識形態的變化，本身是不能自然而然地發生的。它僅僅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矛盾成熟的反映，這個矛盾的解決，是經過意識形態與政治的上層建築，然後又反過來影響基礎——影響經濟與技術。

以上，我們說的是社會革命發生的一般的基本原因，至於民族革命發生的原因，則是由於壓迫民族侵略與剝削被壓迫民族，障礙被壓迫民族的國度的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使被壓迫民族（特別是人民大眾）痛苦不堪，因之被壓迫民族起來革命，起來抗戰，這樣就造成了民族革命與民族革命戰爭。民族革命雖與階級革命有不同之點。但馬列主義關於革命的理論，同樣的解決了民族革命的問題。

在近四百年來，世界各國發生了而且還發生着許多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性革命的任務，是反對封建或是反對異民族的民族壓迫，或是反對民族壓迫與反對封建。資產階級性革命，在任務、動力、領導與結局等等問題上，各國都有不同的特點，所以資產階級性革命在各國有不同的類型。可是資產階級革命，類型雖然不同，但總是不超過「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底範圍的。資產階級性革命，是表現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它不但不破壞資本主義底基礎，而且把它擴大、把它深化」。（列寧：「兩個策略」）資產階級性革命，如果是廣大人民的民主主義的革命，如果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獲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澈底勝利，那末它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能够進一步直接

轉變到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一九〇五年革命後，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勝利），就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之下，聯合城鄉其他勞動者與被剝削群衆，直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關於資產階級性革命問題，將有另書闡述，在此不多說）。

在西歐，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於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二三百年來，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其各種矛盾劇烈地往前發展起來，加深起來。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的內部，發展着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力量。由於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加劇，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俄國一國內勝利了，蘇聯一國在工農鞏固聯合的基礎之上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並進向共產主義發展。（參看前文國家政權章）

社會主義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是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以便進向共產主義發展的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要求完全消滅階級的社會，建立真正無階級的極樂的社會。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並不是把生產手段從一個階級轉到別一個階級，而是把生產手段轉為全社會所有，以廣大地、迅速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

無產階級與農民是資產階級性革命的基本動力，無產階級應當積極參加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與其他革命階級結成革命的統一戰線。同時，努力成為廣大勞動民衆的領導者，爭取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中國今天的民族抗戰是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民族民主革命）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中國的無產階級正在最積極地參加抗戰，最堅決地為着抗戰最後勝利而鬪爭。在這裡，中國的無產階級最忠實誠懇地與各個抗日階級（包括參加抗日的資產階級）聯合，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日寇漢奸汪派託派作堅決鬪爭，與妥協投降、防共反共派（以反共為對日妥協投降的具體準備工作）作堅決鬪爭。

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作用，

對於其他階級，尤其是對於農民的關係，那末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僅僅是：為什麼無產階級是能够解決社會所有矛盾的階級？為什麼無產階級能够不單「爲着自己」，而且爲着全社會的利益，來完成革命？他的歷史的「使命」的根源，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首先我們徵引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矛盾的明確的分析：「在十九世紀，存在着每個政黨所不能否認的一個明確的事實。一方面，我們看見這樣大的工業與科學的力量，使之簡直爲以前歷史時代所不能夢見，在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低落的標誌，與這標誌相較，羅馬末期的困苦，簡直要退避三舍了。在我們現代，每個事物都滿含自身的對立。我們看見，機器具有減縮並協助人力勞動的力量，但它又使工人陷於飢餓與過度的工作。好像命運在奇妙地作祟似的，過多的財富的力量，變成了貧困的源泉。」「一方面是現代工業和科學；他方面，是現代的貧困與破壞，這兩方面中間的對立，現代生產力與社會關係的矛盾，是可以親自覺到的、無可爭辯的巨大的事實。」「我們知道，新的社會力量，如果具有新的人材，那末他可以建立盛大的事業，這樣的人材，只能是工人。」（見一八五六年馬克思在憲章派機關報「人民報」紀念會上的演辭）

為什麼正是工人呢？因爲，首先，無產階級是現代階級社會中的最澈底最堅決革命的階級，是不僅以解放自己階級而且以解放全人類全社會爲己任的階級。社會制度的各種形態，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形成的生產方式來決定的。在原始社會裡，生產手段是全社會的財產，所以這社會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階級社會的發展，是勞動者與生產手段漸漸分離的過程，特別在資本主義關係下，無產階級是與生產手段完全脫離了、無產階級喪失了生產手段。無產階級要獲得澈底的解放，也就要同時把整個社會永遠從剝削壓迫中解放出來。正因爲如此，所以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對立的形態」。無產階級要從這種剝削中，解放出來，它便要消滅這個最後的對立。

的社會的形態。但是還不止此，無產階級不僅是階級社會的掘墓人，而且是新的無產階級社會的建設者。近代無產階級集中於大的工廠和作坊，為社會生產過程所組織，因之，無產階級正是自覺的共產主義勞動紀律的負擔者，沒有這樣的紀律，沒有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堅強領導，社會主義的建成，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是「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聯繫着——是與大生產聯繫着。因此，它有偉大的將來。」「無產階級之為階級，是逐年增長着，在政治上發展着。並且它由於大生產中的勞動條件之故，易於組織起來。而且它由於自己的無產者地位之故，乃是最革命的階級，因為它在革命中間所喪失的，並沒有別的東西，而只不過是自己頸上的枷鎖。」（「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章）

上述的革命論，是我們上述的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和階級鬥爭之學說的完成。革命的基礎，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衝突。因此，社會革命的根底，是在物質生產的過程之中。革命的學說，由於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理論，與活的自然界的一般法則，與生存競爭的法則，聯繫起來。馬克思以為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是「歷史階級鬥爭的自然科學的柱石」。自然，這並不是說，達爾文的生存競爭法則和唯物史觀的人類社會發展法則是一個東西，而只是說，兩者有了聯繫，至於兩者的不同，是很明白的：生存競爭的法則是自然淘汰；社會發展法則是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為基礎。在將來共產主義社會中雖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仍然繼續存在，但那時已不會再有什麼階級鬥爭了（因為那時根本無產階級存在），那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將不表現在人群的鬥爭上。那時人類的鬥爭將基本上表現於人類社會與自然的鬥爭上了。

### 丙、論個人在歷史過程上的作用

當我們說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中歷史進程的動力，革命是歷史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之時，我們說的是群衆的行動，因之好像是沒有理會個人行動似的。這是否說，否認歷史過程中個人影響的可能性呢？

現在我們來說明這個問題。

在其整個的立場上看來，這一問題，是與社會歷史過程的規律性問題與歷史必然性的問題相聯繫的，意志的自由是「被認識了的必然」，這裡我們就找出了解決個人作用問題的出發點：意志自由的辯證法唯物論的了解（不承認絕對的自由與絕對的不自由，而承認那種和必然性的認識即和自然及社會法則的認識同時發展着的意志自由），人的勞動目的性之學說，使我們對於歷史上個人作用的問題，也可有辯證法唯物論的了解。我們把意志自由問題的辯證法唯物論的了解，應用於社會發展上，並發揮勞動目的性的學說，我們就可以得到歷史上個人作用問題的科學的說明。

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士達爾根堡的信中說道：「決沒有像某些人有時所想的那樣，說經濟情形可以自動的行動；人自己是在造成自己的歷史，可是他們之為此，是在一定的決定他們的環境之中，是根據舊時代所遺留的現實關係的基礎之上，而在這些關係中，經濟關係，歸根到底，總是佔據主位，無論其他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條件，對他具有何等有力的影響。」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可是反過來，人又影響於社會生活的過程，影響於社會生活。生產關係的變動，是由生產力的發展來決定的，可是生產關係的變更，又影響整個歷史的過程，這種生產關係，正是人與人的關係。生產關係的變動，不依賴於人的行動是不可能的。唯物史觀正是闡明人的行動的理由。人的行動，正是某一社會事實發生的條件之一。

例如，在某一國家中，形成了革命的形勢。就是說，在種種條件之總和中，應當爆發革命。發動的日期已定，一切亦已準備就緒。如果在這時候，某些參加人說：一切都準備好了，革命是一定勝利的，我可以坐在家裡，無須去參加革命。這些人的叛徒的行動，會產生非常嚴重的悽慘的結果——即延長鬪爭的時間，增加犧牲的數量，或甚至使革命趨於失敗。

革命是須要廣大群衆來實行的。在實行中，群衆領袖的作用，自

然比較個別普通參加人的作用要大得多。至於革命政黨的偉大領袖，那末其意義更大了。他們所提出的口號，應當「時常站在群衆的革命行動之前，而爲他們的燈塔」。（「兩個策略」）正好像工人階級必須有政黨來作本階級的頭腦和先鋒，同樣的，在黨內亦必須有領袖的存在，「黨的組織與領袖的意義，即在於鍛鍊出必須的知識，必須的經驗，必須的——除了知識與經驗外——政治警覺力，以便迅速的正確地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見「左派幼稚病」）誰能够否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在世界革命運動中的偉大領導力量呢？我們知道，唯物史觀的學說，不僅不否認偉人的作用，而且一般的都不否認個人的作用。唯物史觀承認，人們製造自己的歷史。但由此不能說，個人可以使歷史循着自己的任意的意志前進。

首先在許多場合上，人們並不了解自己行動在歷史上的意義。「人們在比較複雜的社會結構中，特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當相互發生接觸之時，並不理解這上面存在着何種社會關係，也並不理解，這種社會關係，是按着何種規律，往前發展。例如，農民在出賣穀物時，就在世界市場上與世界穀物生產者，發生接觸，可是他並不理會這點，也並不知道從交換中，產生何種社會的關係；在世界經濟中，每一個別的生產者，知道他自己在生產技術上，形成某種變更；每個產業主人，都知道他以某種產品與別種產品相交換，可是這些生產者與產業主人，都不知道他們這樣子也就會改變着社會的存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個人的任何行動，都是由許多的原因來決定的，任何的個人，本身就是環境條件的總和之產物。領袖與偉人，並非無原因地出現的，並非無原因地開始他的行動的。首先社會應該有這樣的領袖與偉人的需要，歷史的進程，一定要給他們準備好一定的條件。一人之成爲領袖，僅有天賦之才，卓絕的能力，還是不够的。首先，社會對於這種才幹，一定要有一種需要。不僅如此。而且黨的領袖所具有的知識、經驗是「該階級能思惟的代表之長期的、堅決的、複雜的、多方面的工作之結果」。（「左派幼稚病」）總而言之，唯物

史觀的學說，並不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可是它否認個人的任意性，否認個人脫離歷史的絕對自由，因為個人本身正是一定的歷史條件的產物，複雜的社會環境的產物。

關於歷史上個人作用的學說與一般意志自由問題的聯繫，列寧這樣明確地解說道：「有定論的觀念，規定人類行動的必然性，駁破無稽的意志自由的迂說，可是它並沒有絲毫消滅理性，人的良知，及其行動的評價。相反的，只在有定論的觀點之下，方能有嚴格的正確的評價，而不使任何東西陷為意志的自由。同樣的，歷史必然性的觀念，絲毫沒有毀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全部歷史，正是由個別行動者的動作，綜合而成的。在評判個人社會行動時所發生的真正問題，只是在於：在何種條件之下，這種行動，才保證可得勝利，並且什麼東西可以擔保這種行動，不成爲埋沒於相反動作的狂海中之個人行爲。」（「民粹派的經濟內容及其在斯特魯威書中的批判」）試回憶辯證法對意志自由的定義：「意志自由，是已被認識了必然性。」人類的認識，愈深刻的領會社會與自然法則的實質，人統治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權威愈大，則他的「自由」亦愈大。恩格斯在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特點之後，說明人類在進到共產主義社會時，將完成從「必然的王國到自由的王國之飛躍」。這並不是說，歷史的必然性消失了，並不是說，社會法則的作用停止了，而是說，當社會建築在有計劃的有組織的經濟基礎之上時，人既認識社會的法則，則自己就可以運用這些法則，而便使社會的現象，屈服於自己的權力之上。「社會關係的改革與變更，祇在被改革被變更的社會之分子自己出來動作時，才是可能的」（同前）。我們現在可以明白地看到，否認歷史過程上人的行動的意義——這種否認，以及自發論庸俗的「經濟史觀」的觀點，是與唯物史觀毫無相同之點的。

。……。  
四、唯物  
史觀理論

上述社會發展的理論，給我們闡明了唯物史觀學說的意義。唯物史觀的學說，就在第一次使人能够真正科學地確切理解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以及群

：的意義：衆生活的社會條件與這些條件的變化之規律。在「德國意識形態論」中，馬克思這樣區別資產階級的歷史觀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道：「一切過去的歷史觀，或是完全忽略這個歷史的實現基礎（經濟基礎），或者把它目爲與歷史過程完全無關的支節之物。因此，歷史總是以它範圍之外的事物來寫的；生活的實際生產，似乎是非歷史的事物，而歷史的事件，則似乎是脫離日常生活的、特似的、超於宇宙之上的東西。因此，人對自然的關係，就被除於歷史之外，而在自然與歷史之間，發生了對立。」唯物史觀的學說，與上述的歷史觀相反。唯物史觀第一次使對於社會的研究與認識真正成爲一種科學。同時，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決定所謂精神文化（上層建築對於基礎之反影響）和所謂創造才能（群衆與個人的作用）在歷史過程上的地位與意義。這點反過來又幫助我們來科學地解決改造社會的實際任務而建立真正的社會科學。在唯物史觀學說未出現以前，人們也提出過改造社會的任務，可是他們以爲改造社會的基本原則，是在於他們所發現的「永恒理性」和「永恒正義」的原則，但在實際上，這種對於一切時代一切民族均可適用的理性與正義之原則，是不存在的，他們的企望，只是美好的夢想而已。唯物史觀的理論，闡明社會發展的規律，指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指明了改革社會的方法與道路。它的結論，並不是從抽象的「理性」、「正義」等等的原則出發，而是根據於歷史事實的具體研究，社會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革命鬪爭歷史的確切分析，工人運動經驗的深刻研究，人類思想發展的正確理解等等出發的。所以唯物史觀的學說是理論與實際的結晶，是一個戰鬪的、黨性的科學理論，是近代社會最堅決、最澈底革命的階級及其政黨的科學歷史觀，也是世界上一切革命民衆與先進人士所須要有的、真正的、科學的歷史觀。它也正是革命的實際行動的一種指導。在這上面，應當記着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只是以各種方法，來說明世界；可是事情却是在於改造世界。」（「費爾巴哈提綱」）